

●〔智利〕巴·聂鲁达 著

● 林一安 等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聂鲁达散文选

DG

# 聂鲁达散文选

〔智利〕巴·聂鲁达 著  
江志方 江禾 林一安 译  
林光 王小方



1139562



## 内 容 提 要

喜爱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无不为其奔放的情感，奇丽的想象所倾倒，诗人的这一艺术风格，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

本书包括小品、随笔、游记、演讲、创作谈、回忆录等三十二篇，是诗人全部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诗人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政治活动和生活经历的极好注解。

本书译自下列两书：

Pablo Neruda

PARA NACER HE NACIDO

Editorial Seix Barral,

Barcelona, 1978

---

CONFIESO QUE HE VIVIDO

Editorial Seix Barral,

Barcelona, 1974

## 聂鲁达散文选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著

江志方 江禾 林一安 林光 王小方 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65/8 插页2 字数12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06-0003-6/I·3 定价：1.60元



作者小照

# 目 录

他历尽沧桑，思想开放而又善于倾听未来(代序)	
.....林一安	( 1 )
爱.....	( 14 )
微明时分.....	( 16 )
永不停航的船.....	( 17 )
英 雄.....	( 19 )
寻根者.....	( 20 )
归来的温馨.....	( 24 )
黑岛绣花女.....	( 28 )
坎塔崂的劫难.....	( 30 )
服饰的妙用.....	( 34 )
水手的梦.....	( 39 )
马德拉斯，水族馆巡礼.....	( 43 )
“埃斯梅拉达”号在列宁格勒.....	( 48 )
重访特木科.....	( 52 )

我的朋友保·罗·艾吕雅与世长辞了 .....	( 54 )
这寒意逼人的一天 .....	( 56 )
复苏而又活跃的万徒勒里 .....	( 59 )
我们伟大的兄弟马雅可夫斯基 .....	( 62 )
同样面孔的两帧相片 .....	( 65 )
毕加索是一支种族 .....	( 68 )
美洲，请不要熄灭你的明灯 .....	( 69 )
诗人不是弃石 .....	( 74 )
只要有爱，就值得活在世上 .....	( 81 )
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	( 85 )
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	( 88 )
人民的诗人 .....	( 115 )
夜晚的洗衣妇 .....	( 117 )
我们是印第安人 .....	( 126 )
没有神也没有偶像 .....	( 130 )
惨遭毒手的信天翁 .....	( 134 )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	( 141 )
回答一个问题 .....	( 153 )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选译) .....	( 156 )
年轻的外省人 .....	( 156 )
童年与诗歌 .....	( 156 )
艺术和雨 .....	( 166 )

我的第一首诗 .....	( 168 )
西班牙在我心中 .....	( 171 )
费德里科其人 .....	( 171 )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	( 179 )
《绿色的马》 .....	( 183 )
发生在格拉纳达的暴行 .....	( 188 )
我的关于西班牙的书 .....	( 194 )
战争和巴黎 .....	( 196 )
南希·金纳德 .....	( 197 )
在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	( 201 )

## 他历尽沧桑，思想开放 而又善于倾听未来(代序)

林 一 安

—

智利著名作家、一九七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自然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拉丁美洲文学界普遍认为，聂鲁达在诗歌创作领域所达到的境界和成就——气势磅礴、想象丰富、格调清新、题材广阔、语言绚丽且蕴含哲理，当今世界诗坛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经打过一个极其生动的比方，他说：“……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质量总是很高……聂鲁达简直是弥达斯王<sup>①</sup>，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诗。”<sup>②</sup>秘鲁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对聂鲁达也非常推崇，把他誉为“攀上金字

① 弥达斯王，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王，会点金术。

② 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

塔顶端的诗人”<sup>①</sup>。人们或许会说，拉丁美洲文学界对于本大陆的作家总会有某种偏爱溢美之词。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聂鲁达历尽沧桑的一生，仔细分析他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拉丁美洲文学界对聂鲁达的这一评价，而且，还会发现，这位出身卑微、平凡而又伟大的作家原来也并没有什么出奇制胜获取成功的“秘诀”；倒是他的一席话概括了他毕生的经验。他真挚、坦率而又满怀深情地说：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他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sup>②</sup>

聂鲁达的创作意识是何等的明确！责任感又是何等的强烈！和所有勇于对社会承担高度的政治责任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聂鲁达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社会责任，即歌颂人民，谴责敌人，赞美光明，揭露黑暗。而作为一个诗人，聂鲁达当然主要用诗歌来抒写胸臆和反映现实。那么，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呢？聂鲁达的回答是极其浅显明白的：

“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

---

① 路·阿·桑切斯：《拉丁美洲代表作家》。

② 巴·聂鲁达：《诗和人民》，1957年8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聂鲁达诗歌朗诵会上的演讲。

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sup>①</sup>他们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sup>②</sup>

聂鲁达果然点石成金！经他指引，我们即刻便能进入堂奥，理解诗的含意。原来，诗就是面包！就是平凡、普通、然而每日必不可少的面包！而诗人所从事的劳动，就是跟面包师一样，“揉面、上炉、烘烤和送面包”<sup>③</sup>。是啊，聂鲁达在他勤奋的一生确实象普通的面包师一样（他长得身高体胖，只要白大褂一穿，还不活脱是一位面包师傅！），长年累月地、恭敬虔诚地为他的人民、为拉丁美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烘烤着面包。我们中国读者也有幸品尝过不少聂鲁达烤制的、越嚼越有味儿的面包；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位勤奋的面包师劳作的甘苦？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得以窥探烤制面包的奥秘？由于我国在十年动乱期间对聂鲁达曾经有过极不公正的评价，也由于我们迟迟没有把诗人自己的体会译介过来，答案恐怕不会是很乐观的。经过多年的搜集和采撷，如今我们终于将聂鲁达本人论述文学主张以及创作实践的散文翻译出来，奉献在我国读者面前。

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聂鲁达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人民诗人。即使处在军事独裁者的法西斯残酷统治之下，他也毫无惧色地明白宣告：

我也有肩负起诗人古已有之的天职：保卫人民，保卫

---

①②③ 巴·聂鲁达：《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受剥削的劳苦大众。”<sup>①</sup>“这是一个四处漂泊的职业。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所到之处，人们不仅把我当作智利人中的一个，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好伙伴。这就是我的诗的艺术。”<sup>②</sup>

与淳朴的大自然以及与同样淳朴的劳动人民相处并保持密切的联系，聂鲁达感到由衷的幸福，创作灵感随之犹如泉涌，源源不断。因此，他兴奋地呼喊他的同行们跟他“一起到智利的桫树林里去，到织袜厂去，到锰矿去，或者到任何一个能吃到煎鱼的地方去。”<sup>③</sup>

聂鲁达一贯认为，他的诗是普通的面包，是献给劳苦大众享用的精神食粮，所以，“我在最破烂的硝矿办公室朗诵我的诗。当我看到那些穿着老式工作服或是粗布衫的矿工站在骄阳下，象竖立在沙地上的焦黄的塑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听我朗诵时，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sup>④</sup>

聂鲁达还深刻地认识到，“保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绝不仅仅是向他们提供面包，还必须为他们伸张正义。他讲了这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某次，聂鲁达和夫人玛蒂尔德在圣地亚哥居住的时候，“总会看到点着两支蜡烛和一个用木盆洗衣服的妇女，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似的。每到晚上九点钟，那位妇女便准时在木盆里搓洗衣裳，直至深夜。”<sup>⑤</sup>面对这位妇女在“两片

---

①③ 巴·聂鲁达：《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②④ 巴·聂鲁达：《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⑤ 巴·聂鲁达：《夜晚的洗衣妇》。

烛光中间的曲背弯腰的身影”<sup>①</sup>，诗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是当代的诗人，我在这位洗衣妇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宗教仪式，而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是我们地广人稀的美洲千百万妇女的生活。”<sup>②</sup>于是，诗人慨然命笔，创作了题为《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的著名诗篇。

对于诗歌，聂鲁达是充满信心的。诗人认为，“诗歌总是显示出生命的活力”<sup>③</sup>，“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也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sup>④</sup>。诗歌仍将“象火一样灼热，象雪一般轻盈、清新”<sup>⑤</sup>，“比导弹还要迅猛，比城堡还要坚固”。<sup>⑥</sup>

我们还会看到，这位饮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虚怀若谷的广阔胸怀。他是怎样对待前人和同辈的呢？他说，“艺术的世界是一个大家一起工作并且互相扶掖的大工场。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呢？”<sup>⑦</sup>

这类文章，寓深沉的学术及繁复的理论于轻松的描述之中，使人读来兴味盎然。

## 二

聂鲁达说：“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

---

①② 巴·聂鲁达《夜晚的洗衣妇》。

③④⑤⑥ 巴·聂鲁达：《回答一个问题》。

⑦ 巴·聂鲁达：《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四处奔波。”<sup>①</sup>确实，诗人一生历尽沧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走遍天下，见多识广，视野宽阔，这为他的文学创作取得成功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我们知道：巴·聂鲁达是作家从一九二〇年起因敬慕十九世纪捷克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杨·聂鲁达而给自己起的笔名。巴·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智利中部一个名叫埃尔帕拉尔的小城镇。父亲种过田，在堤坎做过工，最后当了一名专运碎石的火车司机。母亲是学校教员，聂鲁达降世的第二个月，她便与世长辞了。聂鲁达的父亲于一九〇六年续弦后举家迁居特木科，聂鲁达便在那儿念小学和中学。一九二一年，在首都圣地亚哥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同年，以诗歌《节日颂》获智利全国学联主办的赛诗会一等奖，聂鲁达大受鼓舞，从此决心终生献身诗歌创作。一九二三年，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一九二四年，著名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版。这两部风格清新的诗集使聂鲁达在智利全国诗坛崭露头角，声名大振，他年仅二十一岁即被誉为当时智利三大诗人之一。

自一九二七年起，聂鲁达进入外交界，历任驻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新加坡、阿根廷、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领事，一九七一年任驻法大使。三十年代在马德里任职期间，聂鲁达同情共和政府，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并和西班牙著名进步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等

---

① 巴·聂鲁达：《寻根者》。

人交往甚密，主办《绿马诗刊》，但也因此被当时的智利政府革职。聂鲁达离职后即旅居巴黎，创作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热情讴歌了西班牙人民保卫祖国、保卫自由的英勇战斗，愤怒控诉了法西斯蒂的野蛮罪行，因而受到西班牙人民的热烈欢迎。共和战士们亲自印刷，随身携带，甚至在战壕里吟诵。一九三九年，智利进步政治势力执政，聂鲁达被任命为负责西班牙移民工作的驻法领事，营救出大批西班牙流亡者。一九四五年，当选智利议员；同年七月，加入智利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完成卷帙浩繁的著名长诗《漫歌集》（一译《诗歌总集》），这标志着聂鲁达思想上和艺术上已达高峰。

聂鲁达于一九七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外，还曾获得智利全国文学奖、国际和平奖金及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病逝，结束了他那历尽沧桑的一生。

聂鲁达曲折复杂的创作道路取决于他曲折复杂的生活经历。根据诗人的全部作品来判断，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诗集《黄昏》和《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个时期，聂鲁达的诗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爱情、孤独和死亡是诗人主要的创作题材，作品的基调虽然缠绵凄恻，然而其感情真挚朴素，风格清新，写景状物别具特色。这在聂鲁达早期的散文诗里也可略见端倪：“因为你，当我伫立在鲜花初绽的花园旁边时，春天的芬芳使我痛楚。”<sup>①</sup>

<sup>①</sup> 巴·聂鲁达：《爱》

“我已忘却你的芳容，也不记得你的纤手，更不记得你的朱唇如何亲吻。”<sup>①</sup>“有如鲜花离不开花香，我割不断对你的朦胧记忆。我就象一处一直在疼痛的创伤，只要你一加触碰，立刻会使我遭受莫大的伤害。”<sup>②</sup>

《地球上的居所》一集及二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这期间，聂鲁达在东方各国的所见所闻，虽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贫困、落后和腐败等现象，但劳动人民出身的诗人仍然情不自禁地赞美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东方：在这些国度里，“盛开着服饰的花朵。迟缓的春天或是奇妙的夏天，总有一个是属于它的季节……总是一脸笑意。”<sup>③</sup>无论是中国的色彩斑斓的“给观众带来了忧与乐”<sup>④</sup>的戏装，印度妇女“象火焰那样包围全身”<sup>⑤</sup>的纱丽，还是缅甸男子穿的“式样奇特、色彩鲜艳的叫作‘隆基’的大裙子”<sup>⑥</sup>，或者“身穿胸衣和纱笼、头戴金属冠冕”<sup>⑦</sup>向观众献舞的印尼小姑娘，都使聂鲁达倾倒。这样的人群在聂鲁达眼里简直“就象能走动的水彩盒”<sup>⑧</sup>，令他心醉神迷！聂鲁达还赞美印度的弄蛇人、中国的水手以及其他在生活中拚搏的劳苦大众，他同情他们生活的艰辛，颂扬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一个印度杂耍艺人兼弄蛇者……吹一支葫芦管子，声音尖锐而且忧郁；管子声音一响，一条脑袋扁平的褐蛇就象回声似的，从圆形的小篮子里逐渐探出身来：这就是可怖的眼镜蛇。它歇腻了，时时刻刻都想咬

①② 巴·聂鲁达：《爱》。

③④⑤⑥⑦⑧ 巴·聂鲁达：《服饰的妙用》。

一下弄蛇者；有好几次，它竟拚命想爬到甲板上去，弄得船上乘客大惊失色。这个高明的杂耍艺人不仅仅弄蛇，他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使树木长大，变出鸟儿来；他的戏法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sup>①</sup>“中国水手半弯着身子，钻进冰冷、僵硬的梦境的面罩里去；他们徜徉在梦境里，有如在陷阱底部行于。”<sup>②</sup>或许和这种虚幻朦胧的梦境一样，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亦趋向晦涩难懂。聂鲁达承认，这是他的“苦闷时期”。聂鲁达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是诗人多产的鼎盛时期。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声炮响，驱散了这位外交家的闲情逸致，诗人面对法西斯的暴行，义愤填膺，诗风大变，铿锵有力的诗句代替了晦涩费解的言辞，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受到了西班牙共和战士的热烈欢迎。这在聂鲁达的回忆录里，也有生动感人的记载：“……我的书《西班牙在我心中》以一种奇特的办法印出来了。我以为在浩如烟海的书籍的奇异历史上，很少有几本书有过如此多事的准备和不平常的命运。前线的士兵学会了排印，会排各种铅字，但那时缺少纸张，他们找到了一个旧的磨盘，决定就地造纸。在投掷下来的炸弹中，在战争的环境里，却造出了罕见的纸浆。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扔进磨盘里，从敌人的旗帜到一个摩尔士兵的大褂。”<sup>③</sup>“……他们中的很多人宁愿用口袋来装运这批已印好的书而不先运他

---

① 巴·聂鲁达：《马德拉斯，水族馆巡礼》。

② 巴·聂鲁达：《水手的梦》。

③ 巴·聂鲁达：《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们自己的食物和衣服。”<sup>①</sup> 聂鲁达从此认识到，只有接触人民，与人民共呼吸，自己才有力量。就是本着这一精神，聂鲁达创作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长达一万三千行的史诗《漫歌集》，使自己在艺术上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聂鲁达晚年的诗歌创作虽然大多没有什么生气，但是我们从最近搜集到的材料里可以看到，诗人仍然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来自生活，作家必须跟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坚持现实主义方向：“……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份量。”<sup>②</sup> “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象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sup>③</sup> 因此，聂鲁达满怀信心地宣告：“吟唱诗歌决不会劳而无功！”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它给聂鲁达晚年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研究资料，至少，不会象过去那样，轻易地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

### 三

聂鲁达还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的诗人。他没有给自己封闭任何一条道路，也没有让别人给自己堵塞任何一条道路。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辩证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

---

① 巴·聂鲁达：《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②③ 巴·聂鲁达：《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个诗人，如果他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这是相当可悲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①

从这里出发，他下决心兼收各家各派之长，寻求自己的表现形式。他给自己提出的座右铭是：“我应该学会谦虚，去打破自己的许多框框。”② 聂鲁达认为，诗人贵在独创，走自己的路，而决不能象某些极地的部落一样，“食品由一些人长时间咀嚼后，让另一些人吞咽下去。”③ 这样的“食品”，聂鲁达是拒绝咀嚼的。聂鲁达确信，无论多么光辉伟大的诗人，无论是“使诗歌走到了尽头”④ 的但丁，“象一颗人造卫星，在幽暗中闪射光芒的”⑤ 曼里克，“咤叱风云，穷尽了诗歌的技巧”⑥ 的雨果，“穿着入时的绅士”⑦ 波德莱尔，“不修边幅的青年”⑧ 兰波，还是把“每棵草都已种好，草坪已无从涉足”⑨ 的惠特曼，或者让人们“听到汽笛、枪击、叹息、哭泣、火车和装甲车的轰鸣”⑩ 的马雅可夫斯基，只会给诗歌的发展推波助澜，而决不会使诗歌止步不前。

聂鲁达在一九五一年访问北京时，艾青同志打趣地问道：“你这‘聂’字是三只耳朵，我看你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聂鲁达用肥长的指头敲敲额头答道：

---

①② 巴·聂鲁达：《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③④ 巴·聂鲁达：《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⑤⑥⑦⑧⑨⑩ 巴·聂鲁达：《回答一个问题》。

“在这里呢，它倾听未来！”

鲁聂达就是这样高瞻远瞩，满怀理想地憧憬未来，所以，他能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民间谣曲、美国惠特曼自由诗体以及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等各派优点，使自己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sup>①</sup>，从而奠定了二十世纪拉丁美洲诗歌的创作基础。

综上所述，聂鲁达是一位历尽沧桑、思想开放而又善于倾听未来的伟大诗人。历尽沧桑，使得聂鲁达知道什么叫做“真”和“善”，“假”与“恶”；不自我封闭，使聂鲁达知道什么才是“完美”；而倾听未来，使聂鲁达不致鼠目寸光。我们相信，聂鲁达在他的散文里阐述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日中国的文学界和读书界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 四

聂鲁达的散文是诗人全部文学作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对诗人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政治活动和生活经历的极好注解。他的散文，文笔雄健而隽永，感情奔放而细腻。聂鲁达似乎和智利著名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一样，擅长丹青，他在“深黄里掺和血红，赭色中兑进墨绿”<sup>②</sup>，挥毫泼墨，运用自如。散文以这样豪迈的气势写来，时而仿佛奔腾咆哮的巨川大

① 瑞典科学院的题辞。

② 巴·聂鲁达：《复苏而又活跃的万徒勒里》。

河，汹涌澎湃；时而又如叮咚的山涧小溪，喁喁低语，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聂鲁达作文，遣词造句，都非常简练、精确、巧妙、奇特，译成中文，极难表达，我们虽尽心竭力，也难以转达其全部神韵。不过，我们聊以自慰的是，这本散文集全部译自西班牙文原文，从而多少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从英文或俄文转译聂鲁达作品的局面。限于水平，不当及谬误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1986年1月，北京

## 爱

因为你，当我伫立在鲜花初绽的花园旁边时，春天的芬芳使我痛楚。

我已忘却你的芳容，也不记得你的纤手，更不记得你的朱唇如何亲吻。

因为你，我喜爱睡卧在公园里的白色雕像，那些白色的雕像默然无声，两眼一无所见。

我已忘却你的声音——你欢乐的声音；我已忘却你的双眸。

有如鲜花离不开花香，我割不断对你的朦胧记忆。我就象一处一直在疼痛的创伤，只要你一加触碰，立刻会使我遭受莫大的伤害。

你的脉脉柔情缠绕着我，有如青藤攀附着阴郁的大墙。

我已忘却了你的爱，可我却从每一个窗口里隐约地看到你。

---

• 这篇散文诗1922年发表于智利圣地亚哥的《光明》杂志。

因为你，夏季沉闷的气息使我痛楚。因为你，我又去留意燃起欲望的种种标志，去窥视流星，去窥视一切坠落的事物。

（林光 译）

## 微明时分\*

周围是凝固般肃穆的岑寂。划破这岑寂的是公鸡的啼鸣，还有劳动者的足音。可是，随之而来的依然是一片岑寂。

后来，在我的胸脯上，一只漫不经心的手感受到了心脏的搏动。这仍然令人感到惊讶。

我的记忆，我的痛苦，我的目标——啊，往昔的岁月——又低首下心地迈着步子，在空间和时间的小径上苦苦挣扎。

只有这样，才能轻而易举地通过这条小径。

（林光 译）

---

\* 同《爱》。

## 永不停航的船\*

长久以来，一些无形的航海家驾着我通过奇妙的大气，在陌生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深邃的空间任凭我永不停息地遨游其中。我的龙骨已把一大块闪亮、漂动的冰山撞碎，因为它妄图用那尘封的躯体挡住航道。后来，我航行在茫茫的云海里，那云海在另一些比地球更加明亮的天体间扩展开来。然后，我在白皑皑的海上，在红彤彤的海上航行，这些大海用它们的色彩和云雾涂染我的船身。有时我还穿过纯净的大气，那浓密明亮的大气浸透了我的帆，使我的帆象太阳那样灿烂夺目。我们在一些被水或风征服的国度里久久停留。有一天，而且总是那么令人意外，我的无形的航海家们拖起我的锚，风于是涨满了我那璀灿的帆。我重新驶进漫无路径的永恒中，驶进空寂的平原上空那没遮没拦的星体的大气中。

我驶抵地球，在蓝天下我很陌生的澄碧的大海上下碇。我的锚已经习惯于波涛的绿色的吻，在海底金色的沙子上休息，一面与海底缠绕扭曲的植物嬉戏，一面扶

---

\* 同《爱》。

持着绵长的白昼里游来骑在它身上的白生生的美人鱼。  
我那高耸挺直的桅樯，是太阳、月亮以及给它以考验的  
多情的风的挚友。从未见过的鸟儿飞矢般飞来，在桅樯  
上停留，然后划过天际，一去不再回还。我于是爱上这  
天空，这大海，也爱上这些人……

可是，不知哪一天，我的无形的航海家们又要来  
到。他们将拉起我那扎入深水海藻中的锚，我那璀璨的  
帆又将被风涨满……

于是，我又将驶进漫无路径的永恒中，驶进那扩展  
在永远孤寂的其他星体之间的红彤彤和白皑皑的海洋  
中。

(林光 译)

## 英 雄

我随处都能找到英雄，仿佛他们就在我的思绪中。起初，我不知道如何识别他们，不过我既然已经落入生活的陷阱，看见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学会赋予他们以他们并不具有的东西。可是，这倒使我对这种英雄气概感到厌倦，而且很不耐烦地予以拒绝。因为，我现在喜爱的是对不幸折腰的人，是一挨鞭子就吱哇乱叫的人；我喜爱的是不会欢笑的忧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还把生活看作一座潮湿的、没有一线阳光的、阴森森的大仓库。

然而，眼下我没有遇到这样的英雄。我的思绪中仍然只有旧的英雄气概，旧的英雄。

（林光 译）

## 寻根者

爱伦堡<sup>①</sup>读过也译过我的诗，他责怪我：你的诗里“根”太多，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写这么多“根”呢？

确实。我的《回忆录》第四卷问世之前，就有人对我说了不少类似的话。这部回忆录就叫《寻根者》。

·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伸进我的诗里，再也不能离去。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而且总是要回到南方的森林，回到那莽莽的林海。

在那里，参天大树有时在结结实实活了七百年后，竟倒了下来，有时被湍急的洪水连根拔起，有时被大雪冻伤，有时被大火焚毁。我听到过巨人般的大树在森林深处倒下的声音：栎树沉重倒下时发出天塌地陷般的响声，有如一只巨手在敲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

可是，树根却暴露在地面上，任凭满怀敌意的时间、潮湿、地衣去宰割，遭受接连不断的摧残。

---

<sup>①</sup> 爱伦堡（1891—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辅一个犹太工程师家庭。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当过战地记者。他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曾获斯大林奖金。他的小说《解冻》引起过争论。

没有什么比那些受伤和遭焚的张大的巨手更美的了，这些巨手横在林间小径上，向我们诉说埋在地下的树木的秘密，诉说支撑枝叶、控制植物的奇异肌肉的奥秘。那些悲惨的粗硬的巨手，对我展示一种崭新的美，因为它们是具有深度的雕刻——大自然的神秘杰作。

胡利娅·罗赫尔斯夫人简直是个森林仙子，她把一根重一百公斤、年轮为五百年的树根，当作礼物送给我，所以使我又想起这一切。她的礼物立刻使我领会到，那些根都是属于我的一位亲人的，属于总以某种方式在我家里出现的植物之父的。曾几何时我也许在山上听过它的劝告，听过它那多重的飒飒声，听过它那清新的话语。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它们现在来到我的生活里，也许是要把它们的沉默传染给我。

啊，我的寻根者哟！

我可以想见她迎着花草的浓郁芳香，在湿润的腐植土上寻觅的情景；智利南洋杉、柏树、智利肖楠象一座座高塔那样耸立在那里。想见她骑马穿过纷纷扬扬的雨丝，把脚插入烂泥里，听着短尾鸮喉音很重的话语，每次为了找到更加粗实、更加盘根错节、更加诡谲的根，她把指甲都弄劈了。

罗赫尔斯夫人写信告诉我，有些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在旷野里听凭风吹雨打和隆冬的肆虐已达上百年。而这会赋予她所寻觅的杰作以伤痕累累的织体，银灰的色调，尤其是会形成树根的那种粗硬的、令人心碎的庄

严美。

南方的莽莽森林正渐渐被砍伐、焚毁、侵占一空。景色日益单调，披上一件“造纸厂”所需要的实业外衣。森林终于为一行行望不见尽头的、披着绿蓑衣的松树所取代。寻根者决心为我们保存的这些智利树根，也许有朝一日会象古生物大懒兽的颌骨那样成为文物。

我赞扬她的热情不仅仅因为这一点，还因为她为我揭示出形态神秘的大千世界，揭示出大地再次给予我们的美学教育。

几年前，我同拉斐尔·阿尔维蒂<sup>①</sup>在奥索尔诺<sup>②</sup>附近的瀑布、灌木丛和森林间散步，拉斐尔使我注意到每一丛枝叶都各不相同，所有的叶片仿佛都在以千变万化的形状争奇斗妍。

“真象是植物风景画家为一个美不胜收的公园收集的。”他对我说。

甚至后来在罗马，拉斐尔还谈到那次散步，以及我国森林里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色。

先前是这样，而今则不然。我伤心地回想起青少年

---

① 拉斐尔·阿尔维蒂（1902— ），西班牙著名诗人。年轻时从事绘画，后转向诗歌创作。1931—1932年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促使他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站在民主力量一边。内战结束后，他流亡法国和阿根廷，仍坚持诗歌创作。五十年代，他访问过中国，随即出版诗集《中国在微笑》。

② 奥索尔诺，智利中部地区名，该地区有奥索尔诺火山锥和梁基韦湖。

时期在博罗亚和卡拉韦之间的旅行，或是到托尔滕沿海山冈的漫游。有多少意外发现哟！智利芳香木的清丽身姿以及它雨后散发的芬芳，地衣以及它挂在森林的无数“脸”上的雪白胡子。

我挪动那些落下来的“脸”，希望找到几只闪光的鞘翅目虫子，也就是那种披着闪色外衣、在树根下面跳小型芭蕾舞的步行虫。

后来，我骑马越过崇山峻岭驰向阿根廷一侧时，在参天大树形成的绿色拱顶下碰上一个障碍，那就是其中一棵树的根，它比我们的坐骑更高，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动用了斧子，才得以通过。那些根象坍塌的教堂一样，其宏伟一经展现，便令人慑服。

如上所述，均因想到存在这位新的热心寻根者而发。她的工作很了不起，就象收集火山或晚霞一样。

始终出现在我的诗中的那些根，确实象是会在地下穿行，<sup>①</sup>追逐我而且赶上我那样，已经回来又安顿在我家里了。

（林光 译）

## 归来的温馨\*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

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莫测高深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躯干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日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巡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着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它们骄傲地向我致意，然而已经习惯了我的归

---

\* 这篇散文1952年发表于墨西哥的《新闻报》。

来。

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

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了我离家的迹象。

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

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在我的背后，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

在我离家期间，书籍给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它们的位置给挪动了。在一卷十七世纪古版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sup>①</sup>的《尤卡坦旗舰》；尽管如此，它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象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掉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脊和书皮缝上，事前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

海螺是我住所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

---

<sup>①</sup> 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作家，著有多种探险小说和游记。

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事件。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Rostellaria，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深海的魔术师——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黑“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儿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

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歌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

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马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秘密。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当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

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她没完没了地附丽于文学，因为她太高傲。可是，眼看

她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她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她们骏马一样的体魄，赞叹她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她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象是责任心创造奇迹，在露天地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她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分光。

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的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

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林光 译）

## 黑岛绣花女\*

黑岛遍地鲜花怒放。小小的黄花艰难地熬过严冬，立即变成蓝色；再迟一些日子，随着春天来临，又变成紫红色。大海终年鲜花怒放。大海的玫瑰花是雪白的，它的花瓣就是盐结晶而成的星星。

就在去冬，黑岛的绣花女也开始开放出鲜花。三十年来我认识的每个家庭，都展示了鲜花般的刺绣。从前，这些人家的房子都那么阴暗而且寂然无声；蓦地到处都放满了斑斓的绣线，有的是纯洁的天蓝色，有的深紫，有的淡红。绣花女人人心地纯洁，所以她们绣上的是心灵的颜色。她们有的名叫梅塞德斯，有的叫何塞·路易斯大嫂，有的叫欧费米娅，有的叫埃杜利娅、普拉、阿德拉、阿德莱达。她们叫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名字，因为她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如果花儿选中她们的名字，她们就以花名为名；而她们绣上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就是大地的纯洁色彩，就是阳光和水，就是春天。

---

\* 这篇散文写于1969年9月。黑岛是智利沿海的一个小岛。

任何东西都不如这些刺绣美，这些刺绣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纯洁，就在于焕发出历尽苦难后的欢乐。

我记述黑岛的绣花女充满了自豪，所以我的诗扎根在黑岛。

看到这些普通人民的作品，这些妇女用勤劳的巧手绣成的作品，人们知道这里确实遍地鲜花怒放。

欢迎你，黑岛的春天！

（林光 译）

## 坎塔崂的劫难

许多年来，我一直与大海生活在一起。我不是航海者，然而我是大海不停变化的不妥协的观察者。浪花本身使我入迷，智利海洋上任性的海啸和滚滚波涛使我恐惧，也使我沉思。我成了鲸鱼、大海螺、潮汐、植虫、水母、各种鱼类的行家。我赞赏巨大的砗磲和贪吃的大牡蛎，我还在加利福尼亚<sup>①</sup>捡过哥特式结构的雪白的海菊蛤，或是有珍珠光泽的壳上布满虹彩的鲍鱼。在锡兰<sup>②</sup>，我在海边住过很久，同渔夫一起捕捞过海里最奇怪的发磷光的生物。后来，我来到祖国的海滨，面对着白浪滔天的黑岛居住下来。在这里，满目是严峻的大海和笼罩海上的阴云，一个个严冬就从这里流逝，周而复始永无穷尽。

我觉得大海比大地纯净。在海上，我们看不到大城市里那种滔天罪行，也看不到灭绝种族的企图。海岸边飘不来腐臭的烟雾，也堆积不起燃尽的香烟灰。世界在

---

① 加利福尼亚，美国西部州名。

② 锡兰，即斯里兰卡的旧称。

洁净的蔚蓝的波涛近旁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长期在孤寂的海边享尽休憩与写作的乐趣之后，我隐约感到些许内疚。我的伙伴们呢？那些与我友好的以及反对我的作家们呢？他们能得到面对大海进行写作和休息的这种新式享受吗？

因此，当靠近黑岛的地方出售一片滨海土地时，我定购下也许是最美的一块地方，要在上面修建一个作家村。几年来，我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陆续支付这笔费用，同时也想用这个建筑略略回报一下浩瀚大海对我的厚爱。

我给这块文学领土取名坎塔崂。我早年写的一本书里，有个虚构的村子就叫这个名字。就在今年，也就是一九七〇年，我付清了索取的款项，可是由于划界不清，丧失了一些地皮。在地界问题上，受损失永远是诗。

在把这片地交给作家们之前，我抱着两个目的盖了一间茅屋，一是存放钉子、木板、水泥等建筑材料，二是我时不时要到那里藏身。我盖这间茅屋用的是粗实的树干，上面装的是容易弄坏的窗子——旧教堂的那种窗子。其中几扇窗子镶有绿的、红的、蓝的玻璃，玻璃上还有星星和十字架。这茅屋只有一个房间，还没有水和灯，高高地立在陡峭的海岸上。它北边的邻居是威严的、巉岩累累的特拉尔卡岬——在阿劳科语里，就是霹雳岬的意思。在那里，当狂风怒号暴雨猛击的时候，浪涛飞立，可高达百米。

今天上午，我把在圣安东尼奥港新买的一个锚卸在

那里。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且借助一台拖拉机的力量，我才能把它放置在那片地的高处。最好的奠基物莫过于锚。一切房建工程都得先这么办。至少在海滨，工程不应以放置第一块石头，而应以放置锚开始。

拖拉机消失了，拖拉机手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打开茅屋的门。我已有两个月没进这间茅屋了。

在这之前，我在这里差不多写完了我的一本新的诗集，那是一首激昂的长诗，现在尚未付印。最近一次，当我看到茅屋遭劫时，我报以微笑，当然是苦涩的微笑。因为茅屋里几乎一直是空空如也，所以强盗能拿走的东西寥寥无几。我发现丢失了一个破旧的吊床，两个杯子和三本书——是我留在那里仅有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梅尔维尔<sup>①</sup>的短篇小说和诗集。另一本是英国诗集，我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现在只有让那些强盗去读了。第三本是我珍藏的书；这本书极小，是精装的莎士比亚著作，一八九七年出版于伦敦，我是一九三〇年在科伦坡买到的。永别了，陪伴我这么多年的三本书。

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景象更使我痛心。新的破坏者们乘窗板没有关严之便，把窗玻璃砸碎了。他们下死劲把楔子或是凿子捅进去，以便把旧式然而很贵重的窗子捣破。蓝色、绿色、红色的玻璃碎片在地上铺了一层。散落地上的碎玻璃片好象是模拟画像<sup>②</sup>；连破碎的玻璃

---

① 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作家。

② 指公安机关根据受害人或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绘制而成的作案者画像。

都显得凶残、无情，仿佛是那些盲目破坏者的眼睛，是他们切断了的手指，是他们被邪恶撕碎的脸。

要知道，这不过是一间不出名的茅屋，它至今还没有主人，还没有住户；它正在等待明天带着作品和梦想来居住的人们。

也许我无缘认识明天将在那里生活的创造者。

也许某些巧妙伪装过的破坏者记起来时会说：“坎塔崂……坎塔崂……我听说过这个地名。我初次上阵偷了几本书，打破了透进光线的窗子，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呀？”

（林光 译）

## 服饰的妙用

在咱们这个星球的一些国度里，盛开着服饰的花朵。迟缓的春天或是奇妙的夏天，总有一个是属于它的季节。服饰，这个行动的灰色伙伴和日常天使，总是一脸笑意。服饰的争斗确实由来已久；在阳光炙人的西班牙和阴雨绵绵的英国，大众的服饰毫无差别，简直是旗鼓相当。杂乱的大众是黑鸦鸦的一片；他们崇尚雨衣，喜爱高筒礼帽；他们套在官气十足的冷冰冰的衣服里，而这种衣服一律是开司米料子缝制的。

这种黑不溜秋的服装，看似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实则正在深深损害着历史感，败坏人民大众的伟大情感。革命，推翻帝制，策划阴谋，暴动，这一连串并不久远的了不起的字眼，如今给憋在受制于吸烟服和雨伞的裤筒深处，只能发出行将消失的空洞响声。

这些字眼连同其伟大含义，受到平庸服饰的排斥，都已离开我们的世界。不过，毫无疑问，它们必将伴随“服装独裁者”而突然出现。这个“服装独裁者”既有那位独裁者的胸怀，一定也会迷上神妙的意大利歌剧，

而且一定会使漂亮的丝绒半统靴、有皱褶的短裤、靛蓝色的袖筒重新出现。

可是我想谈谈东方，谈谈那没完没了的服装季节。例如，我喜欢中国戏剧，而中国戏剧似乎仅仅是它那完美的行头——简直是神奇的再现。服饰的豪华和气派仿佛便是戏剧的全部。我有许多次花费很长的时间，观看了展开得极为缓慢的中国戏。笛子吹出不间断的十分尖锐的声音，剧中人物便随着笛声迈着过分威严的步子，从左首出场。他们主要是些仁慈的君主和受人敬重的长者，他们的衣着简直难以描绘，遍体的绫罗绸缎，脸上是白花花的大胡子，衣服上的宽袖子比手臂长得多，腰带上悬着宝剑，手里拿着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拂尘和手帕。他们的头被巨大的光彩闪耀的头面勒得紧紧的，又因戴上翎子而变得很大，几乎显露不出来了。他们身上罩着色彩斑斓的、长及脚跟的长袍，袍子开叉，露出耀人眼目的绣着凸花的裤子。教士祭衣圣带似的带子从他们肩上一一直垂到脚上，脚上穿着缀有亮片、上了漆的厚底靴。人物出场了，迈着小步往前走，象在古派舞蹈中那么庄重；他把头向后连续摆动，同时捋着长长的胡子；他往后一退，转身让观众欣赏盛装的后背。这个背上插满彩旗的绝妙人物，这个身穿红色和黄色服装的不可思议的“模特儿”，犹如庄严的化身，一下子从舞台上穿行而过。这一大片绫罗绸缎组成的幻影随即消失，另一些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接着登台。

这种默然无声的列队行进往往持续很久，这简直是

服装展览。剧中人物的每个动作，每个步态变化，那些渴求美妙事物的观众都贪婪地吞咽下去，而且予以消化。这种戏剧显然是通过强调服饰的重要来达到目的；演员身上穿戴的服饰，给观众带来了忧与乐。

中国街头所见的上衣、裤子之类服装，都很简朴，而且不美观。蚂蚁般勤劳的中国人消失在他们平平常常的服装里；他们的身体似乎被当作铁锤柄用，于是就在千百年的劳动中褪色、损坏。因此，舞台上的那种幻境开阔了他们的生活，那些神奇的剧中人物看来也使他们得到满足。

几个月前在科伦坡初见印度斯坦妇女时留下的印象，我依然历历在目。她们都很美，可我不是指这个。一开始我就喜欢上她们的服装了。她们的服装象油那样光亮，象火焰那样包围全身。这只不过是一种叫做“纱丽”的很宽松的长袍，从腰到脚围好几道，几乎使人看不见走步的姿态、脚踝上的镯子和裸露的脚跟；然后，它十分端庄地斜披在身上，孟加拉妇女还把长袍披到头上，包在脸的周围。这是一种古希腊无袖衫或无袖外衣那样端庄的服装，是十分平静的古代幸存品。然而，它的整个生命在于色彩，在于色彩的力量，而对色彩来说它的名称却是苍白的。什么黄绿色，青紫色，都不足以表现它的生气；更确切地说，那是些从未见过的纯净的色调。少女的腿被火红的料子缠裹起来，那黝黑的背脊被梳理过的黑发髻洒下的闪亮光波遮住，那黑发髻上闪耀着一朵宝石镶成的玫瑰花，有如强烈的幻影令人久久

难忘。

至于印度斯坦男子的服装，可说是高贵和安谧的象征。谁穿这种服装都比不上泰戈尔；我见过他，身上罩着浅黄色的长袍，简直就是上帝现身。

诗人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肩负着半是圣人半是指导者的天职。我伸手搀扶这位年迈的诗人，他穿那身衣服显得十分高大，他的胡子令人肃然起敬。

在缅甸——本篇游戏之作就是在此地写就的——只有色彩才能确定各种服装。男子腰围彩裙，头上还包一块粉红帕子；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中国式黑短褂，腰部以上简直象个蒙古的斗牛士。不过，他们叫做“隆基”的大裙子，式样奇特，色彩鲜艳，有大红的、枣红的或紫红的。曼德勒<sup>①</sup>的大街小巷，仰光的林荫道和市场，总是沸腾着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色调。在这些色彩鲜艳的人群中间悠然行进的，是叫做“波尼尔”的托钵僧，他们严肃得象刚刚复活的人，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衫，都是鲜明的藏红色和神圣的黄色。这样的人群简直就象挂满彩旗的节日，就象能走动的水彩盒，我破天荒头一次想用一用万花筒这个词儿。

我现在说说缅甸这地方。此地的妇女梳着高圆筒形发式，头发上总少不了插一朵叫做“帕道克”的金色花儿，还抽很长的香烟。缅甸王朝被推翻后，舞女们穿上了公主的服装，遍体珠翠，而且在胯部翘起奇怪的衣角；

---

<sup>①</sup> 曼德勒，是缅甸仅次于首都仰光的大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又称瓦城。

身穿这种带有鳍一般衣角的服装，跳起民间流行的叫做“普”的体操般的舞蹈，更奇特的是她们作出难以描绘的抽缩动作，这使她们的身体绷得紧极了。

在这乱纷纷的服装花园里，在这斑驳的服饰季节中，还经常能见到怪诞与随心所欲的混合物。这是个充满令人惊奇的事物的大花园，这里喧闹地涌现出多姿多彩的服饰，这里有大量出人意表的变化、出色的尝试和须臾即逝的大胆——有时则是极美的裸体的人，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中你会失去观察力。

记得在爪哇岛<sup>①</sup>的三宝垄郊外，我见过一对马来舞蹈者在为寥寥几个观众献舞。女的是个小姑娘，身穿胸衣和纱笼，头戴金属冠冕。男的是个老者，跟在小姑娘后边，照马来舞蹈的方式动着脚跟和脚趾；他脸上罩着红漆假面，手持一把长长的木刀。睡梦中我多次见到郊外那次令人伤感的舞蹈。

那种衣服应该是我的服装。我真想能穿上假面舞蹈者的服装；我真想把自己叫做米迦勒<sup>②</sup>。

（林光 译）

---

① 爪哇岛，印度尼西亚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苏门答腊和巴厘岛之间。

② 米迦勒，即《圣经》中的天使长。

## 水手的梦

轮船在航线上令人难以觉察地移动着。它在寻觅什么？我们就要在苏门答腊靠岸了。轮船减慢了航速，不久就仿佛停止了似的，生怕突然陷入岛上婀娜多姿的密林里，生怕第二天醒来时遇上大象，也许还怕会在甲板上发现鸭嘴兽。

夜晚已经来临，而且来势凶猛，不容抗拒。夜晚千方百计要舒坦地卧在大海这张没有沟壑、没有火山、没有火车通过的床上。在这张床上，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出鼾声，无须在边界线上缩腿缩脚，更不必在半岛上缩起身子；它沉沉入睡，根本不把地形放在眼里，管自做着自由的梦。

水手们为了避热，都横七竖八地躺在甲板上，双目紧闭，简直是一场恶战后的情景。他们都睡着了，各自在做不同的梦，梦象衣服似地把他们包裹起来。

温和的安南水手们仰卧在毯子上睡觉，他们的领班拉奥正梦见自己举着一把精致的金子铸的剑；他的肌肉在蠕动，仿佛皮肤底下活动着爬行动物。他浑身酸痛，

搏斗得精疲力竭。还有些水手在做斗士的梦，那梦硬似石矛，使他们感到痛苦，尖利的石矛刺得他们似乎睁开了眼睛。另一些水手在低声啜泣，发出粗重含糊的呻吟；还有一些人的梦脆弱得象禽卵，一个声响，一阵激动，都会把卵膜撞破；卵液就会象乳汁那样在甲板上滑动，然后又重新组合，它那无形、无声的外壳重新粘合，于是这个水手继续沉入梦乡。还有种种别的梦。

洛朗是个地中海的真正水手，身穿条纹汗衫，扎一根红腰带，躺在那里歇息。印度水手用带子蒙住眼睛睡觉，这被判处死刑的人使用的带子，把他们与人世隔开了；还有个把水手将手轻轻放在心脏的部位上，心脏勇猛地与睡梦搏斗，就象同子弹搏斗一般。马提尼克岛<sup>①</sup>来的黑人水手做着白日里的美梦，印度洋的黑夜幻化成一动不动地直射的阳光和椰枣林里的午睡。阿拉伯水手总要绑住自己的脑袋，使之始终对准已故穆罕默德所在的方向。<sup>②</sup>

阿尔瓦罗·拉斐尔·伊诺霍萨睡得很浅，他梦见荷兰的女裁缝，梦见夏尔维尔城<sup>③</sup>的女教师，梦见德累斯顿的埃莉卡·波拉；他梦境里的空间是杂乱的，他的梦象一种腐蚀液，又象一个大钻头。他觉得自己在这个钻头的螺线里下降，象被大风扇吸走的蝴蝶那样给吞没

---

① 马提尼克岛，位于西印度群岛向风群岛中部。面积1,090平方公里，人口主要为黑白混血人。首府法兰西堡。

②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死于今日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

③ 夏尔维尔，非洲扎伊尔的城市。

了；他觉得钻头既在坚实的土地上钻孔，也在咸涩的海水上钻孔；他觉得自己不知落入何方，下肢恍惚无力，陷身于没完没了的轮回中；他想回去，但他的额头却碰到变迁了的时代；他落入他从那里逃开的地区，却受到新来者的待遇。他狂怒地在时间中乱飞，风在他身边咆哮，有如在一颗子弹周围呼啸。

中国水手半弯着身子，钻进冰冷、僵硬的梦境的面罩里去；他们徜徉在梦境里，有如在陷阱底部彳亍。科西嘉<sup>①</sup>水手浑身刺满花纹，一脸的艰辛痕迹，打起鼾来响得象吹螺号。他们费力地把梦抬起，象水手使出浑身气力把船桅竖起。他们的船在梦里也是再稳当不过的，遇上风暴几乎毫不颠簸；除了索具，他们船上还带着守护神像和赤道的白鸚鵡。

那边是多米尼克，他平卧在几块木板上。他的脚踝上刺着“运行”或“死亡”的蓝字；手臂上刺着一只紧握匕首的手，这种花纹表示勇敢；胸膛上刺着忘恩负义的艾洛伊丝像，隐藏在胸毛织就的网子里；腿上还刺着能祛除海险的锚；刺上飞离罗盘架的鸽子的图形，有助于辨认航向，还能防止酒醉。

还有一些水手睡得象矿石一样深沉；另一些水手在睡梦中神色愕然，有如面对着不可逾越的围栏。我铺开自己的席子，合上双目，我的梦境小心翼翼地扩展开来。我担心会吵醒他们，尽力不去梦见响尾蛇、巴黎的蒙马

---

① 科西嘉，地中海西部的岛屿，是法国的一个省。

特区、各种各样的唱机；这些也许会吵醒他们。我恐怕该去梦见十分恬静娇柔的女性：去梦见璐璐，不然最好去梦见劳拉，因为这个名字更容易发音，更象是梦中的声音。

（林光 译）

## 马德拉斯，水族馆巡礼

一大早，船上就来了一个印度杂耍艺人兼弄蛇者。他吹一支葫芦管子，声音尖锐而且忧郁；管子声音一响，一条脑袋扁平的褐蛇就象回声似的，从圆形的小篮子里逐渐探出身来：这就是可怖的眼镜蛇。它歇腻了，时时刻刻都想咬一下弄蛇者；有好几次，它竟拼命想爬到甲板上去，弄得船上乘客大惊失色。这个高明的杂耍艺人不仅仅弄蛇，他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使树木长大，变出鸟儿来；他的戏法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

马德拉斯<sup>①</sup>是座平展开阔的城市。地势低洼，大公园不少，街道宽阔，象是一座英国城市，可是骤然间会看到展示古老建筑风格的一塔一寺，有如智慧的残骸，有如昔日光辉的黯然失色的痕迹。旅客很快看到了当地的贫困现象，那是最先出现的一帮印度乞丐；他们迈着庄严的步子往前走，目光有如王侯，不过他们的手指却

---

<sup>①</sup> 马德拉斯，印度南部的港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在孟加拉湾科罗曼德尔海岸。

象钳子那样紧紧抓着小钱币——镍铸的“安”<sup>①</sup>。苦力们拉着运载器材的沉重的大车，在街上受着煎熬，那是让人来担负牛马之类牲口的苦活。说到这些长着横角的瘦小的亚洲黄牛，确实象玩具店出售的那种肚里塞满木屑的牛，也许竟是神牛的幽灵。

但是，我要用最美好的话来夸夸纱丽——我在此地第一次见到的印度妇女服装。一整幅料子围成裙子，余下部分异常优雅地斜披在身上，使妇女们犹如丝绸卷成的闪光的火苗，丝绸的颜色有绿的、紫红的、紫的，从戴脚镯的脚踝一直裹到戴珠宝首饰的手臂和脖子。

不仅服饰，就连人的神态，端庄的风度，衣服上的金色回纹，雅利安型面容的严肃神色，也都象古希腊、罗马那么古朴典雅，使这些由重力和时间构成的极纯洁的造物，仿佛从早已湮灭的世界里再现出来一般。

一辆人力车拉着我沿滨海大街前进；这条大街是马德拉斯的骄傲，铺沥青的路面很宽阔，一边是一座座英国式花园，园内椰枣树疏落有致；一边是临海的堤岸，岸外就是孟加拉湾开阔的水域。路旁还有遍植树木的巨大公共建筑和网球场，只见黑皮肤的运动员相当起劲地在那里打球。我们顶着冬季第一个月的太阳，骄阳灼人，并未因冬季这个字眼而稍加收敛。拉我的人力车夫的背上，从黄褐色的脊梁凹处冒出汗水，我看见一大溜一大溜亮闪闪的汗水在滚滚流淌。

---

<sup>①</sup> 安，印度的一种辅币，等于一卢比的十六分之一。

马德拉斯水族馆以其珍奇展品，在周围极广阔的地区内享有盛名，我们去参观了。这个水族馆确实不同凡响。

这里只有二十个水池，个个都装满千奇百怪的生物，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身披铠甲的、不爱活动的大鱼，有轻盈的三色水母，有象硫磺那样黄的加那利鱼。还有一些长满胡须、能伸缩的小生物——这是些十分有趣的小生物，谁碰它就会受到电击；形如陀螺的“龙鱼”，鳍很大，备有防御武器，简直象中世纪参加马战的骑士，身上还披着破破烂烂的护边。“蝶鱼”宛如鳎鱼，背上象嵌着一根竿子，身上有蓝色和金色的宽条纹，在阳光充足的水池里游来游去。有的鱼象斑马，仿佛在水下举行化装舞会，身上是闪电般的蓝色，还缀有朱红色的回纹，绿宝石似的眼珠嵌在半开半闭的金色眼眶里。海马把尾巴卷在形成珊瑚的移植来的岩石上以支持自己。

海蛇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褐色和黑色的海蛇，有些如同一动不动的圆柱那样立在池底。另一些永远处于运动的折磨中，一刻不停地快速蜿蜒行进。

这里有海眼镜蛇，它跟陆地眼镜蛇同样凶险，甚至更毒。谁要是给它咬上一口，只能活几分钟就一命呜呼。在黑乎乎的网里捕到这种不祥宝货的那些渔夫，该是多么不幸！

在海眼镜蛇旁边的是印度洋海鳗，全都钻在一个小洞里；还有过群居生活的、残酷的海鳗，扭成一个难以

分辨的灰团。要拆散它们是徒劳的，它们会横渡水族馆很深的水池，去同自己的一群重新会合。它们是一群丑陋的女巫或被判受磨难的女囚，不停地弯曲扭动，简直是肠子般的怪物的大集会。

有一种一毫米大小的小鱼，身上只有一枚鳞片。灵活好奇的章鱼，本身就象一口陷阱。用两条腿走路的鱼活象个人，它们是黑魑魅的海里忧郁的居民，藏身在丝绒般的套子里。会唱歌的鱼用呼喊声把自己的鱼群聚集在一起。安赫尔·克鲁查加<sup>①</sup>吞吃过的那种鱼，是极古老的洪荒时期的鱼的现代标本。所有这些鱼，不是一动不动地伏在池底，就是不停地转圈，组成一个陌生的、几乎与人类相仿的世界，这里有勋位获得者、武士、乔装打扮者、奸诈之徒、英雄，全都在无声的、渴望着大海的深沉与孤寂的大合唱中翻腾，仿佛是纯净的物质在游动，又如运动中的色彩，具有子弹或灵柩的美丽外形。

我离开那个水族馆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家家户户门口，印度人都蹲在那里，慢悠悠地吃着摊在地面的宽叶子上的咖喱食品。妇女们都露出戴银镯的脚踝和戴宝石饰物的脚；男人们悒悒不乐，显得更加矮小、肤色更黑了，象是给印度的无边暮色和强烈的宗教气氛压扁了似的。

渔夫们在大石板砌的堰堤上，在沉沉的暮色里灵巧地织着网，惶恐的眼睛却走了神。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

---

<sup>①</sup> 安赫尔·克鲁查加（1893—1964），智利诗人。

一起，每群人中都有一个人就着摇曳的灯光在念什么；他的朗读简直是一种低声吟唱，声音有时有点儿粗重嘶哑，有时又低到几乎看不出嘴唇在动。他朗读的是祈祷词、赞美诗、有关宗教的传说、罗摩衍那<sup>①</sup>。

在朗读者提供的精神避难所里，那些顺从的被统治者找到了慰藉；在复苏大千世界和英雄梦的同时，寻觅着通往忘却即孕育希望的道路。

（林光 译）

---

<sup>①</sup> 罗摩衍那，一译《腊玛延那》。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共七卷。和《摩呵婆罗多》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

## “埃斯梅拉达”号<sup>①</sup>在列宁格勒

“埃斯梅拉达”号到了！“埃斯梅拉达”号到了！

厨房的窗子里露出一张张脸庞，司炉从他们的机车车辆厂里探出头来，孩子们象春天来临般地奔跑着，一脸胡子、拄着手杖、穿着条纹裤的老先生凝然伫立。人人都朝着一个点张望。所有深居简出的居民，一切不显眼的人们，都从他们栖息的地方出来，港口的五十个山冈都只朝着一个点张望。瓦尔帕莱索<sup>②</sup>所有的眼睛，包括那些甚至没有时间去看花朵和星星的眼睛，都同时去看渐次变大的一个白点，那是一只渐渐变大的白鸽——一艘白玫瑰花似的帆船，那就是“埃斯梅拉达”号。

要了解我的国家，那就必须认识“埃斯梅拉达”号。

智利是个峰峦叠起、地势险峻的国家，到处是刺天的山峰和令人目眩的深渊。铜矿和铁矿布满山峦。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智利有如一个巨大而狭窄的眺望台，崇山峻岭好象要把我们推走，我们智利人则排成一行面

---

① “埃斯梅拉达号”是智利的一艘帆船练习舰。

② 瓦尔帕莱索，智利的港口城市。

对着我们的海洋——狂怒的天地，波涛滚滚的大洋。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埃斯梅拉达”号成了我们的骄傲，它是我们海洋指环上的月亮宝石。

以前，我们有过很多艘叫这个名字的船只。这些船有的是英雄的船，有的却象过眼烟云，瞬息即逝。这个名字能留下来，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记得它；最漂亮的船都沿用这个名字，因为这个词儿意味着常青<sup>①</sup>。

不过，最新的这艘船却是最漂亮、最好的。

自从那位非凡的苏格兰人科克伦伯爵<sup>②</sup>带领智利船员解放了南方的这片海洋以来，智利人看到面前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海洋之路。西班牙帝国曾用铁锁把通往海洋的大门统统锁住，卡廖港和瓦尔的维亚港<sup>③</sup>的两次战斗把铁锁砸得粉碎。贸易往来承担了和平旗帜的作用。我们在瓦尔帕莱索迎送世界各国的船只。

茫茫的太平洋啊，你是我们星球的荣耀！你是那么浩瀚而神秘！

我们的愿望一向是：海上到处都有畅行无阻的航道，在欢迎和送别的话语中，让鲜花和矿石、歌声和机器、希望和谷物更换位置。战争的爆炸声、海战的轰鸣声转瞬即逝，被无垠的波涛湮没。原子弹的投掷在我们心上留下了创伤，但是海洋把创伤深深埋没了。因为海洋有

---

① 埃斯梅拉达，原文意为“翡翠”，故有“常青”之说。

② 科克伦（1775—1860），英国邓唐纳伯爵，苏格兰人。原为英国海军，1818年到美洲参加智利、秘鲁和巴西的解放斗争，有突出表现。

③ 卡廖，也译作卡亚俄，秘鲁的重要港口城市。瓦尔的维亚，智利南部港口城市。

远见卓识，善于促进交流，愿意缩短地球上的距离，欢迎新的船只、新的文明、新的变革、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使之相互了解并得到不断的发展。

此刻，我们的白色小船，正扬着被波罗的海强劲的海风鼓得满满的帆在滑行。它在驶近列宁格勒这座北方最美丽的城市，在那里，彼得大帝的雕像矗立在城中心，而列宁的形象则刻在心坎里和工厂里。

我们的小伙子们将要下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身影之间朝涅瓦大街<sup>①</sup>走去。他们将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sup>②</sup>欣赏世界上最精美的绘画和帝王们的珠宝。他们要登上比“埃斯梅拉达”号更小的一艘船，那艘船上的大炮曾帮助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那艘小船名叫“阿芙乐尔”号，而多年以前我参观那艘船的时候，该船船长使我倍感骄傲，因为他熟悉我的诗。

我为“埃斯梅拉达”号驶入苏联的港口而感到欢欣鼓舞。

有些人会在街头停下脚步，他们就是曾在列宁格勒难忘的被围困期间<sup>③</sup>挨饿受冻的年老居民，以及正在呼

---

① 涅瓦大街，列宁格勒历史悠久的一条大街，果戈里等作家对这条大街作过生动的描写。

②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是列宁格勒国立美术、历史、文化博物馆。18世纪时在宫廷收藏品的基础上建立的，1852年始开放供公众参观。

③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自1941年7月10日至1944年8月10日，苏军坚守列宁格勒长达三年零一个月，其中城市被围困时间为900天。在此期间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但是列宁格勒的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奋战，不但守住城市，还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德军。

吸新生的人类的自由空气的儿童。他们会遥望并且想象我那远在天边的、处于高高矿山和深深海洋之间的祖国。他们将看到，所有的路都会被人走遍，而通过我们这艘报春的船，俄罗斯鲜花盛开的五月已经同我们联在一起。当“埃斯梅拉达”号返回的时候，瓦尔帕莱索港万人空巷，争相张望从大海归来的这朵白玫瑰，我们从它的船头和那些巨大的洁白花瓣上，看到各国人民的情谊和了解具有了新的意义。

（林光 译）

## 重访特木科<sup>①</sup>

我再次来到特木科。这座城市已经大大改观，仿佛先前的城市已经搬走了。寒冬色调的木头房子业已变为阴沉沉的水泥大房子。街上的行人多了，停在五金商店门前的马匹和大车却少了。这是大街上有阿劳科人<sup>②</sup>走动的仅有的一个智利城市，现在依然如此，使我感到快慰。这里的阿劳科妇女身披紫红色的斗篷；阿劳科男人披的是黑色的篷丘<sup>③</sup>，上面有奇特的白色回纹，形如一道道闪电。从前，他们仅仅是来买卖编织品、蛋、鸡之类小商品的；现在增添了新内容。现在，我就说说我遇到的一件意外的事。

全城的人都来听我的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整个大厅里坐满了人，儿童的喊声和笑声四处回荡。儿童是伟大的开关，没有任何诗歌能够与想起吃早饭时间的儿童的叫喊声进行对抗。我登上舞台，群众向我欢呼，

---

① 特木科，智利考廷省省会。

② 阿劳科人，智利南部的印第安人。这个民族十分坚强勇敢，曾经给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反抗。

③ 篷丘，拉丁美洲人披的一种披风，形如毯子，中间开有领口。

我隐隐对那个能狠心伤害最慈爱的人的希律<sup>①</sup>感到有点儿羡慕。这时我听见周围安静下来；在这一片安静中，我又听见响起地球上最奇特、最原始、最古老、最粗犷的音乐声。这声音是从大厅尽头的一群人那里发出来的。

那是一群阿劳科人，他们为我奏起他们的乐器，唱起他们令人伤感的歌曲。我的这些不爱与人交往的同胞，带着他们的宗教仪式艺术前来参加一个诗歌和政治集会，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能亲临这种场景，更没有想到这种表达感情的行动竟是为我而发的。我倍受感动。当他们的皮鼓和巨笛奏起高于所有的音乐的音阶时，我的眼睛模糊了。那曲调既哑又尖；单调却又令人心碎。那曲调有如狂风吹刮的雨声，又如在地下受折磨的古代野兽的呻吟声。

这是诉说阿劳科人——或者说仅存的阿劳科人——多么感动，仿佛从远古的睡梦中醒来，盼望进到迄今还把他們拒之门外的世界里去。

（林光 译）

---

① 希律，残酷的犹太王。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朝拜，希律闻后，派人寻找那婴儿，没有找到，便把伯利恒城内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掉。

## 我的朋友保罗·艾吕雅

### 与世长辞了\*

对我来说，撰文悼念保罗·艾吕雅是十分困难的。我仿佛仍然看见他在我身旁，他那双视野开阔、目光深远的蓝眼睛，似乎仍然象电一样炯炯闪光。

这个平静的人是法兰西的鲜花之塔。这座宝塔耸立在月桂的根深叶茂的地基上，用水和玉石层层垒成，塔身上缠满老藤，藤上鲜花簇簇，光彩照人，鸟儿成群，歌声明澈。

明澈，这个字眼确实十分贴切。因为他的诗就是透明的水晶，犹如永恒洪流中的一汪清澈的水。

诗人心中充满至高无上的爱，充满地中海人纯洁的激情；在祖国横遭惨祸的日日夜夜，他把身心奉献给祖国，从心中喷发出坚决战斗的烈火。

因此，他顺乎自然地进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对艾吕

---

\* 这篇散文是作者在1952年保罗·艾吕雅逝世时写的。保罗·艾吕雅（1895—1952），法国诗人、社会活动家。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后发表反战诗歌；三十年代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响下，转向人民阵线。194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

雅来说，入党就是以自己的诗和生命证实人类和人道主义的价值。

决不要以为艾吕雅的政治家气质逊色于诗人气质。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精辟论据，往往令我叹服。我们一起研讨过许多事物、人和当代问题，他那高明的见解我将永远铭记。

他不为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所迷惑，因为他不是模仿者而是创造者，他用清醒和智慧的子弹，对着超现实主义的僵尸射击。

但是我朝夕相随的密友，但是现在我失去了他对我的须臾不可缺少的情谊。他带走的一切，再也没有人能给我填补上，因为他那强烈的兄弟情谊，是我一生中最珍贵、最引以为荣的享受。

他生前用自己的蓝色圆柱支撑了和平与欢乐的力量。他——和平的斗士、人民的诗人，现在带着生花妙手离去了。

法兰西的宝塔啊，我的兄弟！

我俯身看着你紧闭的双眸，你的眼睛仿佛仍在向我闪发出你播种在大地上的光辉和伟大，质朴和正直，善良和纯真。

（林光 译）

## 这寒意逼人的一天\*

他的离去有如仲夏时节的一天骤然寒意逼人，他是在他的作品倍受欣赏的时刻猝然长逝的。

我要给马里亚诺·拉托雷<sup>①</sup>的不是一篇悼词。

我要献给他生活在水边的智利涉禽的翅膀和凄厉的叫声，以及它蓦然飞起时有如一把带孝扇子那样黑白相间的羽毛。

我要献给他秧鸡的哀鸣；我还要献给他智利全部棕鸟有如胸膛里沸腾的热血似的红斑。

我要献给他黎明时分沿马乌莱河岸迎着河的芳香旅行的骑手脚上那沾满晨露的农家马刺。

我要高举起祖国的葡萄酒杯，盛满他描绘并享用的各种精华献给他。

我要给他留下一串鞋形草编的黄色念珠，给他撒下开在山涧的鲜花——纯洁的野花。

他还应该得到绿荫如盖的智利卫矛树的神秘低语和

---

\* 这篇是1955年作者为智利著名作家马里亚诺·拉托雷逝世而写的悼词。

① 马里亚诺·拉托雷(1886—1955)，智利著名作家。

而美酒的繁茂枝叶。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愧于我们献上的鲜花，而献给他的是波尔多村、爱神水、喇叭藤和月桂树编就的真正桂冠，从今天起已置放在阿劳科人的群山之巅。

无论是在夏日的阳光下还是在雨中，陪伴他的有收获葡萄的谣曲，还有在走廊里和屋檐下的梳着长发辫的村姑。

挂在脖子上的那条吉他的三色带子，连同谣曲的歌声，此刻花冠似地环绕他的遗体，并将与他为伴。

在他身旁我们听见了农民和大草原居民的脚步声，听见了矿工和渔民的脚步声，听见了在我们严酷的土地上劳动、耕作、挖掘并使之变成沃野的人们的脚步声。

在这个时刻，五谷在孕穗，而且再过不久，成熟的麦穗就会翻腾起金黄的浪花，怀念离去的人。

从维多利亚<sup>①</sup>往南直到那些翠绿的小岛，在田野上和村庄里，在茅屋里和道路上，他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将永远想着他。载着海产的小帆船将在海上飞驰，可是在这些小岛之间再也不见马里亚诺的踪影。

他热爱智利的大地和海洋，他以耐心、智慧和爱征服了智利的大地和海洋，他的语言和湛蓝的眼睛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在我们美洲，任何国度的统治者只会奉送本国的财富。作家则和人民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捍卫并维护民族

---

① 维多利亚，智利最北省份塔拉帕卡的一个村镇。

的遗产。如果我们的习俗和服饰遭到亵渎，作家以后也一定会寻回我们的歌曲和吉他——象马里亚诺·拉托雷那样的人们曾经用民族的歌声不屈不挠地保卫过的财富。

我们要在他那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探索，通过他那些珍贵的作品去认识并捍卫我们民族特有的一切。

是祖国大地造就了经典作家，或者说，经典作家是其著作与祖国大地结合的产儿；很可能马里亚诺·拉托雷就是我们身边的第一个经典作家，然而我们却没有认识到他对祖国大地的耿耿忠诚所具有的永恒意义。由于他的著作，故人、工具和小鸟、语言和倦意、动物和节日，将永远使人感到清新。

他的心是一只用马乌莱森林出产的香木制成的船，在马乌莱河口的造船厂里精工捶打修造而成，它将继续载着祖国的气度、花朵和诗歌航行在汪洋大海中。

（林光 译）

## 复苏而又活跃的万徒勒里\*

万徒勒里<sup>①</sup>是我多年的朋友，虽然我已年过半百，而他还不满三十。这小子体格魁梧，沉默寡言。他笑起来，眼睛和双手都会活动，据说画家全这样。可我们诗人却不会活动自己的两只手。画家能把话说到一半，就把它从半空截来，加以铸造，粘在墙上，进行描绘。

万徒勒里曾经长年患有肺病，就在山那边，在高耸云霄的智利山区的一座疗养院里治疗。那时节，真是神秘莫测的时代。眼瞧着画家已经奄奄一息，我们都为他准备后事了，情况居然起了变化。他源源不断地把数十幅出类拔萃的绘画作品给我们送来；这些画稿，都是他精心绘制的，色彩强烈，且饱含激情：深黄里搀和血红、赭色中兑进墨绿，这只有万徒勒里才能运用自如。

那时候，我也在那儿活动，奔走于街道、矿山和河川之间，为的是向和苍蝇一样骚扰我们国家的该死的暴君进行斗争。他的画卷和我的诗稿常常从白雪皑皑的高

---

\* 这篇散文写于1955年。

① 何塞·万徒勒里：智利著名画家。

山下来，或者到郁郁葱葱的群岛上，川流不息。在这闪电般的交流中，我感到，我的诗歌有了光彩；而同时，我的诗歌对于他的绘画，也有所增色。

这是旅游者和游击队般的会晤。在赋予我们生命的这片土地上，我和万徒勒里都是旅游者和游击队员。锋利似剑的智利，有雪，有沙，也有海洋和山峦造成的灾难创伤；她既有漫长的、金黄色的海洋之春，也有犹如狗一般对着穷人家门口狺狺狂吠的贫困。

就这样，我们常常彼此倾诉内心的忧虑，相互交换各有特色的灯具<sup>①</sup>；我们在工作中的友谊从此就诞生了。

后来，我的行动比万徒勒里还要神秘，我躲到我家乡最隐蔽的地方去了，因为警察到处搜捕我。他们就是那只苍蝇的警察；不过，我当然也不会让人家发现，于是，我就换房子，换街道，换城市，我就改换烟雾，改换影子。

当时，我正着手创作《漫歌集》<sup>②</sup>。由于刚写好的稿纸很可能落入追捕者的手中，所以，我一脱稿，便立即通过秘密的渠道去打字誉清，印刷出版。

复苏了的而又积极活跃的万徒勒里领导了这一秘密的出版工作。正如若热·亚马多所说，他在秘密的“自

---

① 大约是指两人的作品，因为它们和神话传说中的神灯一样，都很宝贵。

② 《漫歌集》是聂鲁达一生卷帙最为浩繁的长诗集，凡十五章，1943年起着手创作，1950年出版。

由地下王国”把成千上万张白纸变成了书籍。警察审问所有的人，而且还常常坐在整捆整捆的印有我的作品的纸张上审问，所以，有时候几乎一切都会落入苍蝇之手。可万徒勒里还是来来去去地搬着纸张，改着校样，整理着分散隐蔽在各秘密地点的书本的各个部分，仿佛修复着史前动物的一副骨骼。

然而，即便在这种赶路人和游击队员般来去匆匆的过程中，万徒勒里还给我的诗歌画了引人入胜的插图。他用十字架和尖刀为征服者造像，为矮小的安第斯山印第安人英勇的轻骑兵、被机枪扫射的罢工者造像。他还画出了我诗歌中奇情异想的化身：一个漂白土水罐和一只蝴蝶、一个在船头上空飞翔的裸体塑像。

万徒勒里象美洲一样伟大、满怀稚气和激情。他也会突然变得异常猛烈。除了丧服和乌鸦之外，他一无所见。他得不到别人的保护。他眼观无底深渊，走向死亡。我们人民都会死的，都会因不堪种种残酷现实的重压而倒下，都没法再活下去了。但是，突然，万徒勒里莞尔一笑，一切都改变了。他笔下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统统因其成熟而消除了：行动是希望之母。

（林一安 译）

## 我们伟大的兄弟马雅可夫斯基\*

我绝不反对有关文学的重大争论，但我承认自己不擅争论，不象鸭子游水那样随心所欲。我喜爱文学争论，但作诗才是我的本行。

虽然一谈到马雅可夫斯基就要卷入争论，虽然那位伟大的诗人在这块天地里挥洒自如，犹如雄鹰拍击长空（因为在诗的王国中本来就有各色羽毛在飞舞），我却要热情而扼要地来谈论他，不去涉及他那丰富的生活和不幸的殒灭。

马雅可夫斯基是把党和积极行动的无产阶级写进诗里的第一位诗人，他把这些内容化作极好的诗的材料。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是对整个文学作出的贡献，可与波德莱尔<sup>①</sup>或惠特曼对于当代诗歌的贡献相媲美，我的意思是，马雅可夫斯基并不是创立了什么教条，而

---

\*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悼念马雅可夫斯基而作，1957年8月写于北京。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著有诗集《恶之花》等。

是在诗歌创作中作出了贡献。因为内容方面的一切革新如果没有经过消化，没有成为思想的滋补物，就只能是思想的外部刺激剂。马雅可夫斯基把斗争的严肃题材、会议的枯燥内容融进诗中，而这些内容经过他的生花妙笔，就变成了奇妙的武器、红色的杜鹃花。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诗都必须是政治诗和政党诗，但是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后，每天都在涌现的真正的诗人又会在真正的诗的许多条道路之外多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马雅可夫斯基的心中燃着不熄的火。他是个著述极多的诗人，我有这样的感觉，马雅可夫斯基也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sup>①</sup>一样，虽然其诗歌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却仍有许多东西可以表达、创作、歌颂。我觉得这两位施展才能的最好年华去世的年轻诗人，很象两个刚露出双足的巨人，他们的全部高度是要用万仞高山来比拟的。我是说，只有他们掌握着超越自己的钥匙，可惜的是钥匙已经丢失，被埋葬在西班牙和俄国的地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文辞泼辣狂放的诗人。他有奇特的天分，会运用大师的一切手段和计谋。他的诗作是一系列留下明亮痕迹的闪闪发光的急速的形象。他的诗时而辛辣、尖刻，时而又充满最纯洁的情感。他生来就

---

<sup>①</sup>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著有《吉卜塞谣曲》等诗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遭法西斯分子杀害。

是个既暴烈又温柔的人，既是他的作品之父，又是他的作品之子。

他还富有讽刺才能。

他的那些讽刺官僚政治的作品振聋发聩，至今仍在苏联的剧院里上演，并且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他对小资产阶级的讽刺简直到了严酷甚至仇恨的地步。对那些被一个制度的弊病扭曲的人们持这种严酷的态度，我们可以不赞成，可以不以为然，但是，伟大的讽刺家们总是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斯威夫特<sup>①</sup>如此，果戈里也是如此。

苏联文学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好的作品和坏的作品，可是对于我来说，马雅可夫斯基始终是一个高塔般屹立的诗人。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他的存在，看到这个巨人般年轻人的头、手和双脚，他用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身体和他的一切来写诗，用他的才智、匠人的巧妙和战士的勇猛来写诗。

我们正满怀激情和骄傲迎接十月革命的这个周年，在这庆祝与思考的日子里，我停下旅行的脚步，向我们伟大的兄弟马雅可夫斯基致敬。

在这样的日子里——马雅可夫斯基本来会比任何人都更加热情地高歌——我谨向他献上一朵玫瑰，仅此一朵红色的玫瑰。

（江禾 译）

---

<sup>①</sup>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著有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等。

## 同样面孔的两帧相片

出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两位少年的相片，很偶然地一起挂到我家的同一面墙上了。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可是，在我家中看到这两帧相片的人，无不感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说这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的目光里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这两个人都有一头又粗又硬的头发；同样的眉毛，同样的鼻子，同样带着挑战神情的年轻面孔。

一帧是兰波<sup>①</sup>的相片，是这位法国诗人在十六岁时由卡哈特照的；另一帧是马雅可夫斯基<sup>②</sup>的相片，是这位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在1909年照的，当时他正在斯特罗加诺夫应用艺术学校求学。

这两位少年的相片有共同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们

---

① 阿尔图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前期诗作反映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等事件。巴黎公社失败后，转向象征主义，作品中充满悲观绝望思想，并认为幻觉和暧昧的主观世界构成诗的“真实”。但是1873年起他便与诗歌诀别了。

②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早期杰出的革命诗人。他的创作，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苏联无产阶级诗歌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人生的第一阶段就遇到矛盾。他们眉宇间透出轻蔑和严厉：是两个叛逆天使的面孔。

也许是揭示出发现者本质的某种神秘的天意，要把他们放在一起。

他们两个就是发现者。兰波改变了写诗的方法，使诗具有最强烈的美。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出类拔萃的诗歌建造者，创造了革命与柔情的坚不可摧的联合。这两位年轻的发现者的面孔，很偶然地一起挂在我家的一面墙上，都同样用探索世界和人类心灵的目光注视我。

不过，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我们才知道他的七十五岁诞辰就在这几天。我们本来可以找到他，同他聊聊，也许我们早已成为好朋友了。

这个念头使我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有人肯定我可能认识沃尔特·惠特曼<sup>①</sup>一样。那位苏维埃诗人是如此荣耀和神奇，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象出怎样目睹他走进莫斯科的阿拉格维餐厅，或者只在一旁凝视他的魁伟身躯站在台上朗诵阶梯式的诗句，这些诗有如千军万马随着充满火药味和激情的滚滚浪涛所发出的响亮节拍，在冲锋陷阵。

的确，他的形象和他的诗已经成为革命和新的国家手中的一束青铜铸的花朵。这些坚不可摧的花朵，当然都是精心制成的，和金属一样坚硬、牢固，但是，并不

---

<sup>①</sup>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民主诗人，生于纽约长岛一个农家，当过木工、排字工、教师、报纸编辑。他的主要诗集是《草叶集》，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因此就不能结出硕果。变革之风带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参加了变革，这正是他的命运的伟大之处。

把真正的诗歌同自己祖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结合在一起，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独特的观念。这一点使他的诗与兰波的诗永远分道扬镳了，因为兰波是个伟大的失败者，是失落的起义者中最了不起的一个。马雅可夫斯基尽管死得很惨，却是讴歌和感受一场人类最伟大胜利的人。在这方面，他更象惠特曼。他们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斗争并与伟大时代共命运。惠特曼绝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战争的装饰品，他的诗随着战斗的胜败而发展起来。马雅可夫斯基讴歌的是他的祖国满布工厂、实验室、学校的城市和农村的景色。他的诗具有推动巨大的星际火箭的强大动力。

这几天就应该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七十五岁诞辰了。但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啊！

（林光 译）

## 毕加索是一支种族\*

我们美洲有无穷无尽的发现：人们突然会在荒无人烟的岛屿或者躁动不安的丛林的地底下发现黄金塑像、绘有图画的石块、绿松石项链、巨大的头颅。这都是那些不计其数的生灵<sup>的</sup>的遗物，他们还不为世人所知，需要去探索，去命名，以便使他们不致辜负数百年的沉寂。

如果在我们美洲某一个岛屿上，接连有好几个地层里发现了毕加索，发现了他那丰碑似的不朽抽象、他在石窟里的创作、他的精致的珍宝、他的表现幸福和恐怖的绘画。那么，惊讶万分的考古学家们一定会去搜寻曾经创造和积累了寓言般丰富的物品和奇迹的居民和文化。

毕加索就是一座岛屿。就是一块由亚尔古英雄<sup>①</sup>、加勒比人、雄牛和甜橙主宰的大陆。毕加索是一支种族。在他心中，太阳是不会没落的。

（林一安 译）

---

\* 这篇是作者于1971年10月在巴黎为庆祝毕加索九十诞辰而写的贺词。

① 据希腊神话，亚尔古是到海外觅取金羊毛的英雄。

## 美洲，请不要熄灭你的明灯\*

在我看来，你们的祖国曾历经沧桑，它有别于人类所生息、幻想、获胜、讴歌的其他疆土。在我看来，秘鲁是美洲的摇篮，遍地是被奇特的泡沫销蚀的巨石、奔流于深谷的河流和深深埋在地下的矿藏。历史惊愕地从印加人那里接过的不是一顶火与苦难铸成的小小王冠，而是用最灵活的巧手开凿的广阔空间。这双手能奏出凄楚的和令人肃然起敬的曲调，能竖起面对无限时间的巨石。

印加人还以终年不变的力量，为美洲留下沉思的动人印记，这种细腻、动人的神情在器皿、珠宝、雕像、编织品和有修养的沉默上都能见到，它将永远照耀通往美洲心灵深处的道路。当富饶的印加征服者浪潮般涌进我的国土时，他们给极度愚昧的阿劳科人带来了宗教仪式和服装在纺织方面的联系。当生机盎然的南方防护林接触到神圣的绿松石和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器皿的时候，

---

\* 这篇散文是作者1943年在秘鲁旅行时写的。

我们不知道精华之水的渗入，对我国觉醒的影响有多深，对我们地缘成熟的作用有多大。我的诗只是这一成熟的反映。

之后，老征服者<sup>①</sup>的光环使我们神奇的生活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在秘鲁，土地、黄金和利刃就象地质层那样互相取代。经过耕作的土地变得明亮而又生机勃勃，有如精选的种子迅速生长，盛满大小容器，为人类解除饥渴；黄金超过时间和大洋，从埋藏地下的雕像的隐身处为各地操各种语言的人们带来力量；利刃则以其本质所具有的锋芒，逐渐造成遗恨和种族。

在你们秘鲁大地上，有一种世界性的东西，一种具有强大威力和光芒四射的东西，任何一种时尚，任何一种风格都不能将它湮没，仿佛在你们疆土的地下有一尊巨型卧像，这尊由矿石和磷塑成的卧像坚如磐石，而且是有机体的整体，身上仍然披着彩衣，佩戴着珠宝；尽管时间与沙土将它掩埋，它仍然在被人遗弃的石头上，在渺无人烟的土地上露出茁壮的身躯。美洲就是你们的秘鲁，你们十八世纪的和原始的秘鲁。你们的祖国神秘、高傲而又古老；在美洲任何一个国度，我们都找不到凝聚着美洲本质的东西，你们却用斟满黄金与玉米的酒杯，为我们美洲勾勒出一幅神秘莫测的远景。

秘鲁的美洲人，如果我这个来自南方的人已经触及你们的外表，如果我已经剖开你们友爱的神圣果实，请

---

① 指印加人，也就是上文的“印加征服者”。

你们不要以为我的心也不向你们的现状与伟大靠拢，便离你们而去。因此，请原谅我这个地道的美洲人对你们的沉默评头品足。

多少年来，在整个沉默的美洲，有两个国家——美洲自由的瞭望塔和发祥地——一直注视着你们。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智利，一个是墨西哥。

这两个国家地处本大陆条件恶劣的两端。当美洲的生命勇敢地要求墨西哥用我们美洲的基本实体去对付北方求实的大国时，她当之无愧地成了我们的鲜血的桥头堡。当我们整个星球的自由受到威胁，具有高贵血统的北美人起而捍卫的时候，又是墨西哥首先举起了旗帜。

正如西蒙·博利瓦尔<sup>①</sup>所预言的那样，智利获得过自由。我的祖国在贫瘠的土地上流血流汗，而且遇到了极其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如此，它仍以同样的热忱和灵巧劳动着，同我们不同纬度地区的恶劣气候条件斗争着，终于触动了人类的心，把这颗心象一只闪射自由光芒的酒杯那样高高举起。在历史上，我的祖国忍辱负重，苦苦挣扎，一步步走向黎明，至今我们智利人仍然天天在坚持不懈地驱散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阴霾。

我们两个国家，一个地处南部，一个具有音乐性和爆破力，都满怀期望地注视着秘鲁，盼望她肩负起美洲人这个称号所赋予的责任。既然在美洲的艰难历程中，

---

<sup>①</sup> 西蒙·博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军事家、作家。是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解放战争的领袖，有“南美洲的解放者”之称。

你们亲手燃起了有朝一日可能被晨风永远扑灭的自由之火。那么，不仅为了你们的国家，也为了整个伟大的美洲。你们有责任保存这一具有生命力的火种，并让它永远熊熊燃烧。到明天，如果我们看一下有秀丽河流和壮观火山的美洲地图，我们会看到，在有些地区暴政被困于结成冰的泪水中；我们会发现，在美洲最繁荣、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里又产生了新的暴君。这些新暴君同昔日我们深受其害的暴君毫无二致，也佩戴着有穗的肩章，手持皮鞭和大刀。我们看到，那些凶残的原始野兽——老虎和鳄鱼，如何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所剩无几的自由。因此，秘鲁人、智利人、哥伦比亚人和所有那些呼吸着史前野兽留给我们的自由空气的人们，都要多加小心，要加倍小心。我们要提防那些业已暴毙的古代野兽，尽管它们连同其有防御作用的巨型骨骼、昔日的威风 and 沾满血迹的肢体，已被分类放置在博物馆里。在当今世界上，仍有统治他人的欲望，仍有蹂躏他人的恶毒用心，我们的刽子手夜以继日地窥伺着我们。同时，也要提防我们内部虚伪的解放者，他们丝毫不理解当今的时代精神，妄图把奉献在人类自由的祭坛上的花束变成暴力。

害怕光明的反动派和精神空虚的蛊惑者都仇视美洲自由的儿子，诸如苏克雷<sup>①</sup>、博利瓦尔、奥希金斯<sup>②</sup>、莫

---

① 苏克雷（1795—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军事家。

② 奥希金斯（1776—1842），智利政治家、将军。

雷洛斯<sup>①</sup>、阿蒂加斯<sup>②</sup>、圣马丁、马里亚特吉<sup>③</sup>。美洲的自由将在我们的行动和思想中诞生。

(王小方 译)

- 
- ① 莫雷洛斯 (1765—1815)，墨西哥教士、爱国者。  
② 阿蒂加斯 (1764—1850)，乌拉圭独立时期的将军。  
③ 马里亚特吉 (1895—1930)，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作家。

## 诗人不是弃石\*

校长发表了精彩的讲话。我认为，他把诗人和人民联系起来的那段话尤为精彩。

我又一次成了这样的诗人。

我说又一次，是因为在历史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出于崇敬，还是由于痛苦或欢乐，都有责任把诗人和人民联系起来。

一个诗人在成长初期，应该以饱满的热忱汲取祖国的精华，然后把它归还给祖国。他应该再现并奉献祖国的精华。他的诗歌和他的行为应有助于人民的成熟和发展。

诗人是不可能被根除的，只有暴力才能使然。即使出现这种情况，诗人的根须也应该穿过海底；诗人的种子应该随风飞扬，以便再次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诗人的民族性应该是深思熟虑的，对祖国的爱应该是成熟的。

诗人不是弃石。他负有两项神圣使命：启程与回

---

\* 这篇是1954年6月20日在为诗歌研究而设的“巴勃罗·聂鲁达基金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

归。

一去不复回的诗人是世界主义者；而世界主义不是真正的人，只是行将熄灭的火光的闪现。尤其是在这些孤寂的国家里，在这些被排挤在地球夹缝中的国家里，作为我们民族最初标志的见证人，无论高贵与卑贱，都有幸创造自己的国家，都有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父。

我一本一本地搜集着记载世界文化的书籍，一个一个地搜集着各大洋的贝壳。现在，我把七大洋的精华奉献给这所大学，因为我的良知要求我这么做，因为我要偿还人民赠给我的财富，哪怕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所大学的成立并不是凭借什么法令，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这所大学由戈麦斯·米利亚斯校长赋予新内容的进步传统，起源于我们历史的变革时期。它是我们旗帜上的一颗明星。它决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将来，它会成为一所最大的、最富有民众性的大学，并与我们期待的深刻变革步调一致。这些书是我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它们曾经跟着我长途跋涉。不过，其中不少书比年过半百的我要大四五百岁。有些书是我在中国时别人赠送的，有些书则是我在墨西哥买的。有上百部书是在巴黎弄到的。从苏联，我带回来几本极其珍贵的书。所有这些书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环球旅行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一直耐心地寻找它们；每当发现一册，便感到难以名状的欢乐。这些充满睿智和美的书使我获益匪浅。从现在起，这些秉性慷慨的书籍，将使更多的人获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有人浏览这些书目时，也许不会理解收集这些书的用意，也不会理解为什么将这些书收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部1838年出版的小哥达年鉴。当代人通过这些哥达年鉴，可以了解昔日的贵族和权势显赫的家族的头衔。这是“虚荣集市”上的一份货单。

我之所以有这本书，是因为在这本用小字体印刷的书中，有一行不起眼的文字：

1837年2月12日，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因决斗去世。

这行文字象把匕首扎了我一刀。至今，全世界的诗歌还因为这个伤口在流淌鲜血。

还有一本《吉卜赛谣曲》<sup>①</sup>，上面有另一位被害诗人的题词。费德里科<sup>②</sup>当着我的面留下这段表现豁达胸怀的题词，而也已去世的保罗·艾吕雅也在他的诗集的扉页上留下自己的签名。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题词和签名将永存于世。但是，他们已经离去了。

在巴黎时，一天晚上，我的朋友们来为我庆贺。那位法国的伟大诗人也来庆贺，并给我带来一件珍贵礼物。那是一部秘密印刷的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雨果曾遭一个卑鄙的暴君的迫害。他还给我带来另一件礼

---

① 是西班牙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的一本诗集。

② 即加西亚·洛尔卡的名字。

物；或许可以说是我生平最珍贵的东西了。那是伊莎贝尔·兰波在马赛医院里写给她母亲的两封信，信中描述了她兄弟<sup>①</sup>弥留之际的痛苦情状。

那是令人肝胆俱摧的见证物。保罗把这两封信送给我时对我说：“请注意，信的结尾戛然而止，只是说：‘阿尔图尔<sup>②</sup>心中想的是……’其余部分再也未能找到。这就是兰波<sup>③</sup>，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这两封信也在这里。

这里还有我搜集到的加尔西拉索<sup>④</sup>的第一部作品，我至今没有忘记用五比塞塔买下这部作品时的激动心情。那是1549年的版本。这里有贡戈拉的作品，是弗兰德出版商冯本斯于十七世纪出版的精装本。当时，诗人的作品并不都受推崇。尽管在马德里的加西亚·里科书店里，我花了一百比塞塔，我还是设法按月付款给它，每月付十比塞塔。当我请求分期付款时，加西亚·里科这位看似卡斯蒂利亚的粗汉，实则十分慷慨的老板显出的惊讶神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还有我喜爱的“黄金时代”的两位诗人的初版作品。那就是佩德罗·索托·德·罗哈斯<sup>⑤</sup>写的《爱之悟抒情诗》和弗朗西斯科·德·拉托雷写的梦幻诗：

……晴朗的天空，阴森的夜，  
明亮的眼睛，晶莹的冠，

---

①②③ 均指法国诗人阿尔图尔·兰波（1854—1891）。

④ 加尔西拉索（1501—1536），西班牙诗人。

⑤ 佩德罗·索托·德·罗哈斯（1584？—1685？），西班牙诗人。

一泓清水般的卡西欧佩阿、  
安德罗梅达和佩尔塞奥……

这么多的书，如此丰富的内容！在这里，时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我还记得，我在巴黎和拉斐尔·阿尔维蒂一起住在塞纳河边的情景。我和拉斐尔都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现实主义的时代，是诗人“富态”<sup>①</sup>的时代。

拉斐尔常常用加的斯人特有的欢快语调对我说：“诗人‘穷酸相’<sup>②</sup>的时代该结束了。浪漫主义时期‘穷酸相’的诗人已经够多的了。”

我们要象巴尔扎克那样“富态”，而不要象贝克尔<sup>③</sup>那样干瘦。我们的住所下面有一家书店，橱窗里摆着维克多·雨果的全部作品。出门时，我们总爱在橱窗前停下来打量一番。

“你有多胖？”

“有海上劳工<sup>④</sup>那么胖。你呢？”

“我只有巴黎圣母<sup>⑤</sup>那么瘦。”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关于动物和树木花草的书？答案就在我的诗里。

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关于动物和植物的书总是使我激动不已。这些书使我的童年得以延续，为我展示了

---

①② “富态”，原文意为“胖”，又有“头等”的意思；“穷酸相”，原文意为“瘦”，又有“软弱无力”的意思。

③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浪漫主义作家。

④⑤ 指雨果的名著《海上劳工》和《巴黎圣母院》。

广袤的世界和大自然永不泯灭的迷宫。我喜爱这些探讨地球奥秘的书，往往不看上一眼那些五彩缤纷的小岛和光彩夺目、手表般结构复杂的昆虫的画像，便难以入睡。

不管怎么说，我的奉献，我的偿还，我交给校长。并通过他交给国家宝库的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说到底，这些只是我浪迹天涯时搜集的有关各国文化本质的片断。书就在这里。我不属于到处炫耀自己家族的光荣史、而后将其拍卖的那种家庭。

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贫困，我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并搜集着这些珍贵书籍，搜集着这些象征大洋精华的贝壳。现在，我把这些献给这所大学，也就是献给大家。

再说一句话。

作为对江河日下的风尚的反抗，我们这代人曾经不爱书，也不爱文学。先前，我们极端仇视那些以卑鄙手法毒害人们的精神鸦片。我们是生活的自然之子。

然而，知识使自然得以延续，智慧揭示出万物间最久远，或最简单的关系。而知识和关系，自然和人，都在书中得到反映。

我不是思想家，我搜集这些书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不如说是为了表示对它们的敬意。这些美妙无比的书照亮了我的心，这些人类思维的结晶赋予我以理性。不过，我爱这些书，还因为我把它们看作珍贵的物品，时间的精华，人类的重要成果。从现在起，这些书就属于

无数的新读者了。

这样，曾经给我以光明的书籍，也得到了光明。

（王小方 译）

## 只要有爱，就值得活在世上\*

许多年前，我沿着朗科湖<sup>①</sup>向内地走去，我觉得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受大自然爱护的诗歌的天生摇篮。

天空从柏树高高的树冠之间露出来，空气飘逸着密林的芳香。一切都有响声，又都寂静无声。隐匿的鸟儿在切切低语，果实和树枝落下时擦响树叶，在神秘而又庄严的瞬间一切都停止了，大森林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期待什么。那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诞生的是一条河流。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但是它最初涌出的纯洁的、暗色的水流几乎无法看见，涓细而且悄然无声，正在枯死的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

千年树叶落在它的源头，过去的一切都要阻挡它的去路，却只能使它的道路溢满芳香。年轻的河流摧毁腐朽的枯叶，满载着新鲜的养分在自己行进的路上散发。

我当时想，诗歌的产生也是这样。它来自目力所不

---

\* 这篇是作者五十岁诞辰时在智利大学发表的演说。

① 朗科湖，在智利南部，位于安第斯山麓。

及的高处，它的源头神秘而又模糊，荒凉而又芳香，象河流那样容纳一切汇入的小溪，在群山中间寻觅出路，在草原上发出琤琮的歌声。

它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食粮。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

它把人们联结起来，而且在他们中建立起村庄。它带着繁衍生命的根穿过山谷。

歌唱和繁殖就是诗。

它离开神秘的地下，繁殖着，唱着歌向前奔流。它以不断增长的运动产生出能量，去磨粉、鞣皮、锯木、给城市以光明。它造福，黎明时岸边彩旗飞扬；总要在会唱歌的河边欢庆节日。

我记得在佛罗伦萨时，有一天去参观一家工厂。在厂里我给聚集在一起的工人朗诵我的诗，朗诵时我极其羞怯，这是任何一个来自年轻大陆的人在仍然活在那里的神圣幽灵近旁说话时都会有的心情。随后，该厂工人送我一件纪念品，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是一本1484年版的彼特拉克<sup>①</sup>诗集。

诗已随河水流过，在那家工厂里歌唱过，而且已经同工人们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我心目中的那位永远穿着修士罩袍的彼特拉克，是那些纯朴的意大利人中的一员，而我满怀敬意捧在手里、对我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的

---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

那本书，只不过是拿在一个普通人手里的绝妙工具。

我想，前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的有我的许多同胞，还有一些别国的男女知名人士，他们绝不是来祝贺我个人，而是来赞扬诗人们的责任和诗的普遍发展。

我们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我很高兴。想到我的那些经历和写过的东西能使我们接近起来，我感到由衷的欣慰。确保全体人类相互认识 and 了解，是人道主义者的首要责任和知识界的基本任务。只要有爱，就值得去战斗和歌唱，就值得活在世上。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被大海和茫茫雪山隔绝的国度里，你们不是在为我，而是在为人类的胜利而举行庆祝。因为，如果这些高山中最高的山，如果这汹涌的波涛最激烈的太平洋波涛，曾经企图阻止我们的祖国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曾经反对各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文化的统一，现在这些高山被征服了，大洋也被战胜了。

在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国家里，我的人民和我的诗歌为增进交往和友谊进行了斗争。

这所大学履行其学术职责，接待我们大家，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的胜利和智利这颗星辰的荣耀。

鲁文·达里奥在我们南极星的照耀下生活过。他来自我们美洲美妙的热带地区。他大概是在一个跟今天一样的天空澄碧、白雪皑皑的冬日来到瓦尔帕莱索的，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

今天，我向他那星星般的壮丽，向他那仍在照耀我们的晶莹的魅力，寄予我的全部思念和敬意。

昨夜，我收到第一批礼物。其中有劳拉·罗迪格带给我的一件珍品，我十分激动地把它打开来。这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死的十四行诗》的手稿，是用铅笔写的，而且通篇是修改的字迹。这份手稿写于一九一四年，但依然可以领略到她那笔力雄健的书法特色。

我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sup>①</sup>那样的潜在的震撼力。

此刻，我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鲁文·达里奥都当作智利诗人来怀念，在我年满五十周岁之际，我想说，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我感激他们，感激所有在我之前用各种文字从事笔耕的人。他们的名字举不胜举，他们有如繁星布满整个天空。

（林光 译）

---

<sup>①</sup>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 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埃尼奥·西尔维拉是出版家又是我朋友，他对我说，三位巴西诗友出色地翻译了我的这本诗集，我应该为它写几句卷头语。

这种情况，就象在一大桌宾客中间不得不站起来祝酒那样，真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已经五十三岁，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诗，更不知道怎样为我所不懂的东西下定义。我也不可能就这种费解而同时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向任何人提供有益的意见。

无论在孩提时还是长大成人后，我主要接触的是潺潺河流和婉啭鸣禽，而不是图书馆和作家。

我也肩负起诗人古已有之的天职：保卫人民，保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这一点事关重大吗？我相信，这对古往今来所有写过诗、正在写诗和将要写诗的人来说，有同样的吸引

---

\* 这篇是作者为他的作品葡萄牙文版所写的序言，该书出版于1957年4月。

力。爱，明摆着必然与这些相关，而且必然以其炽热的激情来飨读者。

我时常读有关诗的评论，但从来没有读完过。一些过分聪明的人立意遮暗光明，把面包变成炭，把话语变成螺钉。为了使可怜的诗人同劳苦的亲人，同世上的同志隔绝，他们对诗人说出形形色色动听的谎言。“你是魔术师，”他们一再对诗人说，“你是个最深沉的神明。”有时诗人们相信了诸如此类的货色，以为得到了一顶王冠，竟鹦鹉学舌起来。其实，这一流谄媚者是想把一个对他们有危险的领域——沟通人类的诗歌，从我们手里夺走。

象这样为了用诗行骗和把诗神秘化而炮制出来的连篇累牍的论文，我不但不看，还十分反感。这种论文使我想起来某些极地部落的食品，这些食品由一些人长时间咀嚼后，让另一些人吞咽下去。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但我要邀请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到智利南方的红栎林里去（我在那里懂得了爱这片土地），到织袜厂去，到锰矿去（那里的工人都认识我），或者到任何一个能吃到煎鱼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人类是否应该划分为自然的人和不自然的人，划分为现实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我认为只要把具有人性的人放在一边，把不具有人性的人放在另一边，这就够了。后一种人与诗是不相干的，或者至少与我的诗歌毫不相干。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我站在这张巴西餐桌

旁边，大家要求我说几句祝酒词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得太少了。我不拒绝说这许多话（因而打破了我不愿意写序言和献词的习惯），是因为与巴西这一富有诗意的、广袤和深沉的国家有关，我爱她，而且她令我神往。

我是在南美南部，在冷雨浇淋下成长起来的。在那里，用智利南方人的话说，这种冷雨一年有十三个月浇淋着村庄、山峦和道路，甚至淋湿了散布在太平洋中的群岛，冻僵了凄凉的巴塔哥尼亚<sup>①</sup>，冰封了纯净的南极。

所以，阳光明媚的巴西在美洲地图上象只绿色巨蝶在展翅飞舞，她曾使我激动，使我遐想，去寻觅她那有神秘吸引力的踪迹。不过，当我发现她的人民温柔、强大而且友好的时候，这片难忘的土地便使我的心灵得到满足。

我怀着深深的爱把我的诗奉献给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林光 译）

---

<sup>①</sup> 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原。

## 拉托雷、普拉多和我

### 自己的踪迹\*

我很少参加这一类活动，所以我事先了解了要我讲演的题目。我看到朋友们的建议中有两位杰出作家的名字，那便是佩德罗·普拉多<sup>①</sup>和马里亚诺·拉托雷，两人都曾是这个系<sup>②</sup>的成员，两人都永远地摆脱了尘世的烦恼。

这两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回响。

我从未与马里亚诺·拉托雷交往，我之所以赞赏这位擅于描绘、塑造我们祖国的大作家的才能，完全是凭着我的思考与判断。一个真正的民族作家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缺少的最纯粹的英雄。世事的变幻、作家为其劳动付出牺牲的程度、年轻一代急急忙忙强做出来的冷漠以及评论界的恶意、偏颇和浅见都不会改变这一事

---

\* 这篇是作者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的演说，时为1962年8月30日。

① 佩德罗·普拉多(1886—1952)，智利作家。

② 指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

实。

我只认得拉托雷那张又瘦又干的脸，他常爱说些尖刻的话，但我并不感觉受了这些话的损害。因为在估价一个伟人的行为时，只有那种爱记仇的人才会把琐碎的小事、无谓的争论以及咖啡馆和街头的闲言碎语放在心上，而拉托雷正是一个伟人。只有在象他那样宽阔的胸膛上，才能写下我们祖国整个响亮的名字和各种各样的芳香。

马利亚诺·拉托雷的纯净的风格是为使我们回到我们国土的古老本质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我虽处于社会全景的另一端，在语言和心灵方面有着不同的趋向，与马利亚诺·拉托雷的方法和表达方式相去甚远，但我仍不禁赞赏他的作品，那些作品并无神秘之处，却是我们国土的澄澈的投影和祖国摇篮的珍贵的藤条。

佩德罗·普拉多给我留下的却是全然不同、远为深刻的印象。普拉多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闪烁着才智的光芒而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外省人的拘谨之态的智利人。他谈起话来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人和事，风俗和景物，故事和推论，全都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他的谈话中。他的话机敏、深刻，以一种神奇的魅力筑起一座永远没有完结也永不会完结的奇妙的楼阁。

我来自南方的雨里，来自沉默寡言的寒冷地区。我青年时期习惯于无声的学习，所以普拉多的谈话，他对大自然那种使人陶醉的博大精深的认识以及他那无穷尽的充满哲理的阐发，使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

懂得了才智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

对我来说，表达情感总是与孤独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我南方人的拘谨。我的父母、邻居、亲戚、朋友，全都寡言少语。我的诗必须不为人所知，必须远离它的根源。南方的青年除了眼前严峻的日常生活之外，绝不会在谈话中提到诸如“影子”、“神秘的颤抖”或是“消失的香气”这类词语。我只能将这一切关在我精神遨游的诗的小天地里——只要我在那与世隔绝的死一般沉寂的天地里能够写出诗来。我的笨嘴拙舌自然不仅要归咎于气候、地区、广漠土地的影响，而且还要归咎于阶级差别的重负，普拉多很可能是活跃、独创的思想家与大资产阶级的风流倜傥相混合的产物。事实上，作为一代英灵之首的比我年长得多的佩德罗·普拉多，是在我那固执的孤僻与才智的巨大乐趣中间架起桥梁的至高无上的联结人，而他的身上随时随地都溢出这样的乐趣。

尽管如此，并不能说我喜欢普拉多创作和高贵人品的一切方面。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文友，从来不想扮演文学大棒的轻松角色。在我的青年时期，那种攻击传统的人已经吃不开，当然这种人以后还会反复出现。浸透作家心灵的那种共同的虚荣心使得作家们总想扼杀别人，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是迦里女神<sup>①</sup>及其专事扼杀的随从们的聚会上唯一活下来的被尊重的人。

---

<sup>①</sup>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毁灭神湿婆之妻。

我们这代作家对于前辈作家的的确是欠了债的，因为他们那时真是慷慨之极。如果要在我自己的帐上记下我对我国三位伟大作家所欠的债，那数目也很可观。佩德罗·普拉多最先为我的第一本诗集《霞光集》撰文，那篇精湛而冷静的文字如海上的曙光，含义深刻而且充满预见。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阿洛内与我素昧平生，却借钱给我，使我那本处女作不致被印刷厂主随意糟蹋。至于我的那本《二十首爱情诗》，我要再次告诉大家，那是爱德华多·巴里奥斯<sup>①</sup>替我转给堂卡洛斯·乔治·纳西门托的，在巴里奥斯的竭力推荐下，堂卡洛斯把我叫去，用底下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宣布我的诗可以出版：“很好，我们可以出版您的小书。”

我不赞成佩德罗·普拉多的地方，是基于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即是说，几乎都在非文学方面。对于我来说，这要比一个个静止的问题重要得多。我们这代作家中的许多人把真正的价值看作是超越文学或是说不在文学范畴之内的东西，而让书本呆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我们更喜欢街头或是大自然，喜欢充满烟尘的贫民窟、令人震惊而又富于魅力的瓦尔帕莱索港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喧腾的工会会议。

我年轻时喜欢挥霍，憎恶窘迫的生活。我们料想普拉多必定会在俭朴的平静生活和尘世的巨大诱惑之间徘

---

<sup>①</sup>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1884—1963），智利小说家。

徊。佩德罗·普拉多是真正献身于崇高精神生活的人，但由于我不太了解他的私生活，也不想触及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无从知道他的烦恼了。

他在文学上的寻求有许多是消极的探索，而且几乎总是归于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问。在那个时期，我们受阿波里耐<sup>①</sup>和比他更早的沙龙诗人马拉美<sup>②</sup>的影响，不断地发表我们那种没有大写也没有标点的诗作。我们甚至比法国人更加时髦，连写信都不用标点。现在还可以看到我那时写下的没有一个句号和逗号的诗集《无限之人的企图》。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直到一九六一年，还有许多年轻诗人在模仿这种来自法国的过时的时髦。为了惩罚我自己的这种世界主义的倾向，我打算出一本只有标点没有字句的诗集。

不管怎么说，种种新的文学潮流都没有能动摇佩德罗·普拉多的那个由二十人组成的象牙之塔，他在其他人的光辉之上增添了新的光辉，因为谁都清楚，他一个人的才华便胜过十人。但他有一种内在的冷漠和一种隐居的倾向，这使他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使他的才思趋于枯竭。

西班牙散文创作方面的毕加索——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搅乱了伊比利亚半岛，这位魔法师造出一条浩渺的大河，把一座座城市连同被他收进犀利短文的一切废料、腐朽、过时的胸衣、名人的胡须、废

---

① 阿波里耐（1880—1918），法国现代派诗人。

②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主义的创始人。

话和姿态统统冲进大海。

接着，法国又传来了超现实主义。这股潮流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完美的诗人，却使我们听到了洛特雷亚蒙<sup>①</sup>在巴黎充满敌意的街头发出的哀嚎。超现实主义硕果累累，真该向它鞠躬致敬，它以一种灾难性的勇气随意移动塑像，在拙劣的画上戳洞，还给蒙娜·丽莎添上了她十分需要的两撇胡子。

超现实主义也没能使普拉多受到震动，他继续挖掘自己的井，井里的水却越来越混，他不会在井底发现天空或闪闪发光的繁星，他只能再次看到泥土。每口井的井底都只有泥土，这和航行归来的宇航员必定要回到地上、回到家里继续做人是一个道理。

普拉多的力作《一个乡村法官》的最后几章就已深深地陷入井里，被那黑糊糊的泥土，而不是井水，染得阴暗漆黑了。

如果把这个问题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诗歌中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这一点我既不否定也不十分重视。我不是从美学评论的观点，而是从创作和地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智利其他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能发现我们半球的这种孤独感，这些诗人中有：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蒙达卡、马克斯·哈拉、豪尔赫·乌夫内尔·

---

<sup>①</sup> 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著有超现实主义的圣经《玛尔陀罗之歌》。

贝萨尼亚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sup>①</sup>。

这究竟是逃避现实、挖掘传统题目，还是受了我们的地质——动荡的火山、海洋结构——的影响？这个问题将不断引起争论，因为论文撰写者们正举着他们的望远镜和猎枪瞄准我们全体诗人。

但是，毫无疑问，有方向也罢，没有方向也罢，我们是这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块几乎未开垦的辽阔土地上的近乎孤独的主人公，由于我们过于活跃的自然环境以及昔日和今日的宗主国对我们的长期封锁而孤陋寡闻。

我国最优秀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愤懑、悲伤或极度狂怒的感情来表现这种孤独和这种处境。

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无法解决巨大的冲突，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视这些冲突，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此缺乏认识。于是我们看到佩德罗·普拉多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创新，比森特·维多夫罗<sup>②</sup>富有魅力而贴切的语言以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粗犷而带有安第斯山气息的风格。

从所有这些缺点、矛盾、探索和迷惘中产生了我们的民族文学，其中当然不乏无限而必要的明澈，而我国的文学大师马里亚诺·拉托雷正是充当了这个不愉快的角色，以其清晰使我们汗颜。

---

①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著名女诗人，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这项文学奖的第一人。

② 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因创立创造派诗歌而著名。

在一个保留着殖民主义一切特点的国家里（这个国家的文化界无论在造型艺术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靠欧洲的肺脏呼吸，靠欧洲的汗孔排泄），必定会出现这种情形。一切强调民族性的企图都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进程，必定会激起顽固、不自觉地维护历史依附状态的那些阶层的不满。

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sup>①</sup>。他是个歌颂爱情的婉约诗人，一个全身心投入地中海激荡的浪花的诗人（阿佛罗狄忒<sup>②</sup>刚从那浪花中再生），然而他的头，他那热恋着复兴的瑰宝和胜利地冲破西班牙的黑暗与顽梗的明亮光辉的头，却在智利找到了使他那炽热的高尚感情得到满足的食粮和令他赏心悦目的美好景物。

我们在《阿劳卡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森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卡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

---

①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诗人，著有史诗《阿劳卡纳》，歌颂智利土著居民阿劳科人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英勇斗争。

② 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父亲天神乌拉诺斯的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浪花中诞生的。

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

可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在走进世界、探索世界的奥秘时迷失了方向，那位西班牙作家向我们揭示的那一丰赡的财富渐渐地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在语言表达中死亡。森林被烧毁，小岛离开了原先歌唱的地方，语言中混入了大量的外国字音，舞蹈被更换，传统的服装被收进柜子。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突然萌生了要倾听普拉多闲谈的想法。我一向喜欢听他的不加个人意气的宏论。他对事态物理的鞭辟入里的看法着实令人惊异。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智慧，而普拉多可以说是最近乎我青年时期称之为“智者”的那种人。这里面，迷信的成分也许大于实际情形，因为我后来认识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几乎总是充满激情的博学之士，这些人富有反抗精神，胸中燃着被人类斗争的熔炉点燃的热火。可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再使我象青年时期那样感受到智慧的至高无上的威力。这些人中间也包括安德烈·马尔罗<sup>①</sup>，他频频来往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我不止一次在那条线路上与他相遇），迸发着他那极端笛卡儿主义的智慧的火花。

我的另外一个博学的朋友便是我许多年之后才结识的爱伦堡。那也是一个对事业、对价值有着透辟见解的

---

<sup>①</sup>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多部小说，包括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两部小说《征服者》和《人类的命运》。

光彩夺目的人物，一个热情、坚定地捍卫苏维埃祖国和世界和平的人。

生活赐予我的学问渊博的众多挚友中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阿拉贡<sup>①</sup>。同样是娓娓动听的言谈，最周密、最激越的分析，博大精深的学问，大胆的才智，一句话：融传统与革命于一身。阿拉贡常会突然动怒，显露出他那异乎寻常的火气。他这样动辄发怒，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带有最危险电荷的磁极。

我青年时期结识的这个佩德罗、普拉多——我的博学的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宛如一面蓝色大镜子的平静的形象。这面镜子广阔地映照出由思索和光明构成的深邃景致，那是始终盛满理性与和谐的平静的酒杯。

那天下午，我穿过马图卡纳街，坐上市郊的破旧有轨电车，那个地方满地尘土，除了普拉多的古老的祖居，再没有任何体面的建筑。四周是一派贫困的景象。当我穿过公园，见到公园中央喷水池中的落叶时，我立即感到自己被那种充满寓意的气氛、被那位大师的不加矫饰的敏锐所包围。一股清香飘来，浸透我的全身——普拉多始终微笑着不告诉我香味来自何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是巴拉科草的气味。那是长在智利山谷中的一种香味浓郁的草，不过，如果把巴拉科草称作猪草，马上就会使它显得干巴巴的，香味恐怕也会随之消失。

---

<sup>①</sup> 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后参加法国共产党，曾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被那种气氛弄得局促不安，惶惑地敲了敲门。房子里阒然无声，象无人住的一般。

沉重的门打开了。门洞里黑乎乎的，看不见来人，可我似乎听见一种象链子拖地似的清晰、奇怪的声音。这时，一个戴假面具的人从暗处钻了出来，朝我的额头伸出一根长长的吓人的手指，然后推着我朝普拉多家的客厅走去。我去过那个客厅，不过这时那间屋子整个变了样。我朝那里走去的时候，一个身穿长袍、头戴面具、全身遮得严严实实的极矮小的人跟在我身后，因握着一把盛满土的铁锹而弯着腰。我每走一步，他就往我的脚印上撒一点土。我在客厅中间停住了脚步。窗外，天色已晚，奇特的黄昏降临在圣地亚哥破败郊区的这个冷僻的公园。

我看到空荡荡的大厅里靠墙放着十几把大椅子或扶手椅，十几个缠着头巾、身穿长袍的诡异的人物蹲在那些椅子上，在毫无生气的假面具的遮掩下，默默无语地望着我。长长的几分钟过去了，这离奇的寂静使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是走错了地方，可又觉得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我惶恐不安地往后退，突然认出了一张脸来，就是那个一向爱玩爱闹的诗人迭戈·杜夫莱·乌鲁蒂亚，他这会儿没有戴面具，扮着鬼脸，定定地看着我，右手的食指把鼻子顶得高高翘起。

我明白我看到的是一个总在什么地方举行，或者说，到处都能见到的秘密仪式。

巫术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情，相信巫术的人以及一帮好幻想的人理所当然地会在一些废弃的公园的深处聚会，举行这样的活动。

我战战兢兢地退出客厅。在场的人肯定因自己自始至终保持着那种姿态而得意非常，所以听任我走了出去。那个圆滚滚的幽灵（后来我得知他就是阿卡里奥·科塔博斯<sup>①</sup>）仍拿着那把铁铲跟我到门口，往我这个逃跑者的脚印上盖土。

我只要一谈起普拉多，就不可避免地会记起那个奇异的情景。

杰出的佩德罗·普拉多家道丰厚，从不曾为一日三餐发愁，所以能潜心创作，这是他的福气。他所属的那个高贵的阶层直至那时——我们的朋友和师长活在世上之时——未曾遭受任何风浪。通向佩德罗·普拉多那幢古老房子的积满灰尘的街道，在很长的时间里仍不能穿越阻隔那个崇高思想的障碍。

我很少再到那一带去，可是有一次，我看到栅栏被拆除，附近街道的几百名穷孩子涌进那所已经变成一所学校的古老房子。普拉多大概也会因此而感到欣慰，这是那位诗人埋藏得很深的感情。要知道，普拉多虽是个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却曾在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sup>②</sup>的墓前致词，对被自己出于保守的天真称之为乌托邦式的空想的那种思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的这篇悼词

---

① 阿卡里奥·科塔博斯(1889—?)，智利音乐家。

②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智利社会工人党创始人。

给他的丰富的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花环。

第三个供我选择的题目便是回顾我自己的文学生涯，寻找我自己的踪迹。算起来，今年春天我的文学生涯刚好满四十年。那要追溯到带着丁香和忍冬芳香的一九二一年和圣迭戈街散发着浓重油墨味儿的塞莱塔印刷厂。那时，我夹着我的第一本诗集（一个小小的薄本）《节日的歌唱》，进出于那家印刷厂。同年十月，这本小书在那里印出。

如果一定要我把自已归入我国或其他国家的哪个文学种类或派别的话，我只好在这个严格的检查中，或者明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教育的中心讲坛上，宣布自己全然缺乏理论，不具备当先生的资格。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经常有人以师长的面目出现，一些人确有许多东西可传授，另一些人则是好为人师，即是说，喜欢指手划脚。我对自己虽然了解不多，总还知道自己既不属于前一种人也不属于后一种人，不过是众多渴求知识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我并不是因为自谦才这样说，而是因为我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徐缓的发展过程，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应当约略谈一谈自己度过的这些岁月。

卓尔不群意识和戛戛独造的欲望在创作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这些意识在艰难的文化上升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那时，在美洲，原始部落垒起神圣的石头；在东方和西方，佛塔的尖顶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箭形塔尖似乎要一直

伸向天堂，可谁也没有在那些神殿上面刻上自己的姓名，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欲念却一天天加深。

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有些国家，在产品制造出来之前，在葡萄尚未成熟、酒桶空空如也、空瓶子还等着装酒的时候，就已经给那看不见的酒起好了名字，打好了算盘并且未饮而先醉了。

那些被一个残酷时代的商品环境逼得走投无路的作家，时常拿着自己的货物到市场上去竞争，在喧嚣的人群中放出自己的白鸽。残存于昏暗的傍晚和血红色黎明之间的那一丝垂死的光，使他们处于绝望之中，他们要用某种方式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寂静。“我是最优秀的，”他们喊道，“没有人能和我相比。”他们不停地发出这种痛苦的自我崇拜的喊声。

这个假冒的勇士象邓南遮<sup>①</sup>那样穿起亲王的服饰，不断地刺激群集在海滩上的高雅之士的好奇心；在我们这片荒凉的美洲，则出了一个典雅的巴尔加斯·比拉<sup>②</sup>，他蔑视践踏法律的残暴的独裁政府和野蛮的领主，用他的勇气和光彩夺目的散文诗照亮着我们文化的整个金秋时代。

一批又一批的作家相继登台。

---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拥护法西斯主义，效忠墨索里尼，获得亲王称号。作品宣扬唯美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文字优雅、柔美，为许多作家所效尤。后期作品鼓吹帝国主义战争。

② 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记者、小说家、评论家。

这倒不是说，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传统及其纷繁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围，这不过是表明那些可怜的作家的处境，他们被围困在听不见他们呼声的城墙之内，必须吹起号角将城墙摧垮<sup>①</sup>，才能见到头戴花冠的光明天使的出现，使他们那与永恒相对抗的傲岸不羁的作品见到天日，还要用某种痛苦的方式——有时甚至用自杀的惊人之举——引起人们对遭到一个冷酷社会损害的创作活动的注意。

许多极有才能的作家，包括我们这一代作家，都选择了这条痛苦的道路，被自己的救世主般的生活钉在了十字架上。

我充分地感受到已经发生和还在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我们的这种非人的品性象阴霾那样压在头上。我们要么硬充“先生”，传授自己并不知道的知识，好让别人相信我们；要么甘心处于侍弄泥土的农夫所处的那种永不能摆脱的卑微地位。诗歌创作中的这种两难的局面把我们引入了最糟糕的歧路，而且还将把那些在烈焰和真正的诗歌创作所需要的冷静之间彷徨的人弄得晕头转向。

唯有天才的阿波利耐写下了如下简练精辟的见解：

---

① 典出《圣经》，犹太人的首领约书亚按照上帝旨意，率部族包围耶利哥城达七天之久；后抬来约柜，让人们跟在七名吹号角的祭司身后绕城七圈，接着约书亚一声令下，众人齐声高喊，城墙立即倒塌。

我只在我们中间，只向我的朋友们评说  
传说与创新、循规蹈矩与冒险  
这一无休止的争论；  
诸君之口犹如上帝之口  
吐出的全是金科玉律，  
若用条理的完美将我们衡量  
还望诸君宽宏大量；  
我们大胆创新  
绝非与诸君为敌，  
我们愿奉上广阔、奇异的地域  
那里神奇的鲜花正在为采摘者开放；  
还有色彩罕见的新奇火焰  
和成千上万无法捉摸的幻影  
都在等着变成现实；  
我们要探测无边无际、默默无言的善良  
还有那可以追逐也可以倒转的时光，  
请怜悯总在冲击无限和未来之门的我们  
请怜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过。

我则蜷缩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而且可能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积累、斟酌我的素材用之于创作，也许那时我就已想到我要一直写到生命终止，现在我则可以断定我会这样做了。我之所以用“可能”二字，是因为谁都不能预言自己的将来，谁要是这样做，谁就是缺乏真诚，而且是公开宣布自己的不真诚，而我的整个活动可

能都要归结于“真诚”这一陈旧、无足轻重、被那些在爱情与美学之间划等号的光彩夺目的人物践踏和蔑视的字眼。当然，真诚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抒写自己的情感和认识。

我不愿摆出文学大师的架势——起初是因为无此爱好，后来则是下了决心——力戒浮泛的毛病，因为那只能使我去表现而不是去创作。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隐约意识到我的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这样，我的诗才会象我自身的呼吸——我的生命的有节奏的产物和我的自然生长的结果。

因此，一部如此真挚而又如此平常地出自我内心的作品若能给人以启迪，那么这种启迪就会具有超越我的创作和活动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我的缄默，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在那些年月里，我走上街头，捍卫保护人类和人民的的原则，但我的诗却不值得仿效。我希望它象故乡的雨水渗进我脚下的土地，我既不强求文学家的聚会和学术研究会接受它，也不想把它强加给游移的青年。我的诗是从我自身的经验和感受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活力的产物，并且不断地为热烈的爱和广阔的世界所充实。

我并不将孤独视作自己的特权，因为那本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可怕的生活环境。我就这样在那些可尊敬的民众和各式各样的人中间写出了我的书。无论是孤独还是社会，都不能改变诗人所必备的条件，那些执着于两者的诗人是在掩饰自己蜜蜂的功能——几个世纪以

来，用人心所需要的同一种养分建造同一个散发着香气的蜂房。我当然不是谴责抒发孤独情感或为大众呐喊的诗人，因为沉寂和声音、人的分离和聚会都可以当作素材，写出诗的音节，使那不灭的火焰越燃越旺，那是人所特有的心灵的沟通，是几千年以来变成为语言、上升为歌唱的一笔神圣的遗产。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那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既使人着迷、自己也象着了迷似的大诗人，对我的工作，对我正在写着的或是已经写完的作品，总是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我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他的不同凡响的创作怀有同样的兴趣。可是当我读着我的哪篇诗时，没等我读完，他就会举起胳膊，摇头眯眼，双手掩耳，冲着我说：“停下，快停下！别念了！别往下念了！我要受你影响了！”

由于美洲文化界虚骄风气盛行——我们要么互相攻击，向对方投之以安第斯山的巨石，要么用些浮泛之词互相赞颂——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所以那位大诗人的谦逊使我心里乐滋滋的。我记得他常把整章整章写成的作品——从他的奇异花卉上伸出的丰满枝叶——拿给我看，让我在那上面写上一个标题，而我也确实写过几次。还要提一提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sup>①</sup>，那是个极风趣的诗人、极诙谐的人，他会突然从他那排印工人似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首未完成的十四行

---

<sup>①</sup> 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1905—1959)，西班牙诗人。

诗，对我说：“请你给我补上最后这一句，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从我这儿掏出那句诗，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他是豁达大度的。艺术的世界本是一个大家一起工作并且互相扶掖的大工场，虽然有人不明白或不相信这一点。首先，我们都依傍前人，因为很清楚，如果没有贡戈拉<sup>①</sup>就不会有鲁文·达里奥<sup>②</sup>，没有兰波，就没有阿波里耐；没有拉马丁<sup>③</sup>不会有波德莱尔，而没有所有这些诗人就不会有我巴勃罗·聂鲁达。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的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呢！

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不知是谁把丹尼尔·德·拉·维加<sup>④</sup>所著的那本白色封面、褐色书名的书带到克佩郊野我姨妈特莱斯福拉的乡间别墅里来。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本书。

我拿着那本书来到散发着幽香的枝叶繁茂的树底下急急地读起来。那本书名叫《燃烧的山》。我坐在溪流中间圆圆的大石头上看书，那溪流很宽，溪水轻轻地拍打着石头，周围是交错、纷杂的粗壮的月桂和树叶卷曲的山毛榉。那是一个由绿色的芳香和静静的流水组成的

---

①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著名文学流派“贡戈拉主义”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是长诗《孤独》，他的诗充分表现出“夸饰主义”诗歌的特点。

②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行者。

③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④ 丹尼尔·德·拉·维加(1892—?)智利诗人，小说家。

世界。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明澈的诗句顺着波光粼粼的溪水流淌。

我可以断定，那些诗句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在我的河床中流淌。此后，又有别的水珠汇合进来，那些水珠来自巨大的洪流，跳动着更大的发现和不寻常的启示，可我没有权利将水、诗、清幽给予我的那一刻欢愉的时光从我的脑中抹去。

我们因崇尚理智主义而发展到对我们的过去加以选择，把那些预见到变化、开拓了新境界的人选作我们的前辈。其实，这是在伪造前辈的过程中伪造自己。只要读一读现在的许多文学杂志，便可发现一些杂志把里尔克<sup>①</sup>或卡夫卡<sup>②</sup>等秘密已经揭开、功成名遂、文坛留名的作家当作自己的叔伯或祖父。

说到我自己，我是受了今天已失去声誉的那些书的影响，如费利佩·特里戈<sup>③</sup>描写性爱的凄惨作品——这种阴郁的色情似乎总是缠绕着西班牙的过去，使之充斥着怪诞的亵渎神明之事。保罗·费瓦尔<sup>④</sup>的剑以及那些在中世纪的月光下挥舞明晃晃的利剑的剑手，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的奇特的世界，阿尔贝·萨曼<sup>⑤</sup>若隐若现

---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

② 卡夫卡(1883—1926)，奥地利作家，著有《审判》、《城堡》、《美国》等作品。

③ 费利佩·特里戈(1864—1916)，西班牙小说家。

④ 保罗·费瓦尔(1817—1887)，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⑤ 阿尔贝·萨曼(1858—1900)，法国诗人，作品沉郁，充满朦胧的梦影。

的忧郁，保尔和薇吉妮<sup>①</sup>如醉如痴的爱情以及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sup>②</sup>举起的铃铛（那三五音步的节奏为我们的诗配上了东方的音调，使我们这个山脉之国一时间变成铺着地毯的金碧辉煌的大厅），所有这些尝试，所有这些作品、节奏、语言以及辛勤的蜜蜂和暗影，一句话，诗歌表现的整个世界，渗透了我的全身，使我在不同的时期唱出了不同先辈的声音，他们全都教给我一点美的东西，有的短暂，有的长久。

但我阅读的最伟大的巨著便是那本我们称之为智利的书。我从未放下祖国这本书，从未把眼睛从这块狭长的土地上移开。

由于某种内在的迟钝，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总有许多东西激不起我的爱或是很难使我理解。

作客远东时，我只明白了很少的一点东西，强烈的色彩，丑陋的遗传以及从树木错落、生长着怪异动植物的树林中散出来的气味……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一个象谜一样难解的隐秘的地方。同样地，我也不太理解矿藏丰富的神秘的秘鲁国土上那干燥的山岭和阿根廷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爱墨西哥，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理解它。在乌拉尔山上，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受，虽说那里正实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和真理。在巴黎街头，虽然我置

---

①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代表作《保尔和薇吉妮》中的男女主人公。

② 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1863—1903)，智利诗人，诗体华丽，著有诗集《旋律》。

身于文化荟萃、英才云集的广阔世界，我却象南方那些立于灰烬之中的烧残的小树那样感到孤寂。可是在这里，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我的心虽然已不年轻，可是从维多利亚到蒙特港的那些杂乱的街道和街上的木房子仍激动着我的心。每当海上吹来大风，那些房子便发出吉他般的声响。我能理解寒冬和贫穷在那些房子上留下的象形文字。同样地，我也能理解北部大草原上的落日，从万塔哈亚望去，布满沙石的山峰在那个时刻总是现出变幻、迷人、闪闪发光的色彩或是呈现酷似野鸽子颈项的那种灰色。

我从幼小的时候起，便学会了观察象翡翠那样点缀着南方森林朽木的蜥蜴的脊背；而凌空飞架在马列科河上的那座高架桥，则给我上了至今无法忘怀的有关人的创造智慧的第一课。用精致、柔美、会发出声响的铁带编织成的那座大桥恰似一张最漂亮的大琴，在那个明净地区散发着芳香的寂静中展示它的根根琴弦。

我是个创作诗歌的爱国者，一个生根于智利土地的民族主义者，那是我们的激动人心的祖国！从书本中很难看清她的真面，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描写歪曲了她那雪和海水的形象。从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这个仿佛从月球上掉到我们国土上来的金刚石般坚毅的先辈开始，渐渐形成了一个战火的光环，这光环使我们看不到我们那原本卑微的构造。卷帙浩繁的历史书使我们渐渐忘掉我们的黑色陶器——金查马利的陶土与手工的产品——和用喇叭藤编制的筐篮。许许多多的有关英雄的传说和史

实以及那些从西班牙跑来杀害我们的讨厌的半人半马怪<sup>①</sup>使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印第安人虽然有《阿劳卡纳》这部史诗和他们那悲壮的骄傲，至今仍打着赤脚，<sup>②</sup>没有文学也没有土地。但就是这个穿着破旧裤子、满身疤痕的祖国，这个延伸几万里可又因为贫穷而无法伸展的国家，却具有旺盛的创造力、丰富的神话和成为繁衍生命的富庶之地的巨大可能。

我在圣费尔南多、伦戈、帕拉尔、昌科等城市的百货商店与人们闲聊，沙丘正向那些城市逼近，渐渐地覆盖了一个个住房；我跟圣地亚哥谷地的农民谈论蔬菜，还在“大园地”等菜市场为搬运工人工会朗诵我的诗，听我朗诵的都是些身披麻包、腰系绳子的工人。

我在最破烂的确矿办公室朗诵我的诗，当我看到那些穿着老式工作服或是粗布衫的矿工站在骄阳下，象竖立在沙地上的焦黄的塑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听我朗诵时，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瓦尔帕莱索港的贫民窟、纳塔莱斯港、蒙特港，还有大都市圣地亚哥的工厂以及科罗内尔、库拉尼拉韦、洛塔地区的煤矿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都见到我在默默地思考。

这是一个四处漂泊的职业，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所到之处，人们不仅把我当作智利人中的一个（这已经很不简单），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好伙伴（这就更加非同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的马人，其头、手臂和胸部似人，其余部分似马。此处系指骑着马的西班牙征服者。由于美洲大陆本无马这种动物，所以土著印第安人见到骑着战马的西班牙征服者时，一时将他们视作天神。

小可)。这就是我的诗的艺术。

在特木科城，我见到了第一辆小汽车，后来我又见到了第一架飞机。堂克洛多米罗·菲格罗亚的这架飞机，象一个突然出现的风筝直上青天，拉着它的唯一的一根线便是我们这位空中骑士的孤独的意愿。从那时候起，从南方的那个雨季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一切包括世界，包括地球——地理学家们正向我们表明地球原来并不那么圆，当然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完全说服，因为人们以前也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相信地球原来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平。

我的诗也变了。

战争爆发了，那是和从前一样的战争，但是更残酷，更具摧毁力。在西班牙，痛苦在喷发，我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sup>①</sup>从这种溅落在我身上、折磨着我的巨大痛苦中诞生。这幅与《蒙娜·丽莎》处于同一艺术高度的作品，在人性的表现上，却处于另一个相对的极：后者表现对生命和美的极其平静的观赏，前者则表现对安稳与理性的摧毁以及人对于人的恐惧。换句话说，绘画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系列震撼着我们脚下的石头和头顶上的星星的发明和灾难之中，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代伟大的希望之父。马克思、列宁、高尔基、罗曼·罗兰、

---

① 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代表作。这幅画结合立方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家以这幅画抗议德国法西斯侵略西班牙。

托尔斯泰、巴比塞<sup>①</sup>、左拉，以其行动和言论，作为爱的新的向导挺身而出，震动了世界。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这笔放在世界之桌供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遗产，就是精神责任、永恒的人道主义和充分的觉悟。

可是，接着而来的是另外一批绝望的作家，他们将没有面包、赤手空拳、在性与死亡中间摇摆的慌乱的人群再次端到形形色色的流派面前，黄昏被染成红、黑两色，那是笼罩着大地的血和烟。

然而，伟大的人的事业再次有力地复活。因为人不愿意死亡。人们再次看到生活的源头仍能保持清洁、纯净并且充满生机。一些年事已高的著名人物，如杰出的伯特兰·罗素勋爵<sup>②</sup>、查理·卓别麟、巴勃罗·毕加索、美国的莱纳斯·波林<sup>③</sup>，还有施韦泽医生<sup>④</sup>、拉萨罗·卡德纳斯<sup>⑤</sup>，以千百万人的名义反对原子战争的威胁。人们突然发现，有人在为包括最普通的人在内的全体人的利益说话，人类智慧的代表绝不会背叛人类。

一向为帝国的贪欲提供奴隶和象牙的黑非洲突然画

---

① 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炮火》等。

②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③ 莱纳斯·波林（1901—），美国科学家，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④ 施韦泽（1875—1965），法国哲学家、音乐家、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医师，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⑤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1934年至1940年的墨西哥总统。

出了新的地图，二十个共和国在那里诞生；在拉丁美洲，暴君们在颤抖，古巴宣告了为自己选择社会制度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与此同时，三个面带笑容的年轻人——两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定做了一身特殊的衣服，到行星间遨游。

从我第一次到佩德罗·普拉多的祖居造访至今，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在我们那个杂乱的公共墓地与马利亚诺·拉托雷的遗体告别，也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象告别智利的田野那样告别了那位大师，他带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永远地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对于人的永恒创造力的信心，却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并伴随我直到今天，我现在就是带着这种信心参加我们这个充满亲切气氛的集会。

今天我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们未来将取得的一切成就的信心。我要宣布，诗是不会被毁灭的——虽然这不是我的新发现，哪怕它被击得粉碎，它也会再次变成晶体。它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它将继续为人而歌唱。它是会唱下去的。我们是会唱下去的。

值此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领导该系的胡安·戈麦斯·米利亚斯和欧亨尼奥·贡萨雷斯是我相交有年的亲密好友——接纳我为该系成员时，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这番长长的回忆。从我的回忆中，你们听到了许多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影响的诗人的名字，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没有提起，但我的诗中也有他们的痕迹。

我的诗没有完结。其他人还会来更新诗的形式和意义。书架上的书将会被震起，新的不寻常的词语、新的符号和新的标记将猛烈地叩击诗的大门。

（江禾 译）

## 人民的诗人\*

南美洲历来是制陶工人之乡，是制作陶瓷器皿的大陆。这一件件会吟唱诗歌似的陶瓷器皿，历来是人民制作的，是他们凭着一双手，用陶土和瓷土，或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出来的。

我一直希望用诗篇来讴歌人类的双手。我一直渴望有一首印着指纹的诗；一首用漂白土写成的诗，让水在诗里吟唱；一首用面包写成的诗，让人们个个都得以品尝。

只有民众的诗，才能留下这手工劳动的记忆。

当诗人们在闭门造车的时候，民众却始终用陶土和瓷土，用河流和矿石在吟诵诗篇。他们使一朵朵瑰丽的花儿绽开，使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史诗问世；他们撰写险象丛生的故事，倾诉悲哀与不幸；他们赞美英雄，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为圣人加冕，为亡魂哀悼。

创造这一切的，全是人类的手。这手永远粗糙而灵

---

\* 这篇是作者为1966年3月6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民间抒情诗》一书写的序言。

巧，它没有眼睛，却能击碎石头；看似渺小，却能在火海里捕鱼；肤色黝黑，却在寻求光明。

这种诗，具有在天地万物中所造就的事物的那种魅力。这种人民的诗，带有在大自然里经受风吹日晒、雨淋雪打的烙印。这种诗应该在人民中流传，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种一再遭受打击的诗，没有希腊头像那样完美无缺的匀称线条，在那苦乐参半的脸庞上只有累累伤痕。

我没有给这些人民的诗人戴上桂冠。是他们给了我构思诗歌所应有的力量和纯真感情；是他们让我领悟到他们的崇高，触摸到他们的外表和充满朝气的内心，感受到他们的欢乐。

是他们——这些人民的诗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给我指出了光明。

（王小方 译）

## 夜晚的洗衣妇\*

也许，此时此刻，我正在实现古往今来所有诗人的梦想。诗人们曾经梦想有朝一日能够会晤相聚、日久天长，能够看到比男子更为众多的妇女并向她们讲话致意。

这件事，希腊、意大利、德国、挪威、波斯、西班牙以及法国的诗人们都曾经尝试过；但是，生活却赋予我，来自世界最偏僻角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诗人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在仅仅一天、甚至仅仅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会见为数众多的妇女，她们远远超过所有那些诗人梦想会见的妇女的总数。

伙计们，你们尽管嫉妒我去吧！

再说，我所会见的又是智利的妇女，是我的聪明伶俐、温文尔雅、吃苦耐劳、勇敢坚强和美丽端庄的同胞姐妹。承蒙她们前来听取我的诗句和发言，本人不胜荣幸。我认为，这对于我，虽是天赐良机，然而也并非不

---

\* 这篇是作者在智利圣地亚哥卡乌保利坎剧院举行的一次妇女大会上的演说。

相般配。

我接受把我称之为我国的先知这一荣誉，尽管我这一辈子仅仅想当一名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的诗人。

然而，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具备创造这一奇迹的能力；只有历史、时代的嬗变次及人类永无止息的进展才能创造奇迹。要是在过去，一个诗人想要和智利的妇女进行这种会晤也是决不可能的。这是时代的一种标志。

远古以来，妇女一直在倾听男子的轶事逸闻。无论武士、官吏、起义者，还是伟大的或者拙劣的艺术家、征服者或者被征服者、英雄或者罪犯的轶事逸闻，她们一概洗耳恭听。即便教士的祷词也是为某一位妇女升入天国而寻找的一种方式。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以及作家，为塑造我们爱恋的情侣，描绘了她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容貌、崇高的母性、爱情、痛苦和英雄气概；然而，纵使有过数百年的赞美，妇女仍然处于黑暗的时代，仍然遭受粗暴的社会的盘剥、折磨和遗弃，以至于竟然到了非开会讨论妇女究竟有否生命灵性不可的地步。

实际的情况是，妇女的生命之光早就普照天下了。

这真是一个充斥鲜血和暴力的悲惨时代，是一个在神殿里香烟缭绕、而在厮杀中人类有如恶鬼格斗的悲惨时代。整个中世纪，尽是征服、侵占和纵火焚烧。骑士传奇文学把妇女描绘成金光四射的神话人物，描绘成不可触摸的星星，只有游侠骑士用宝剑和诗篇才能把她们征服；而妇女在一开始又必定是不可企及的，必定是远

离现实和真实的。

这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状况延续了几个世纪，而仅仅在妇女参与了男子的斗争并以她们的献身精神、勇敢和伟大的气魄获得了与男子同样高的地位或者超越了男子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了改变。

历史证明，无论对于男子还是对于妇女，黑人还是白人，宗教徒还是非教徒，斗争都具有同样的含义。这是为了改变人类命运、为了使全体被剥削者都能享有同样的正义的一场世界性的斗争，因此，也是一场妇女应该参加的世界性的斗争。

母亲为其子女的前途迈出了第一个步子。最初，母亲和光明总是一个整体。子女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仅仅是这种光明的延续。

我不仅有生母，而且还有过继母。我在别的场合曾经讲过多次，我的生母是怎样在生下我不久就离开人世的。她是在帕拉尔<sup>①</sup>因肺病逝世的。她生前当过教员。我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他后来续弦了。所以，我既有母亲又有继母。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仅仅需要具有献身精神和默默作出牺牲的妇女，并不仅仅需要长久埋在我衰老的心头的、此刻我立即要向大会介绍的那种妇女。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位女性，是一位没有名姓、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别无他人知道的女性。虽然不知道

---

<sup>①</sup> 帕拉尔，智利城名，位于该国中部，是聂鲁达诞生地。其母于1904年8月逝世。

她姓甚名谁，但是可以称之为“母亲”。她在默默地过日子，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妻子”；以后，还可以称之为“祖母”。除了少数几个曾经有幸认识她并得到过她的爱情的人之外，她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爱；而她给予人的幸运也鲜为人知，给予别人的爱情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报答。对于忘恩负义，妇女们真是太了解了，有如海员了解海洋、农民了解土地一样。但是，正象海洋和土地一样，忘恩负义也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一切都可以预测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意外的打击，也会发生暴风雨或者地震。

几年前，还是在我和玛蒂尔德<sup>①</sup>住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们常常坐着俯瞰首都的夜景。从高处一直往下瞧，可以看到，在我们家的楼房下面，附近有一条街，而在那儿，总会看到点着两支蜡烛和一个用木盆洗衣服的妇女，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似的。每到晚上九点钟，那位妇女便准时在木盆里搓洗衣裳，直至深夜。我们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脸庞，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她在夜晚，在那夜幕沉沉、微弱而颤抖的两片烛光中间的曲背弯腰的身影。如果我是一个主张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古代诗人，那么我就要赞美那位礼仪备至的洗衣妇了，因为她仿佛一位女教士，虔诚地在她的神龛用泡沫、棉布和纱巾进行祈祷。

然而，我是当代的诗人。我在这位洗衣妇身上看到

---

<sup>①</sup> 即玛蒂尔德·乌鲁蒂亚，聂鲁达夫人。

的并不是什么宗教仪式，而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是我们地广人稀的美洲千百万妇女的生活。那两支蜡烛，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总是在这个时候照耀着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或者委内瑞拉母亲们的艰巨任务。从奥里诺科河<sup>①</sup>到巴塔哥尼亚，从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蔚为壮观的火山到墨西哥高原那巨大而多刺的仙人掌，那位洗衣妇，那位在夜晚孩子们安睡的时候洗衣服的妇女，我认为，就是我们美洲人民的无名英雄。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她，也许，她也根本不会知道我在我们家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为她写了这么一首诗：

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

从花园里那高高的地方，  
我望见一位妇女在洗衣裳。  
时间是晚上。  
她洗啊，搓啊，  
涮啊，  
不多时她的双手  
沾满闪光的肥皂泡，  
一会儿  
又被黑影遮没了。  
往下看，  
在烛光照耀下，  
她是夜间唯一的

---

<sup>①</sup> 委内瑞拉境内的一条河流。

生灵，  
唯一的还在活动的生命：  
她那身躯  
晃动在  
肥皂泡沫中间，  
双手插在衣堆里面，  
挪动着，  
用不尽的力气：  
一个动作  
来回重复，  
以天神似的精确  
浸下又举起，  
泡在水里的双手  
悠来荡去，  
那双手啊，老态的双手，  
在夜间洗着衣服，  
洗得很晚，洗到深夜，  
洗着别人的  
衣衫，  
水里冲掉了  
劳动的  
痕迹，  
身上的  
污点，  
走路的双脚上

沾满的往事的记忆，  
穿久了的  
衬衫，  
又旧又脏的  
裤子，  
洗啊  
洗，  
在夜晚。

这位夜晚的  
洗衣妇  
有时  
抬起  
头，  
她那头发上  
闪耀着星星的光芒，  
因为  
阴影  
遮住了  
她的脸，  
又是在夜晚。  
夜空  
隐没了  
这位洗衣妇的  
长发，

而她点燃的蜡烛  
就是一颗燃烧的  
小小的  
星体。  
她那拎起  
和晃动着衣服的  
双手，  
举起来  
又放下去，  
高扬起  
气流，水，  
光滑的肥皂，  
有魅力的泡沫。

我没有听见，  
没有听见  
衣服在她手里发出的  
窃窃私语。  
夜幕中  
我的眼睛  
望见她  
象一颗行星  
那么孤零。  
夜晚的  
洗衣妇，



急匆匆地  
 洗着，  
 涮着  
 衣衫，  
 在严寒中  
 艰难地  
 干着活，  
 在静静的冬夜里洗着衣服，  
 洗啊，洗，  
 可怜的  
 洗衣妇。

（林一安 译）

## 我们是印第安人

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作为回报，我们智利人却使这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渐渐暗淡无光。原先，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后来却渐渐光泽全消，损坏殆尽了。我们从我们神奇的英雄身上剥去华美的服饰，只留下一件印第安人的破烂不堪、补丁累累的斗篷，而且还被泥泞的道路溅得污泥斑斑，让南方的暴雨淋得一片精湿。

最近，我们新上台的统治者打算颁布一道法令，宣布我们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这道带有香水味儿的法令虽然不是由议会通过的，却公然在代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方执行。《阿劳卡纳》这部史诗很不错，味儿也不坏。但阿劳科人却不好，他们身上的味儿也不好，让人觉得是个战败的种族。篡夺政权的人急于忘却这一种族，换言之，他们急于忘记自己。事实上，大多数智利人都在按老爷们的规定和法令办事。我们就象热

束手名利的狂徒，为阿劳科人感到羞愧。有些人努力将他们根除，有些人则竭力将他们抛弃、遗忘。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抹去西班牙人埃尔西利亚的宝石的光辉。

种族优越感也许是所有征服者发动战争的一个因素；但更使他们感到优越的，可能是他们的骏马。西凯罗斯<sup>①</sup>用一座巨大的半人半马像来表现征服；埃尔西利亚笔下的半人半马像则被我们土生土长的阿劳科人的箭矢射中。具有文艺复兴思想的入侵者打算建一座新的丰碑——英雄之碑：西班牙人是英雄，印第安人也是英雄，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都是英雄。但是，埃尔西利亚笔下的人是同桀骜不驯的人联系在一起的。

当我以新任总领事的身份抵达墨西哥之后，我创办了一份杂志，以宣传我的祖国。第一期封面是用无可指摘的照相凹版印制的。语言学院院长以及语言大师堂阿方索·雷耶斯<sup>②</sup>撰写了文章。由于杂志不花我们政府一分钱，我很为这出色的第一期感到自豪。它是我和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sup>③</sup>的汗水的结晶。但是，在给杂志命名的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不过，对于我们的统治者来说，这可是个特大的错误。

我应该解释一下，“智利”这个词在墨西哥有两三

---

① 西凯罗斯（1898—1974），墨西哥著名画家。

②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

③ 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1898— ），智利作家、评论家。曾在中国工作，并将鲁迅的作品由英文译为西班牙文。

种含义，而且并不是每种含义都带有褒意的。把杂志取名为“智利共和国”等于宣布共和国不存在。于是，我们将它命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一位阿劳科妇女露出她的一口白牙。我花了一大笔钱，把一些杂志和证书航空邮回智利（当时航空邮费比现在还要贵），分别寄给总统、外交部长和领事司司长。至少，他们应该向我表示礼节性的祝贺。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丁点回音。

不过，后来总算等到一个回音，这是为杂志送终的回音，只有干巴巴的一句话：“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

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相貌酷似卡波利坎<sup>①</sup>，可是当他向我传达最高旨意的时候却说：“不，先生，我们可没有什么印第安人。这是来自共和国总统府的命令。”

我们当时的总统——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总统——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sup>②</sup>分明是米奇马隆科再世。

伟大而又谦卑的安东尼奥·基塔纳在欧洲巡回展出他的摄影作品——《智利概貌》，这些作品反映祖国的壮丽自然景象：智利人的家庭，智利的山峰、城市、岛屿、收成和海洋。然而在巴黎，外交官可笑地撤下了有关阿劳科人的相片，并对摄影家说：“要注意，我们不

---

① 卡波利坎，阿劳科人的首领，曾顽强抵抗西班牙征服者。史诗《阿劳卡纳》对他有描写。

② 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1879—1941），智利政治家，在1938—1941年间任智利总统。

是印第安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再三攻击我们，抹去那些曾给予我们生命的作品。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

让我们结束这种虚伪的行径吧！

罗道夫·奥罗斯博士有一本经作者堂罗道夫·伦斯本人修改过的《阿劳科词典》。他对我说，这本词典早已售罄，他却找不到愿意出版这本词典的出版家。

智利大学女士，请您出版这部经典之作吧。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卡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

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卡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

（王小方 译）

## 没有神也没有偶像

施特拉斯堡大学发表的维维亚纳·莱内尔的一篇论文《〈要素颂〉中的世俗现实与宗教现实》，想在我的诗中寻找宗教特征。

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六月份在波哥大举行的一次神学会议上，梵蒂冈学院的一位神学家就把我当作神学家或神学研究者。我因了解不多，不好回答这些疑问，也不好匡正这些高超的研究。

我明白在世上所有的地方，人总在寻找转生的途径，而宗教则力图提出相应的妙诀，以达到那无法达到的另一个世界。此外，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对于圣人、英雄、神的需要，促使他们去制造这些偶像，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科学与理性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旅居亚洲的年代里，我为东方宗教中五花八门的神的形象而震惊。尼泊尔的神像近乎色情，那些铸有六条八条、十几条乃至四十几条青铜胳膊的女身神像，用如此之多的触手紧紧地拥抱，完全处于性的兴奋之中，我只偏爱长着大象脑袋的智慧神伽内萨，喜欢他的蜷曲

的鼻子和那双小眼睛。迦里女神已不是深受我们崇拜的萨尔加里的想象的产物，而是一个挂着巨大的人颅骨项链、伸着三米长的鲜红舌头的可怕形象，她正在加尔各答等着我去朝拜。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幼年时所见的西班牙基督像，全都令我毛骨悚然，后来我在其他尊严的地方见到各种基督像，有格吕内瓦尔德<sup>①</sup>所绘的流着血和脓的基督像，也有文艺复兴以前的托斯卡纳<sup>②</sup>艺术家创作的臃肿的基督像。

我同样不喜欢那些玫瑰色、天蓝色的精致的意大利圣母像。不过我倒很喜欢有些老教堂的气氛——圣彼得大教堂不在此列——和某些清真寺的庄严。在那种地方，有时我会感受到在考廷<sup>③</sup>森林体验到的那种自然的和精神上的静穆。

反教权主义随着无袖男外衣、无政府主义一阵风似的刮过去了，社会变了，时代和习俗也变了。工厂变成了神。合伙的神生产出香肠、武器、小汽车。当代的圣战是石油之战。不愿向石油神殿膜拜的异教徒同样逃脱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不过他们不是死于狂热的东方弯刀和钉满钉子的十字架，而是死于警察的殴打、酷刑或监狱。

---

① 格吕内瓦尔德（1455—1528）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画家，所画祭坛画为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同类画中最突出的作品。

② 托斯卡纳，1860年以前为一独立小国，1860年并入意大利。

③ 智利省名。

可是人们仍在不断地制造他们的小个子神或大胡子神，可笑的神或玄秘的神。

一位在海外殖民地生活的法国人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艘美国军舰出于需要把一辆吉普车连同—个军事观察员送到马达加斯加，一个星期之后再将人和车接回。这辆吉普车的车顶上画着国际红十字会的记号。奉命执行任务的是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黑人。他爬高坡，穿山谷，一直深入到荒凉的深山，访问了一个个陌生的部落，那是个乐呵呵的黑人，长着雪白的大牙，戴着许多镀金镯子，他嗓音洪亮，常常纵声大笑。土著人仰望着他，对他十分恭敬。那黑人坐在吉普车里，不时用无线电与飞机或军舰联系。他离开马达加斯加时，身上挂满花环。他走后，当地人对他的记忆渐渐变成了一种传播极广的宗教，其信奉者比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徒还多。土著人在马达加斯加最高的巉岩上画了许多巨大的红十字，为的是让他看到之后乐意从天上再次来到他们中间。

与此同时，这个如今年迈体衰、不知自己是上帝的人，或许正在纽约干着给地板打蜡的活儿。

一次，我在牙买加的金斯敦停留了几天，我在那里闲得无聊，正好读到当地最著名的诗人献给海尔·塞拉西的一首诗，那诗登在我到达之日的牙买加时报上。读着读着，我明白了阿比西尼亚皇帝不是被当作君主而是被视作上帝。一个拥有大量庙宇及数百万信徒的新宗教把那个身材矮小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奉为上帝。根据这个

新宗教的说法，他的众多信徒正在牙买加等待他的到来，他降临彼地之日便是天翻地覆、一个新纪元开始之时。

千年的狮子，我们宇宙的心脏和父亲——太阳——升起来了。沉沉的暮色中，广阔的海面泛起银色的鳞波。明亮的流星在空中一擦而过。太阳、水、春天，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于是，祈祷产生了；诗产生了。

宗教是诗的摇篮，诗和宗教形影相随，犹如大教堂里黄昏时分增添气氛的熏香那样，诗为神话传说推波助澜。金缕和诗织出了神的服饰。圣像一动不动的眼睛无法洞见神秘；诗的语言却排开暮霭，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寻找着美的精华和与人民的联系。

科学与诗（即是说，社会所处的时代与诗人的歌唱）却不那么容易协调。比起乏味的发明和真理来，诗的语言与神话靠得更近。诗仍在为摆脱它的久远而神秘的束缚而斗争。

（江禾 译）

## 惨遭毒手的信天翁\*

在漂泊不定的一生中，我有幸参加过不少奇怪的会议，而几天前我居然出席了一次我参加过的最为妙不可言的会议。我同我的几位同胞一起坐在那里。金融界、银行界、财政部的代理人围成一圈坐在我们对面，我觉得他们一圈人为数众多，他们代表许多国家，看来我国欠他们国家很多很多钱。

我们智利人只有几个，而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债权人——几乎都属于大国——却多达五六十。会议的主题是重新谈判公共债务，即前几届智利政府在其当政的半个世纪里不断增长的外债。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人类有了青霉素和电视，还登上了月球。至于战争，则发明了凝固汽油弹，以便借助火的净化作用，在我们星球的某些居民的骨灰上建立民主。就在这五十年间，美国作家笔会为促进了解和理性进行了崇高的工作。可是，在那次严峻的会议上，我看到“优惠贷款”挥舞利率这根现代

---

\* 这篇是作者于1971年4月在纽约的美国作家笔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在该会发表的演说。

化大棒威胁着智利。尽管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已有半个世纪，而财主和穷人之间、施舍一点儿硬面包的国家和需要果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痛苦与骄傲、生杀大权与生存权利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你们这些美国和欧洲旧大陆的作家面前，我也是前来同你们协商的。这里重要的是，要懂得我们是互有借鉴的。我们应当不断研讨我们各自国家所吸取的营养。从本国的精神财富以及世界的财富中，我们得到的总是多于自己的贡献。我们是本大陆南部的美洲作家，尽管语言各不相同，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注视并欣赏着美国文学——美洲北部文学——的巨大发展。你们的小说的惊人崛起，尤为使我们感到惊异；从德莱塞<sup>①</sup>以至于今，它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震撼人心的、建设性的力量，其结构的宏伟和感情的强烈，除了你们的剧作家，在我们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确是无与伦比的。你们的名字我们一个也不会忽视。你们的名字不计其数，如同你们所达到的广度和你们所揭示的极度深刻性一样，是不胜枚举的。你们的书叙述的痛苦觉醒往往极为严酷，但为伟大崇高的作家面临着你们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冲突，提供了极好的证据。那些典范之作丝毫不回避事实，把聚集在城里和郊区的公众与个人（不分强弱）——贵国躯体血管里的滴滴鲜血——的灵魂，把你们集体与个人的生活的灵魂赤

---

<sup>①</sup> 德莱塞（1871—1945），美国著名小说家。

裸裸地揭示出来。这些甚至在侦探小说里也有所反映，而侦探小说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能更忠实地反映现实。

至于我，我现在已经年近古稀，可是在我刚刚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沃尔特·惠特曼——我的最大的债权人。我正是怀着应当偿还曾经使我得以活命的债务的感情来到你们中间的。

回顾这种债务，首先应从确认这一债务入手，我承认自己是那位迈着迟缓的大步在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到处盘桓，去爱，去考察，去学习，去教导，去赞赏的诗人的卑微的信徒。至于那个人——那位满怀激情的道学家，走的是一条难走的路：做个热情奔放而又诲人不倦的歌手。这两种特性似乎是格格不入的。这两种特性与其说是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恐怕不如说是一个领袖人物所应具备的条件。重要的是，沃尔特·惠特曼并不惧怕走上讲坛，去教导，去向生活学习，并担负起以诚实和雄辩去教诲人的责任。显然，他既不怕道学，也不怕非道学，甚至不想给纯洁的诗和不洁的诗划定界限。他是第一个“包揽一切”的诗人，他不仅要讴歌，还要使人了解他对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那显明的民族主义乃是宇宙机体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既应写欢乐也应写悲伤，既应写高度文明也应写未开化的人。

伟大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我——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沃尔特·惠特曼比塞万提斯给了我更多的教益，因为他的作品既没有让无知的人受辱，

也没有去贬抑人自身。

我们仍然生活在惠特曼时代，尽管有产前阵痛，我们还是看到了新人和新社会正在上升，正在出现。古代凯尔特诗人曾经抱怨给当时文化提供养分的欧洲的无可抗拒的影响。实际上，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个代表整整一个地域特性的名字，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洲这个洲的名字屹立于天下。那些显赫一时的民族的殖民地，已经沉默了几个世纪。殖民主义似乎把才智和创造力都扼杀了；告诉你们以下事实大概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西班牙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我们整个美洲只有过两三位出色的作家。

随着我们共和国的迅速增多，产生的不仅仅是旗帜和国籍，大学和小小的英雄军队，或者忧郁的情歌。开始涌现出了无数书籍，往往形成难以通过的茂密的灌木丛，花繁而果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晚近，西班牙语因美洲作家的作品而大放异彩，这些作家使一个正从苦难走向新的独立的黑暗大陆，从格兰德河<sup>①</sup>到巴塔哥尼亚，充满了魔幻的故事和缠绵而绝望的诗篇。

在当前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民族、新的旗帜和新的文学，如何随着我们所期望的亚非地区整个殖民主义的消灭而出现。世界上许多首都，在一夜之间飘扬起我们不了解的、开始发出出生时的痛苦喊声的人民

---

<sup>①</sup> 格兰德河，墨西哥称布拉沃河，北出落基山脉，东南注入墨西哥湾，全长3,034公里，其中作为美墨界河长达2,000公里。

的新旗帜。非洲和美洲的黑人作家开始让我们感觉到，一向保持沉默的不幸种族的真正脉搏。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有时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采。

在我转而谈到我国种种令人忧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谦卑地先行请求你们予以谅解。全世界都知道，智利正按照我国尊严与郑重的法律进行革命性的变革<sup>①</sup>。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舒服。可是，为什么这些智利人没有去逮捕人，没有去封闭报纸，没有去枪杀任何一个反对派呢？

由于我们的道路是我们自己选定的，我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可是那些秘密的好战者却运用各种武器，图谋使我们偏离目标。因为在这类战争中，大炮似乎已经过时，他们便启用了—一个古老却崭新的武器库。在这个武器库里可以选用美元、暗箭、电话、电报工业<sup>②</sup>：一切维护旧的不合理的特权的东—西，仿佛都是正当的。因此，在那次重新谈判智利外债的会议上，我清晰地记起了那首《老水手谣》。

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sup>③</sup>这首哀伤的长诗取材于发生在我的祖国南端的一个事件，该事件是舍尔沃克在

---

① 作者发表这篇演说时，正是阿连德执政时期，所以这里所指的“变革”可能就是阿连德在智利施行的种种政策。

② 指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智利阿连德政府进行的破坏活动。

③ 科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派的代表。《老水手谣》就是他诗作之一。

他的旅游回忆录中公诸于世的。

在智利的寒冷海域，有各种各样的信天翁：有漂泊不定的和巨形的，有灰色的和骊形的，但都比任何别的鸟更善于飞翔。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智利才具有信天翁展翅时的长长的形状。

在使我难以忘怀的、我们希望重新谈判外债的会议上，我觉得许多严酷无情的人似乎都把他们的武器对准智利，非要把智利毁掉，非要使这只信天翁不能继续飞翔不可。

我这个仅仅当了一年大使的诗人来告诉你们，也许正是美国金融界代表，在他的谈判文件中藏有准备射向信天翁心脏的暗箭，我不知道这是否过于轻率。可是，这位金融家有一个欢宴用的有趣又可爱的名字，他叫亨尼斯先生<sup>①</sup>。

亨尼斯先生如有雅兴读老诗人们的作品，他就会知道《老水手谣》中那个犯罪的航海者，被判处脖子上永远挂着惨遭毒手的信天翁的沉重尸体。

亲爱的朋友们：

我饶有兴趣和满怀激动地读了美国作家笔会长达五十年历史的简介。这是伟大理想和出色活动的半个世纪。对于这一光荣的日子，我们应当怀着沉思和愉快的心情欢庆。我们作家成为个人主义者容易，成为集体主

---

<sup>①</sup> 亨尼斯，这个词又是一种著名白兰地酒的商标，译作“轩尼诗”，所以作者把这个人名与酒宴联系在一起，语含双关。

义者却很难；我们都有构成我们言谈和自身内涵的反叛萌芽，而我们的叛逆精神又往往表现为反对我们自身。我们总是在寻找最近的敌人，而且总是错误地在与我们最相似的人中间发现敌人。我们集合在一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克服政治、语言和种族的隔阂而集合在一起，确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使世界各国的作家排除倾向或信仰的分歧团结起来，我们要向使这一愿望得以成为可能的那些人致敬。

我确信，你们不是作为一个无情的法庭，而是作为一个慷慨而博爱的团体来接受我以及我的感激之情的。我已经说过，应当承认我们向一些人借鉴过，或者说大家彼此都相互借鉴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信存在着连续的和普遍的一致思想，或者说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念。

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过去，坚信过去所具有的成熟美，而且就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坚信别的作家将为尚未出生的一代辛勤笔耕。

（林光 译）

##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我的演说将是一次长途跋涉，将是我在地球另一端遥远地区的一次旅行，那里的景物和荒凉情状，并不因其遥远而与北方有多大差别。我说的是我国的最南端。我们智利人相距真是远而又远，边界简直与南极紧紧相连；在地理上我们同瑞典十分相似，只不过瑞典的头部贴近本星球白雪皑皑的北极。

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件促使我穿过那里——我的祖国的那个辽阔地区；因为只有穿越（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我国与阿根廷接壤的边界。大森林把那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覆盖得象一条隧道，而我们是犯禁潜行，只能循着极难辨认的方向行走。那里没有足迹，没有路径，我同四个骑马的旅伴在马背上颠簸着逶迤前进——一面清除大树的障碍，越过难以涉渡的河流，穿过宽阔的多石地带，走过荒无人烟的雪野；一面寻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摸索）我个人获得自由的途

---

\* 这篇是作者1971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径。我的旅伴们认得方向，知道从繁茂的枝叶之间可能通往何方；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骑在马上还不时用砍刀在左右的大树树皮上留下刀痕，以便让我独自去听凭命运支配之后，在归途中可以辨认方向。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植土、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的自然界，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已的威胁。孤独、危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踏着也许是走私贩子的、也许是逃亡的刑事犯的十分模糊的足迹行走，但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死于非命，因为安第斯山上寒冬的雪崩和可怖的暴风雪一旦骤然袭来，往往困住过往旅人，把他们埋到深达数丈的积雪下面。

在那荒野上的足迹两旁，我看到象是人类建造的某种东西。那是历经无数寒冬堆起的一段段树枝，是千百个过往旅人的草木供品，是为倒毙者堆起的高高的木坟头，它使人想到那些未能继续前进而永远留在那皑皑白雪下面的人。我的旅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砍下一些树枝，这些树枝有的从参天的针叶树上低垂到我们头上，有的从橡树上垂下来——严冬的暴风雪还没有来临，它梢头的枝叶已经在颤动了。我也在每一堆坟头留下一件纪念品、一张木质的名片、一束从树林里砍来的树枝，用以

装点一个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坟墓。

我们还渡过了一条河。这种源出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小溪，奔腾而下，流势湍急恣肆，一泻而成瀑布，挟着冲下险峻高山时产生的力量和速度，撞开土地和岩石；不过，这次我们遇到的却是一条缓流，水面开阔，平静如镜，是一处容易涉渡的浅滩。马匹下到河里，腿没在水里都够不着底了，便向对岸游去。突然我的马快要完全给水淹没了，我失去支持，开始摇晃起来；当我的马挣扎着把自己的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就使劲夹住马肚子。我们就这样过了河。我们刚刚到达对岸，我的向导，也就是那几位伴送我的农民，微笑着问我：

“您害怕了吧？”

“是的，我刚才还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我说。

“我们可都手拿套索跟着您呢。”他们对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又说：“我父亲就在这里落水，给急流卷走了。您倒不至于发生这种事。”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处天然隧道，这也许是一条流向不定、水量丰沛的河流在巨大的岩石上冲凿出来的，也许是一次地震把我们钻进去的这条花岗岩隧道——受侵蚀的石块形成的岩石水道——设置在高山上的。马匹没走几步就打滑，它们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稳住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铁蹄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仰面朝天地倒在岩石上。我的坐骑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在这条广阔、光辉而又艰巨的道路上迈进。

在那莽莽丛林中，总有令人惊异的事在等待我们。墓地有如奇妙的幻觉，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小块苍翠的草地；那里泉水清澈，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流水潺潺，上面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任何枝叶挡住普照的阳光。

在那里，我们有如驻足于奇幻的仙境中，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向导们各自下了马。如同举行祭祀一样，在那块场地中央摆着一具牛的颅骨。我的旅伴们一个个悄然无声地走上前去，把几枚钱币和一些食品投入颅骨的孔中。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粗鲁的尤利西斯<sup>①</sup>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这些人也许会从死牛的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种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为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帽子，跳起一种古怪的舞蹈；他们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脚印，单脚绕着摆在那里的颅骨蹦跳。在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陌生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界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答复。

再往前走，已经到了越过边界的地点——从那里，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我们是在夜间到达群山间最后的

---

<sup>①</sup> 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勇敢机智，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联军获胜。回国途中，历经艰险，经过十年时间才得以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这里诗人借指迷路的旅人。

峡谷的。这时忽然看见了火花，这是有人居住的确切迹象，我们走近时看到的是几所东倒西斜的房屋，几个似乎空无一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棚舍中央燃烧着粗大的树干，那些巨大的树身夜以继日地在那里燃烧。烟从屋顶的缝隙逸出，就象一片厚厚的蓝色轻纱在夜幕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都是人们在那一带高山上制成后堆起来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象一堆布袋似的躺着。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的弦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来自炭火，也来自黑暗的地方，是我们在路途中偶然听到的头一个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诉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边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同吃饭，然后又在黑暗中一起走向一些天然的房舍。温泉流过那些房舍，我们泡到温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长途骑马跋涉而引起的疲乏一扫而光。我们象受过洗礼一样，感到浑身清爽，充满活力；天一破晓，我们就踏上了将要与我的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几公里行程。我们精神焕发，勇气十足，唱着歌骑马离去，迈向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大道。我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这件事

我至今记忆犹新），以报答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温泉水、他们给予的住宿款待，也就是说，要报答他们主动给予我们的意外庇护；这时候，他们毫不动心地拒绝了我们。他们仅仅是帮了我们一点儿忙，而在那个“仅仅”里，在那个无声的“仅仅”里，有很多不言而喻的含意：也许是感激之情，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里学到过任何写诗的诀窍；任何会让后起的诗人们从中得到点滴所谓智慧的关于写作指导、方式和风格的书，我也决不会去写。我之所以在这篇演说中讲到了某些往事，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在这个与事件发生的地点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远难以忘怀的旧事，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我总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我要寻求的明确无误的语言和方式；这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为了表达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份。在那里，大地和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致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现在以同样的心情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在渡过湍急河流的时候，在绕着牛的颅骨跳舞的时

候，在高山地区清澈的水里洗澡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感受，是日后要与许多人交流的发自我内心的愿望，还是别人传递给我的兼含要求与召唤的信息。我不清楚，我当时体验到的诗意，我后来讴歌的感受，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我写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记述还是创作的诗，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朋友们，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决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地方，才到达那块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确实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与人一道坐到友谊和责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认为指责或辩解都不是诗人的天职。总之，任何诗人都不是诗的主宰。如果有那么一个诗人一味指责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认为可以浪费生命去针对合乎情理的或胡说八道的指责进行辩解，我倒认为，只有虚荣心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如此极端的歧途上去。我认为，诗的敌人不存在于写诗或爱诗的人之间，而在于诗人自己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

度。

诗人不是“小上帝”，不，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进去，就是和全人类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理都没有允许我（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中崎岖难行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划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

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份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使我们窒息。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作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驰。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词、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

扎扎实实，就象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象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不管我谈到的诗人的这些责任是否正确，我将恪守不渝；我还决定，我在社会上和对待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具有自己的倾向性。我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光辉的失败、受人冷落的胜利、令人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象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承的是受了许多世纪磨难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们本是最欢乐、最纯真、用石头与金属建造过神奇的塔楼、制造过光彩夺目的珍宝的人民，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义时代迅速遭到摧残，变得无声无息，而殖民主义至今依然存在。

我们灿烂的前途主要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绝没有互不相关的斗争和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遥远时代、惰性、谬误、热情、当务之急、历史急遽变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说，如果我曾经为美洲这个伟大大陆的封建的过去效过犬马之劳，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我国当前改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给予我的荣誉面前昂起头来呢？必须看着美洲的地图，面对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和我们周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拒绝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给予美洲人民的耻辱与受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没有再把个人当作太阳系中心的太阳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尽管它不时会有失误，但它每天总是不顾那些不合潮流的顽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之过急的人，不停顿地向前迈进。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的使命。

迄今恰好一百年，一位才华出众的不幸诗人——一个极度绝望的人——写下了这样一句预言：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些壮丽的城池。

我相信兰波这句有远见的预言。我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省份，来自一个地处偏远因而与一切其他地方隔绝

的国家。我是诗人中最不走运的一个，我的诗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区的局限性。但是，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才能带着我的诗，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这里。

最后，我必须对善意的人们，对劳动者们，对诗人们说，兰波说过的那句话表达了整个未来，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因此，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林光 译）

## 回答一个问题

您问，诗歌到二〇〇〇年将是什么模样？这可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倘若我是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听到这样的问题，准会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我对二〇〇〇年一无所知，对诗歌更是知之甚微。

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到了下一世纪，也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

每个时代，都有人宣告诗歌的死亡。然而，诗歌总是表现出离心力和永恒性。它总是显示出生命的活力，迅即复活，似乎是永存的。但丁似乎使诗歌走到了尽头。但时隔不久，豪尔赫·曼里克<sup>①</sup>带来了一线光明，他象一颗人造卫星，在幽暗中闪射光芒。尔后，维克多·雨果仿佛叱咤风云，穷尽了诗歌的技巧。可这时，出现了穿着入时的绅士夏尔·波德莱尔，接着又出现了不修边幅的青年阿尔图尔·兰波，于是诗歌又获新生。继惠特曼

---

<sup>①</sup> 豪尔赫·曼里克(1440—1479)，西班牙诗人。

之后，人们还能期待什么？每棵草都已种好，草坪已无从涉足。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却闯了进来，诗歌随之变成了机房，人们听到了汽笛、枪击、叹息、哭泣。火车和装甲车的轰鸣。历史就这样继续着。

显而易见，诗歌的敌人始终妄图用石头砸它的眼睛，用木棍击它的后颈。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出现：有的象独断专行的元帅，有的象见不得光明的人，有的则象肥鹅般的官僚，踱来踱去专门和诗人作对。对此，有人绝望，有人沮丧，也有少数人作了可悲的修正。尽管如此，诗歌仍然象清泉，涌流不止；仍然象伤口，淌着鲜血。它继续奋争，继续在荒野里讴歌。它象一棵变得愈发高大的树木，象一条不断漫过堤坝的河流，象玻利维亚高原夜空里一颗璀璨的星。

对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来说，诗歌是一种抚慰，它减轻人的痛苦，指导人如何康复。对形影相吊的人来说，诗歌是伴侣。它象火一样灼热，象雪一般轻盈、清新。它有手，有指，有拳。它如同春天的绿芽，如同格拉纳达城的泉眼。它比导弹还要迅猛，比城堡还要坚固。因为，它深入人心。

到了二〇〇〇年，诗人不可能在全世界发起暴动，去重新分配诗歌的财富。人类只有取得了进步和发展，拥有了书籍和文化知识，才能分享诗歌。诗人也不可能发号施令，尽管个别诗人已经如此行事，其手法必定是非常拙劣或是并不高明的。但是，诗人毕竟是箴言家，应该

倾听他们的声音。政府经常和人民公开接触，而诗歌却同忍辱负重的人神交。必须倾听诗人的声音，这是历史的经验。

也许，到了二〇〇〇年，最为新奇、最入时尚的诗人将是目前没有读者的、名叫荷马的希腊诗人。

我赞同这种说法。为此，我要重读荷马的诗。他的情诗和史诗给人以启迪，他的咒语和预言，他那大理石般的神话和瞽者的拄杖，都是我所追求寻觅的。

在准备新世纪的到来时，我将试图按荷马的方式写作。我一定会从他那雄奇豪迈、绚丽多彩的诗风中获得教益。

然后，我要高擎伊塔刻王奥德修斯的旌旗走上街头。到那时，陪伴我的将有希腊诗人。为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诗风，他们可能已走出城堡。

（王小方 译）

##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选译）

### 年轻的外省人

#### 童年与诗歌

提起童年的岁月，首先我要说到的是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事物——雨水。从合恩角的天空到边界，南方的大雨象极地的飞泉似地落下来。就在这边境地区，或称之为我国的西部地带，我投身于人生，大地，投身于诗歌和雨水。

---

\* 1973年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与世长辞。他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小说家米格尔·奥德罗·席尔瓦根据他的手稿整理完成了他自1971年动手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并于1974年3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第一次出版。

全书长达五百页，共分十二章。第一、二章讲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以及他的成名，第三、四、七章写他在东方各国（缅甸、新加坡、印尼等国）和在墨西哥担任外交官的经历，第五章《西班牙在我心中》，回忆他在西班牙的往事，第六、八、十二章叙述智利国内斗争的情况，第九、十章是他对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中国的多次访问的回顾，第十一章主要是对诗歌的论述和对一些诗人的回忆。

这里选译的是第一章《年轻的外省人》和第五章《西班牙在我心中》。

从我走过的许多地方看，我感到在我的家乡阿劳科地区，雨的艺术味已经消失，而成了那么一种敏感、恐怖的力量。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下，整年整年地下。雨水成线地落下来，仿佛一条条玻璃的长针，砸碎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又象是透明的波涛在拍打着窗户，而每个人家就是一条船，驶过冬天的海洋，吃力地抵达港口。

这种美洲南方冰凉的雨水不是吹送热雨的飓风带来的，热带的雨落下来时象一阵鞭打，雨过天晴，万里无云。相反，这从灰蒙蒙的天空中落下的南方的雨，有着一种耐性和连续性，下起来没完没了。

在我家的前面，大街成了一片宽阔的烂泥海洋，我从窗户里透过雨水看见一辆木轮大车陷在街的中央，一个穿着黑色粗呢外衣的农民正抽打着在大雨和泥水中进退两难的牲口。

我们曾踩着一块块石头，走在人行道上，顶着寒冷和雨水，朝着教堂走去。雨伞被风吹跑了。那时候的雨衣价值昂贵，手套又与我无缘，鞋子则全淋湿了，我永远都记得那些挨着火盆烤的湿袜子和一只只象小火车头似地散发着蒸气的鞋子。接着洪水来了，把靠近河边的最穷苦的人们居住的房屋冲走了。大地也在摇动、颤抖。有几次，山峦之间冒出了恐怖之光组成的顶戴：耶意曼火山苏醒了。

特木科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这类城市，一切从头建起，但铁铺却是早就有的，由于印第安人不会认字，铁铺在当时的街上俨然就是他们的高贵显赫的企业了：挂

着一张大手锯，一个巨型的锅，一把巨大的锁，一个南方的勺子。再过去一点，是鞋店，有一只巨人的靴子。

如果说在智利南部地区特木科是一个智利化的发展较快的城镇，这里面就包含着—部漫长的血的历史。

由于西班牙征服者的驱赶，在三百年的斗争之后，阿劳科人撤退到了那些寒冷的地区。但智利人继续进行所谓的“平定阿劳科地区”的行动，就是说，继续展开—场血与火的战争，以便使我们的同胞放弃他们的土地。—切武器都毫不吝惜地用来对付印第安人：卡宾枪响了，茅舍被烧毁了。接着，采取了更加厉害的手段，运用法律和烈性酒。律师成了掠夺他们土地的专家，当他们提出抗议时，法官却谴责他们，神父用上帝的火来威胁他们。最后，烧酒彻底毁灭了—个高傲的民族。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的长诗《阿劳卡纳》歌颂了这个民族的英雄业绩、勇敢和美德，这些诗句被铸在铁器上，刻在玉石中。

我的父母是从帕拉尔来的，我生在那里。在智利中部的那—带地方，到处是葡萄园，盛产酒。不等我会记事，不等我明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我妈妈堂娜·罗莎·伐索阿尔托，她就死了。我生于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个月后，即八月间，我妈妈离开了人世。

对我国中部的小农来说，生活是艰难的。我祖父堂何塞·安赫尔·雷耶斯有—小块土地和—大堆孩子。我的那些叔叔的名字给我的感觉象是遥远王国里的王子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阿蒙斯，奥塞阿斯，霍埃尔，阿伐迪亚

斯。我父亲就简单地叫做何塞·德·卡门，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父辈的田地，在泰尔加乌诺港的船坞上当了一名工人，而后在特木科当铁路工人。

他是一种专运碎石的火车的司机。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碎石车。在经常刮大风的南方地区，如果不在铁轨枕木之间倒上一些小石块，水就会把铁轨冲走。要把碎石装在草袋里从采石场上运出来，再把这些小石块倒到载重汽车上。四十年前这类火车上的机务人员是相当多的，他们来自农村，郊区和监狱，都是一些身材高大和肌肉发达的壮工。公司付给他们的工资是极为微薄的，也不要求那些在碎石车上工作的人有什么资历。我父亲是一个司机，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和服从命令。有时候他也带我去。我们曾在波洛阿干过破碎石头的活。波洛阿是边境地区的一个荒凉的中心，曾是西班牙人和阿劳科人之间可怕战争的舞台。

那里的自然景色使我陶醉。我被各种各样的鸟、金龟子、石鸡蛋迷住了。在山沟里找到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类昆虫象是经过发蓝，颜色乌黑而发亮，和猎枪枪筒一样。它们居然长得这样地尽善尽美使我惊讶。我到处搜集一种叫“蛇娘”的昆虫。那种虫有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被确认为最大的鞘翅目昆虫，它浑身黑亮，劲儿很大，是智利各类昆虫中的大力士。它呆在野苹果树、戈比树或丛林里的树干上，乍一看见会吓人一跳，但我已知道它很有力气，我双脚踩上去、站在上面它都经得住，不会被踩扁。它既然拥有如此强硬的自卫本领

也就不需要使用什么毒汁了。

我的这些考察情况对于那些干活的人说来是颇为新奇的。很快他们就对我的发现感兴趣了。只要我父亲一不注意，他们就溜进原始森林。他们比我更熟练、更机灵、更有劲，给我带来了好些想象不到的宝贝。其中有一个人叫蒙赫，据我父亲说，他是一个爱动刀子的危险分子。在他黝黑的脸上，有两道粗大的线条，一道是垂直的刀痕，另一道是横向的，就是他那带着充满善意、狡黠神情露出来的一口白牙的微笑。这个蒙赫曾给我带来了白色的戈比花，毛茸茸的蜘蛛。……

要给人描述一下象我们家一样的那种房子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种六十年前边界地区特有的房子。

首先，各家的房间是彼此相通的。院子深处，雷耶斯家，奥尔特格斯家，甘迪亚家和马索家之间常互通有无，互赠用具，书籍，生日糕点，按摩用的油膏，雨伞，桌子和椅子。

整个村子的全部活动都在这些早期所盖的房子里进行。

堂卡洛斯·马索是一个胡髭花白的美国人，有点象美国哲学家爱梅逊，他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儿子一代完全是土生白人了。堂卡洛斯·马索备有法典和圣经。他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一个创业者。在这个家庭里，尽管谁也没有钱，却办起了印刷厂，旅馆，肉店。他有几个孩子是报社的领导人，另外几个则是报社印刷厂的工人。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时光流逝，而这一带地方依然

象从前那样极为贫困。只有德国人继续保持着那种不屈的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这在边境地区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家的房子有点象营房，也象发明家的铺子。一进门就看见好些木桶、农具、马具和一些无法描述的用具。

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房间好好整理过，梯子也没有完工。他们说人生一世就是要不断建设。那些做父亲的开始想着让孩子上大学。

在堂卡洛斯·马索家常举行盛大的节日活动。

在整个命名日的食品中，有芹菜火鸡，烤羊肉串，饭后有芙蓉牛奶。我有很多年没有喝过芙蓉牛奶了。头发斑白的马索和他的妻子堂娜米卡安拉·甘迪娅坐在那张特长桌子的头上，他身后是一面巨大的智利国旗，上面用别针别着一面小小的美国旗，这面小旗上也是以红色相陪衬的。智利国旗上的那一颗孤星显得很突出。

在这个马索家也有一个不让小孩子进去的大厅。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家具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因为全都罩着白色的套子，后来又被一场大火烧光了。那里还有一本家庭相册，里面的照片比后来传到边境地区的彩色放大照片还要光滑和精致。

在他们家有一张我母亲的照片。她是一位面容清癯的夫人，略带沉思的神情，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人们对我说她写过诗，但我从未见过，只见过那张漂亮的照片。

我父亲早已续弦娶了堂娜特里尼达·甘迪娅·玛尔

凡德，即我的后母。给我童年的监护天使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使我感到实在不可思议。她动作敏捷，待人亲切，有一种农民的幽默感，以及不知疲倦的乐观向上的好脾气。

在那个大厅里我看到过别人跳玛祖卡舞和四对舞。

在我家里有一个衣箱，里面装着好多迷人的东西，箱底有一张闪闪发光的印着美丽鹦鹉的年历。有一天，我母亲在翻动那个神奇的箱子，我把头伸进去勾那个鹦鹉。但当我慢慢大一点的时候，我曾秘密地把箱子打开过，里面有一些珍贵和精致的扇子。

关于那个箱子，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这就是第一部使我激动的爱情小说。这是几百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是谁寄的？上面的签字我不认识，象是恩里克或阿尔贝托，而且全部都是写给玛丽亚·蒂埃尔曼的。一张张明信片都很漂亮，是镶着细小玻璃的当时的大明星的照片，有些还贴着假发。有的明信片上面也有城堡、都市和远方的风景。有好几年只消看看这些图片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我曾一点一点地阅读了这些用极其漂亮的书法写出来的情书。我一直在猜想那位情人是一个戴着圆形毡帽、拿着手杖、打着一条闪光领带的男人。然而字里行间却是热情如狂。这些明信片全是由一个旅行者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寄来的。里面充满了迷人的字句和大胆的情爱。我也开始爱上了玛丽亚·蒂埃尔曼了。我想象中的她是一位傲慢的女演员，头上戴着珠冠。但是这些信是怎么进到我母亲的箱子里来

的？我始终没有能够弄明白。

一九一〇年降临特木科城。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上了学，学校是一座空荡荡的破烂的大房子，里面有一些规格不一的大教室和几间阴暗的地下室。春天，站在学校的高处，隐约可以望见加乌蒂河波涛起伏，招人喜爱，河的两旁长满了野生的苹果树。我们常从课堂里逃出去就是为了把双脚浸到从白色石头上流过的冰冷的河水里玩。

但是，对于我这六岁的孩子来说，学校仍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天地。一切都具有神秘的味道。那间他们不让我进去的劳作实验室里面，尽是一些耀眼的仪器，曲颈甑和方盘。图书馆关得死死的。移民的孩子不喜欢知识。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地下室。那里面静悄悄的一片漆黑。我们点亮了蜡烛，在里面玩打仗。胜利者把俘虏捆在年久的柱子上。至今我还记得从特木科学校的地下室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潮湿的味道，阴暗角落里的味道，墓穴中的味道。

我渐渐长大了。开始对读书感兴趣。在布法洛·皮尔<sup>①</sup>的英雄事迹里，在萨尔加里的旅途中，我的精神世界在理想的地区不断地扩展。最初的爱情是极其纯洁的，是在给布兰卡·维尔逊的书信里萌发的。这个女孩子是铁匠的女儿，一个小伙子被她迷住了。求我替他写情书。我不记得这些书信都是怎么写的了，但也许这就是我最

---

<sup>①</sup> 布法洛·皮尔（1846—1917），美国垦荒者。

早的文学方面的作品。因而有一次，我碰见了这位中学里的女学生，她就问我，她的恋人带给她的那些书信是否都是我写的，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非常含糊地答了个“是”。当时她就递给我一个榲桲，我自然舍不得吃掉，我把它象宝贝似的保存了起来。这样，我的伙伴在姑娘的心里被顶替掉了，我继续给她写没完没了的情书，同时也不断收到她给我的榲桲。

学校里的男孩子不了解也不尊重我这个未来的诗人……

有时候，我们关在大棚屋里打仗，互扔橡实。任何人要是没有挨过橡实打，是不知道那种痛的滋味的。进到学校之前，我们的口袋都装满了武器。我的本事不大，没有力气，又不机灵，总是处于劣势。在我悠闲地端详着这种奇妙的橡实：翠绿光滑、有一个灰色粗糙的尖顶，在我笨拙地用橡实造出一个烟斗的时候，我的头上就遭到倾盆大雨似的橡实的捶打，这类烟斗事后往往又都被他们抢走。第二年，我想了一个主意，戴上一顶嫩绿色防水帽。这帽子是我父亲的，不论是这帽子还是他的粗呢披风，以及他的红色和绿色的信号灯，对我都是很有迷惑力的。然而我几乎是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带到学校里去对他们炫耀一番……这一次，雨一个劲地下着，大得吓人，以致绿色油布的帽子看起来象是一只鸚鵡。我刚刚到达那间大破屋里，那里面三百多亡命徒正象疯子一样地在奔跑着，我的帽子就象鸚鵡似的飞了。我去追那帽子，眼看着要拿到手了，又飞走了，在震耳欲聋的

吼叫声中飞走了，这种吼叫声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再也没见到这顶帽子。

在这些回忆中，我没有很注意日期的准确性。一些小事我弄混了。这些小事对我来说又是重要的。我感到我大概是把我最初的浪漫主义的冒险的经历与大自然的历史不相干地混淆在一起了。也许从很早开始，爱情和大自然就是我诗歌的源泉。

我家的对面住着两个姑娘，她们经常给我送来使我害羞的秋波。我生性胆怯，喜欢安静，而她们则老成和调皮。那一次，我站在自己家的门口，想方设法不去看她们。她们手里总拿着一些使人迷惑的东西，我小心地走过去，她们给我看一个野鸟窝，是由小羽毛和藓苔搭成的，里面还有几个松绿色的奇妙的小鸟蛋，当我去拿这个鸟窝时，两人中的一位对我说，首先应当把鸟窝放在我的衣服中不停地摇晃。我害怕得手都发抖，马上逃开了，这两位年轻的仙女，却托着这个逗人的宝贝，一个劲追我。纠缠之中，我钻进一个胡同，这胡同直通我父亲的面包店的一间空屋。这两个劫人的女子终于追上我了，并开始剥我的裤子，正在这时候，过道上传来了我父亲的脚步声，鸟窝就在那个地方摔了。这些奇妙的小鸟蛋被摔破在无人的面包店里，与此同时，劫人者与被劫者一块躲到了柜台下面，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家里我自己的东西堆里寻找小东西和小生命，在围墙木板上发现一个小洞，我透过洞看见一块和我家那块地一样的地方，那里还没有

开垦，野草丛生。我往后退了几步，因为我模模糊糊感觉到要出事。突然伸出了一只手，这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的手。当我走近去的时候，手已没有了，那个地方只有一只小白羊。

这是一只毛已褪色的羊。……

### 艺术和雨

南美洲冻人的和乱糟糟的冬天过去了，黄色和烤人的夏天也来到这一带地方。我们的周围是未开垦的群山，可我很想了解大海。很幸运，我热心的父亲搞到一间房屋，这是他铁路上上的一个同事借给他的。我父亲是一个司机，一个字也不认识，夜里四点钟（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说早上四点钟）他用司机的哨子把全家叫醒。从这一刻起家里就不安静了，没有亮光，蜡烛光小小的火头被从房子四周的夹缝进来的小风吹得东摇西晃，我妈妈、我的两个兄弟和厨娘来回地奔忙，把一个个大垫子卷了起来，顷刻间变成了一只只黄麻布包着的大扁球，然后被女人们急急忙忙地抱了出去，还要把床也装上火车。后来当火车从我家附近的车站开出的时候，垫子还是热乎乎的。本来体弱多病又突然从半睡中惊醒的我，感到恶心和寒冷，与此同时家里这种搬运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没完没了。为了这可怜的一个月的假期，什么东西都带上了。连柳条编的烘衣架也带着。这种架子一般放在生着火火盆上。用来烘干床单和被雨雪打湿了的衣服。烘衣架也被做了记号塞到了等着装东西的木轮大车上。

火车在那个寒冷的省份跑了一段，从特木科直到卡拉乌埃。穿过广阔的没有耕种的无人居住的地区，穿过原始森林，象地震似地呼啸着穿过隧道和桥梁。车站孤零零地伫立在田野中间，伫立在开花的苹果树和香气里。阿劳科印第安人穿着自己惯常穿的衣服和佩戴着祖辈庄严的饰物，在车站上等着向那些和气的旅客出售小鸡、鸡蛋和编织品。我爸爸总是要买一些东西，总是没完没了地与他们讨价还价。

每一个车站都有一个最好听的名字，这些站名几乎都是古老的阿劳科人流传下来的称呼。

然后到达了一个河水流经的城市。火车的汽笛极其欢快地响着，田野是黑沉沉的，铁路车站上煤烟缭绕，钟声叮叮当当，已经能感觉到平静和蓝色的印贝利阿尔河接近海口的宽阔河面的水流声。大包小包卸下来了。小家庭的东西逐一整理好了，我们走上一条牲口踏过的路一直走到小汽船跟前。人和包都被塞进了小船，船载着我们开向大海。船上没有人睡的地方。我坐在靠近船头的地方，螺旋桨叶片卷起水流，小船上的机器呼哧呼哧地冒着大气，沉默寡言的南方人一个个象一动不动的家具散坐在甲板上。

不知是谁的手风琴发出浪漫的哀叹，唤起了人们心中的爱情。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的心灵，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他激动的了：在陌生的宽阔的大河上航行，在夹岸的高山中驶向神秘的大海。

印贝利阿尔河下游房舍鳞次栉比，屋顶五颜六色，

都是门朝大河。从我们要去住的房子再往前，从停靠小汽船的那些零乱的码头上，我隐约听到了海的轰鸣，听到了远方的震响，极目可见翻滚的浪涛。

当我第一次面对大海的时候，我惊呆了。那儿，在两座大山之间，大海怒涛汹涌。不仅有高过我们头顶的无边雪浪，而且还有硕大的心脏发出的巨响，摇撼着天地。

### 我的第一首诗

在加乌迪省夏天是炎热的，烤灼着天空和小麦。大地想从昏睡中醒来。家家的房子都不是为着准备在里面过夏的，同样也不是为着准备在里面过冬的。我向野外走去，不停地走啊，走。我在尼埃洛山迷路了。只我一个人。口袋里装满金龟子。在一个小盒里我装进一个刚捉到的毛茸茸的蜘蛛。往上去看不见天空。森林里总是湿漉漉的，我滑倒了，突然一声鸟叫，那是荒野里幽灵的呼喊。我终于困难地找到了路，但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爸爸还没有回来，他总是每天早晨三点或四点到家。我上去了，去到我的屋子里，我读着萨尔加里的作品，大雨象瀑布似地倾泻着。顿时黑夜和雨水笼罩着整个世界。在那儿我是一个人。我在自己的算术本上写着诗句，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李子树是青青的，我登上小山，带着一小袋盐，爬上一棵树，舒服地坐好。细细地咬着一个李子，我咬下一小块，然后蘸着盐，吃了。这样直到吃了一百个李子，我才知道吃多了。

由于我们家房子烧了，这间新房是神秘的。我爬上

围墙，想看看四周的邻居，却阒无一人。

一个穿黑衣的少年诗人感到的是难以言说的孤独，在这个可怕的广漠的边境地区！生活和书籍渐渐地使我得以窥见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奥秘。

我不能忘记昨晚读过的东西。我不喜欢布法洛·皮尔，因为他杀印第安人。……

很多次人们问我什么时候写出了第一首诗，什么时候写诗的冲动在我身上萌发。

我回想这件事。在我童年的后期，那时刚刚开始学习写作，有一次我感到强烈的冲动，同时构思出了几句半押韵的句子，我很奇怪，这些句子与平常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些句子抄在纸上，沉浸在深深的忧虑中，这是一种直到那时我还不明白的情感，一种悲伤和不安。这是一首献给母亲的诗，就是说，给这个时候我才了解的天使般的继母的，她的温柔的形象卫护着我的整个童年。我完全无力审视我的第一篇作品。我把这些诗句带去给我的父母看。他们正在饭厅里低声地全神贯注地进行着使孩子和成年人划为两个世界的谈话。我把那张带横格的纸递了过去，我自己则由于第一次灵感的来临而仍然有些颤抖。我父亲心不在焉地把纸接在手里，马马虎虎地看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还给了我，并说：“你从哪儿抄来的？”后又继续低声地和我妈妈谈他们的重要的遥远的事情去了。

我仿佛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就是这样地受到文学评论的第一次毫不在意的对待的。与

此同时，我在知识的世界中奋进，我象一个孤独的航行者，在书籍的混杂的河流中搏击。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读书。在海边，在小小的海港沙凡特拉我找到一个地方图书馆并见到一位老诗人：堂奥古斯托·温德尔，他见我对文学这么贪婪很是吃惊。“这些书你都读过了？”他问我道，同时递给我一本比拉的新书，一本易卜生的书，一本洛庚波莱<sup>①</sup>，我象一只鸵鸟，一视同仁地都吞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高个子的夫人来到特木科，她穿着长长的衣服和后跟矮矮的鞋子。她是女中的新校长，是从我国南方的城市、多雪的马格耶内斯来的，名叫米斯特拉尔。

我看见她从我村子的街上走过，穿着她那长长的外衣，我有些怕她。但是，当人们带我去拜访她时，我碰到的竟是一位好心的年轻女人。在她黝黑的脸上，在那张主要是印第安人血统的、就象一个阿劳科漂亮的罐子的脸上，雪白的牙齿显露在她大方的怡然的微笑中，使四壁为之增辉。要想成为她的朋友，那我是太年轻了，太胆怯了，并且过于沉思。我见她的次数不多，每次出来时夹着她送给我的一些书，我就感到满足了。这些书一般都是俄罗斯小说，她认为这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我可以说米斯特拉尔把我带进了俄罗斯小说的严肃和恐怖的视野中，并且使我深深地爱上了托尔斯泰、

---

<sup>①</sup> 洛庚波莱，是法国作家戴拉伊尔（1829—1871）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

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他们一直伴随着我。

## 西班牙在我心中

费德里科<sup>①</sup>其人

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月之后，1932年我回到智利。我在这里出版了一直压在纸堆里的《热情的投石手》和在东方写成的《地球上的居所》。1933年我被任命为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8月，我就到达那里。

差不多在此同一时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了对罗兰·曼波里维斯剧团进行指导以及他的剧作《血姻缘》首次演出，而来到了这个城市。以前我们并不相识。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认识了，我们有很多次都是一起受到作家们和朋友们的款待的。说真的，还有过好些趣闻插曲。有些人写文章攻击费德里科，我从前也有过同样的遭遇，而且类似的事情后来仍时有发生。这些论敌是因感受到了刺痛，而希望把火光扑灭，不让人们看见。那次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由于费德里科有兴趣参加笔会在广场饭店为我们——费德里科和我——举行的宴会，有人就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告诉说宴请推迟了。他们是如此地急不可待，甚至打电话给饭店的经理、给电话接线员和厨师领班，让他们不受理也不备饭。然而，阴谋败露了，费德里科和我终于相会了，我们见到了一百位阿根廷作家。

---

<sup>①</sup> 指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我们做了一件使人十分惊讶的事情。事先我们共同准备了一个发言。诸位可能不明白“共同发言”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不清楚。费德里科呢，他是一个颇有创见和主意的人，对我解释说：

“两个斗牛士可以同时和一头牛斗，而且用一条披风。这是斗牛术中最危险的一种表演。因此极为少见。一个世纪里顶多有两三次，并且只有两位斗牛士是兄弟俩或者至少两个有共同血缘的人才能作这种表演。这就是所谓的双人斗。而这就是我们将在发表一篇讲演词时所作的表演。”

这便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事先无人知道。当我们要起立感谢笔会主席的宴请时，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两个斗牛士同时出场了，为的是发表一篇讲演词。由于饭菜都是放在一张张摆开的小桌子上的，费德里科就站在桌子的一角，我站在另一角，此时有人从旁拽了拽我的上衣，意思是让我坐下，以为我弄错了，而另外一边也有一个人在向费德里科打同样的招呼。我们开始了，于是乎，我们同时发表讲话，我先说“女士们”，他紧接着说“先生们”，我们一句一句地交叉着念到最后，结果就象一个人一样地把话讲完。那篇演讲词是献给鲁文·达里奥的，因为无论是加西亚·洛尔卡还是我，我们对于现代主义者并不忌讳，我们纪念他是把他看作为西班牙语中诗歌语言的伟大创始人之一。

演讲词全文如下：

聂鲁达 女士们……

洛尔卡 ……和先生们，在斗牛表演中有一种叫做“双人斗”，两个斗牛士一起拿一张披风来躲闪身子。

聂鲁达 费德里科和我，是被一根电线拴着的，我们就成了一对，同时一块儿坚定地在此次招待会表示响应。

洛尔卡 在这样的集会中，习惯上都是诗人们在那里显露他们的活泼的语言，讲些漂亮的或者是吉利的话，同时用他们自己的嗓音向同伴们和朋友们致意。

聂鲁达 但是我们却要向你们推荐一位已经作古的人，一位鳏夫食客，他的去世比任何人都更加伟大，却被蒙盖在冥冥地下的一片昏暗之中。正是这位一生都郁郁不得志的失意者倒是一个光辉照人的大丈夫！让我们托庇于他那待人恳切的浓荫下，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直到他的力量从被遗忘中蹦跳出来吧！

洛尔卡 在我们与文弱的诗人阿马多·维利亚尔作了企鹅般温柔的拥抱之后，我们要在宴席上抛出一个伟大的名字，我们敢肯定，这将会砸碎所有的酒杯，震飞所有的叉子，会使所有在座的人的眼睛惊愕不止，这股大海般的力量会使所有的桌布改换模样，我们要提的那个西班牙和美洲诗人的名字是：鲁文……

聂鲁达 达里奥。因为，女士们……

洛尔卡 先生们……

聂鲁达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文·达里奥广场是在什么地方呢？

洛尔卡 鲁文·达里奥的塑像又在什么地方？

聂鲁达 他喜爱公园。鲁文·达里奥公园在什么地方呢？

洛尔卡 鲁文·达里奥的玫瑰花店又在什么地方？

聂鲁达 鲁文·达里奥的苹果树和苹果在什么地方呢？

洛尔卡 鲁文·达里奥的断手又在什么地方？

聂鲁达 鲁文·达里奥的食油、树脂和天鹅<sup>①</sup>在什么地方呢？

洛尔卡 鲁文·达里奥正长眠在他的“尼加拉瓜故国”，在一尊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理石狮子脚下，这种石狮子，有钱人是安放在大门口的。

聂鲁达 这是一头献给狮子制作者的石狮子，一头向主人献上璀璨群星却没有一颗星星伴随着它的狮子。

洛尔卡 他用形容词发出丛林中的吼声，他象

---

① 达里奥在创作中追求“纯粹的美”，他认为天鹅是美的象征，由于他的诗中不断出现对天鹅的描述，曾被称为“天鹅的诗人”。他认为天鹅有形状似问号的脖子，可用来表达对人世的疑惑。上面提到的玫瑰花，断手，食油等都是他诗歌中谈到的事物。

语言大师弗拉伊·路易斯·德·格拉纳达<sup>①</sup>一样，用柠檬和鹿脚，以及无数在颤抖的软体动物作星座的标志，他用桅船和阳伞把我们送向大海，送到心爱的人那里，在宇宙有史以来最灰黯的午后修建了一条宽大的杜松林的林荫大道。他昂首挺胸，作为一个浪漫派诗人，面对黑暗的西南风尔汝相称，高声招呼。他以亘古未有的讥诮和悲切的疑虑把一只大手搁在希腊科林斯式塔的塔尖上。

聂鲁达 无论从哪一个最根本的方面来说，他那红光闪闪的名字都是值得令人怀念的。他那颗心经受了可怕痛苦，他有着强烈的疑虑；他踩着螺旋式的台阶步入地狱，他攀登着声誉的城堡。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所应具备的品德。

洛尔卡 作为一个西班牙语诗人，鲁文·达里奥在西班牙以其广博宽宏的精神教导上了年纪的教师和儿童，而这种精神正是现在诗人们所缺少的。他教导过巴列-因克兰<sup>②</sup>、胡安·拉蒙·希梅内斯<sup>③</sup>、

---

① 格拉纳达（1504—1588），西班牙作家。著有《思考与语句的书》（1544）、《基督教徒生涯的回忆》（1561）等。

② 巴列-因克兰（1869—193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著有小说《四季奏鸣曲》四部（1902—1905），《暴君班德拉斯》（1926），剧本《粗暴的喜剧》，诗歌《基夫的烟斗》（1919）等。

③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西班牙诗人。著有：《牧歌》（1911），《春天歌谣集》（1907），《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全季》（1936），散文诗《小银和我》等。

马查多兄弟<sup>①</sup>，在令人肃然起敬的语言的沟渠里，他的声音即是清水和硝石。无论从罗德里格·卡罗到那两位阿尔赫索拉斯，还是到堂胡安·阿基霍，西班牙语都未曾有过象在鲁文·达里奥身上所见到的词藻的盛会，辅音的冲突，象他那样地驾驭光彩色泽和形式的变换。从贝拉斯克斯的风俗画到戈雅的篝火图，从克维多的忧愁到他所崇尚的马略尔卡农妇苹果般的脸色，鲁文·达里奥无所不知，仿佛在自己的祖国一样，他走遍了西班牙大地。

聂鲁达 他给智利带来了潮汐，带来了北方炙热的大海，他把大海留下了，留在锯齿般的坚硬的岸边，大洋撞击着智利这个国家，浪花四溅，发出洪钟般的声响，瓦尔帕莱索的黑风使智利到处有响当当的大盐。让我们在今晚这种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生气蓬勃的气氛和环境里树立起达里奥的塑像吧，这也可以说是座以梦幻和声音铸造的诗一般美好的塑像。

洛尔卡 但是对于这尊空气塑像，我还要给他注入他的鲜血，那血就象一束被海潮摇撼的珊瑚扎成的鲜花，装上他那与光束照片极为相似的神经，

---

① 马查多兄弟，是指曼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和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两人均为诗人、戏剧家、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曼·马查多著有诗集《卡斯蒂利亚田野》（1912），《战争的诗篇》（1930）等。安·马查多著有诗集《心灵》（1902），《深沉的民歌》（1912）等。兄弟两人合写过不少诗剧，重要的有：《命运的坎坷》（1926），《洛拉到港口去》（1930）等。

安上他那牛头怪般的脑袋，在那里贡戈拉所描述的白雪是由金蜂鸟的羽毛管描绘出来的，放进他那双模糊的、出神的、泪水盈盈的眼睛，当然也要装进他的缺点。他的书架已被砾芥吞噬，发出长笛般空洞的声响，他那曾经使他戏剧性地神魂颠倒的白兰地酒杯、他的着迷的不良嗜好，以及他那充满人性的大量诗歌中的毫不掩饰的废话，这些都是他的缺点。除去准则、形式和激情，他那伟大诗歌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活力。

聂鲁达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西班牙人，我是智利人。我们两人都不承担今天晚上互称同志的任何责任，这是因为这一伟大的影象比我们唱得更为响亮，他以不同寻常的嗓音向我们侨居的这块阿根廷国土问候致敬。

洛尔卡 巴勃罗·聂鲁达是智利人，我是西班牙人，我们在语言上是相同的，在对待伟大的尼加拉瓜诗人，这位既是阿根廷的，又是智利的并且又是西班牙的鲁文·达里奥方面我们是一致的。

聂鲁达和洛尔卡 让我们一起举杯向他致敬，为他祝福吧！

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位只有阿根廷或是美国才会有的那样的百万富翁的邀请。人们称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和倔强的人，他因办了一份危言耸听的报纸而发了大财。他家的周围是座一望无际的花园，那是雄心勃勃

的新富人的梦想的一个再现。道路的两旁有好几百个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颜色的雉鸡的笼子。图书馆里摆满一色古书，这些书都是通过种种渠道在欧洲的那些藏书家拿出来拍卖时买来的。这个图书馆很大，装满了书，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巨大的阅览室里面整个房间铺着全部用一块一块的豹皮拼接起来的一整张大地毯。我知道此人在非洲、亚洲和亚马孙河地区都有一些代理人，他们专门收集豹子的毛皮，美洲豹猫的毛皮，巨猫的毛皮，在这个豪华的图书馆里，这些毛皮上的斑点正在我的脚下闪闪发光。

这位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共舆论的控制者、著名的纳塔利奥·波塔纳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费德里科和我紧靠主人坐着，对面是一位金发的高个子女诗人，她穿着料子很薄的衣服，在吃饭的过程中，她的眼睛常看着费德里科，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在盯我。宴席中有烤全牛，这牛是放在一个巨大的架子上由八个或十个加乌乔人<sup>①</sup>抬来的，下面还有炭火和灰烬。这天夜里，蔚蓝的天空满是星斗。阿根廷人以高超的手艺制作的带皮的烤牛香味，弥漫在大草原的空气里，混同在三叶草和薄荷的芳香中，伴随着成千个蟋蟀和小青蛙的鸣叫声。

吃罢饭，我和女诗人以及费德里科站了起来，费德里科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赞赏，报以微笑。我们离席向

---

<sup>①</sup> 加乌乔人，是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混血种，大都从事牧业或过流浪生活。

灯火通明的鱼池走去。加西亚·洛尔卡走在前面，不停地说话，不停地笑。他很幸福，这在他已是很习惯的了。幸福是他的外观。

在明亮的养鱼池边耸立着一座高塔。它的洁白的石灰墙在夜间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我们慢慢地登上塔顶瞭望台。上面共有三个人，三个风格各异的诗人，此时我们与世界完全隔绝了。下边养鱼池的蓝色水面在放射光芒。再过去一些，可以听见节日的歌声和吉他琴声。夜空就在我们的头顶，是那么近又是那样地星光灿烂，好似要抓住我们的脑袋，将之浸没在夜空的深处。

.....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sup>①</sup>

我没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馆里呆很长时间。1934年初，我移居巴塞罗那，担任同样的职务。堂图利奥·马凯拉是我的上司，即驻西班牙的智利总领事。他是，的的确确是，我所认识的智利领事中最称职的一位公职人员。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男子，从前人们都说他为人孤僻，可他和我们一起时脾气特别好，讲道理而又令人可亲。

---

<sup>①</sup>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西班牙诗人。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当过牧童。著有《人民的风》(1937)，《相思谣曲集》(1942)等。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战斗精神。他多次被捕，后病死于狱中。

堂图利奥·马凯拉很快就发现我连减法和乘法都常常算错，而又不会除法（我一直没有学会除法），于是对我说：

“巴勃罗，您应该住到马德里去，那儿适宜写诗，在这儿巴塞罗那尽是要做一些可怕的乘法和除法方面的事，对您不合适，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啦。”

一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智利领事，一到马德里，我就认识了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维蒂周围的所有朋友。人数众多。没有多少日子我便成了西班牙诗人中的一员。当然，西班牙人和美洲人是不一样的。不同之处常常总是由于这些人或那些人的骄傲或是看法错误所造成的。

和我一起的西班牙人比起我的拉丁美洲的同伴来显得更有兄弟情谊，更为团结一致和更加快乐。同时我可以断言，我们拉美人则是更加地开放，更多地涉足别的语言和他种文化。可是在西班牙人中间，除了西班牙语，很少有人讲别的语言。当德斯诺斯<sup>①</sup>和克勒韦尔<sup>②</sup>来到马德里的时候，为了让那些西班牙作家明白他们两位的讲话内容，我得给他们当翻译。

费德里科和拉斐尔两人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轻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从家乡奥利乌

---

① 德斯诺斯（1900—1945），法国诗人。著有诗集《三个隐士》等。

② 克勒韦尔（1900—1935），法国诗人。著有诗集《困难的死亡》（1926）等。

埃拉出来，穿着一双草鞋和一条农民穿的灯心绒裤子。他在老家放过羊。我把他的诗发表在我主编的杂志《绿马》上，我非常喜欢他那多产的诗作中显示出来的闪亮的光芒和胆略。

米格尔就是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浑身上下都有一股乡土味。他有一张色如土块或象从植物的根须中脱身出来并保持着地下凉意的马铃薯般的面孔。他在我家居住和写作。我在美洲写的诗，以其不同的地平线和草原的风光使他感到激动，使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他向我叙述了好些地方上关于鸟类和牲畜的故事。这位作家来自大自然，他仿佛是一块没有受过任何损伤的石头，带有原始大森林的纯真和极大的生命力。他跟我谈起把耳朵贴在睡着了的山羊肚子上是何等地令人激动。这样就能听到奶水流向乳房的声音，那种隐蔽的声响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听到的，除了这位从山羊群中来的诗人。

还有几次，他和我谈到了夜莺的歌声。他是从西班牙的雷瓦特<sup>①</sup>来的，那里到处都有开花的甜橙子树和夜莺。由于在我国没有这种鸟，没有这类卓越的歌手，这位为之倾倒的米格尔极力要给我作一番最生动活泼的表演。他爬到街头的一棵树上，在最高的树枝上，吹着口哨或学他所喜爱的他老家的鸟那样啼啭。

由于他无法谋生，我帮他找了个工作。在西班牙，

---

① 雷瓦特是西班牙东南地区的总称。

对一个诗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很困难的。后来有一位子爵，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此事表示关心，答复我说：

“行。”他同意帮忙。他以前读过米格爾的诗，对他很钦佩，希望他自己提出要谋求什么职务以便发给他委任状。

“米格爾·埃爾南德斯，你终于有工作了。那位子爵帮你安排好了。你将是一个高级职员，你先对我说说你希望做什么工作，好让他们宣布对你的任命。”

米格爾陷入了沉思。他那张早已出现深深的皱纹的脸上笼罩着思索的面纱。过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他才给了我回答。他带着人们在生活中遇到抉择时常常显露出来的那种发亮的目光对我说：

“那位子爵能否让我去管一群山羊呢，在此地马德里附近？”

一想起米格爾·埃爾南德斯我就无法摆脱心头的眷恋。雷瓦特夜莺的歌声，在橙子花和黑暗中耸立的能发出声音的高塔，对他来说也都是无法摆脱的清晰的往事，是他血液的组成部分，是他那乡野的和尘世间的诗歌的一部分，在这些诗中汇聚着过多的色彩、香气和西班牙雷瓦特地区的声音，带有一种强壮的男性青年的气息和丰满。

他的面孔就是西班牙的面孔。那面孔被日光晒黑，一脸皱纹就象一块已播种的土地，圆圆的形状恰似面包和地球。他那一对炯炯的目光在发烫的表皮里燃烧着，两道有力而温柔的光芒，顽强地面对着拂面而来的风。

我看见写诗所需的那类素材正从他的话语中喷涌出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速度，一种强有力的光亮，一种陈旧的血液转化为一个儿子的奇迹，素材也随之变了。在我作为诗人和流浪诗人的年月里，我可以肯定地说生活没有让我见到过在天赋以及语言运用方面才思如此敏捷的相类似的景况。

### 《绿色的马》

我同费德里科和阿尔维蒂（后者当时住在高出树丛的阁楼上，那树丛十分脏乱），还有雕塑家阿尔贝托（这位托莱多的面包师此时已是学问深奥的雕塑教师），诗人阿尔托拉吉雷和贝尔加米，伟大的诗人路易斯·塞尔努拉，加上维森特·阿莱桑德雷<sup>①</sup>，一个前途无量的诗人，以及建筑师路易斯·拉卡沙等人，或成一圈，或分为几摊，每天在这些人的家中或咖啡馆里见面。

从卡斯蒂亚纳咖啡馆或是从邮差啤酒店，我们乘车来到位于阿尔奎延区的我的住处、鲜花之家。

我们从一辆巨型公共汽车的上层，熙熙攘攘的分成几拨人走了下来，进去吃饭、喝酒和唱歌，我的同胞、杰出的科塔波斯称这种车为“低音大号”。在这些欢乐的年轻诗友中，我记得的有诗人阿尔图洛·塞拉诺·普拉哈；潇洒的才华照人的画家何塞·卡巴耶罗；安东尼奥·阿巴里晓，他是从安达露西亚径直来到我家的；此

---

<sup>①</sup> 阿尔托拉吉雷和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均为西班牙诗人，贝尔加米是西班牙“27世代”作家。

外还有好些别的人，现在他们或已不在人世或已改行，但是他们的兄弟情谊对我来说就象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和我心灵的养料，使我深为怀念。

那时候的马德里啊！我们和加利西亚的女画家玛鲁哈·玛约一起在平民区转悠，寻找出售细茎针茅草和席子的店铺，寻找桶匠的街，编绳子人的街，寻找有一切西班牙特有的材料的大街，这些材料编织成辫子形状并且紧紧捆绑着西班牙的心脏。西班牙是一个干燥和多石的地方，太阳直射着，炙烤着，吸走了平原上的水珠，用尘土构筑起一座座光秃秃的城堡。西班牙仅有的那些真正的河流是西班牙的诗人们：克维多带来了泛着黑浪的深绿色的流水；卡尔德隆<sup>①</sup>的河水里响着歌曲的音节；清澈明净的是阿尔亨索拉兄弟<sup>②</sup>；而贡戈拉则是一条红宝石的河流。

巴列-因克兰我只见过一面。他长得特别胖，蓄着长长的白须，使我感到他是从他自己写的作品的书页里钻出来的，由于被书的页片所压挤，因而脸上带着书页的苍白的颜色。

我与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sup>③</sup>是在旁姆波他的教堂的地下室里认识的，之后又在他家见了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拉蒙洪亮的嗓音，从他在咖啡馆里的座位上，传出了他的谈话声和笑声，思想和烟雾。在我看

---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② 阿尔亨索拉兄弟均为十六世纪西班牙诗人。

③ 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1888—1963），西班牙作家。

来，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是我们这个语种里最伟大的作家，他的才华如毕加索和克维多那样色彩斑斓而超群。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文章里的每一页都象是一个事实真相的探索者在对物质的和抽象的东西不断进行观察研究，以及在真理中和光谱里不断进行深入的探讨。他现在所知道的和他过去写的关于西班牙的文章都是别人从来没有谈到过的，除了他。他一直是一个秘密世界的材料的搜集者。他用自己的手改变了语言中的句法，在上面留下了任何人都无法擦去的清晰的指纹。

我多次看见堂安东尼奥·马查多，坐在咖啡馆里他常坐的位置上，穿着一件公证人的黑色衣服，谨慎地不发一言，神态严肃而又温和，象一棵西班牙的古树。对了，那位说人坏话的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诗坛上乖巧的老小孩，在提到他，提到堂安东尼奥时说，此人向来是满身尘土，口袋里总是装着好些烟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由于他的帮助使我了解了西班牙令人神往的传奇故事。因为他的作品是本世纪黑暗势力产生时出现的一个伟大的顶峰，所以这位诗人对任何人都不嫉妒，他无需这样。他象一个假隐士那样地生活着，同时他从他的藏身之处寄出文章或发表谈话，诋毁一切他认为挡住了他的光线的事物。

那些青年人——加西亚·洛尔卡，阿尔维蒂，以及豪尔赫·纪廉和佩德罗·沙利纳斯<sup>①</sup>——他们都被胡

---

<sup>①</sup> 豪尔赫·纪廉和佩德罗·沙利纳斯均为西班牙当代诗人。

安·拉蒙这个每天都在向这个人或那个人发射冷箭的大胡子魔鬼所跟踪。他每星期都要写一些拐弯抹角的评论攻击我，这些文章逢星期日刊登在《太阳报》上。但我选择的是生存，撇开这些事生活下去。我从未作过任何答复。我过去未曾回答过——现在也不回答——那些来自文学界的攻击。

诗人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开有一片印别厂而且拥有办印刷行业的天赋。一天，他顺路来我家，告诉我他准备出版一本非常漂亮的诗刊，那将是西班牙质量最好的和水平最高的诗歌杂志。

“只有一个人能领导这份杂志，”他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

我曾经是一个颇有雄心的杂志创办人，但总是很快就扔下了杂志或被杂志所抛弃。1925年我创办了一本类似的杂志《牌中马》<sup>①</sup>。那时候我们写作时都不用标点符号，我们通过乔伊斯<sup>②</sup>作品中描述的大街望见了都柏林。乌姆贝尔托·迪亚斯·卡萨努埃伐<sup>③</sup>那阵子常穿一件龟式领口的毛衣，这对那个时候的诗人来说是一个大胆的行为。他过去的诗优美而纯正，现在更是如此。罗萨梅尔·德尔瓦耶从帽子到鞋子一身都是黑色的，仿佛

---

① 西班牙等国风行的牌，数字在10以上的每张牌上都画一个人骑着一匹马。

②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著有小说集《都柏林人》等。

③ 乌姆贝尔托·迪亚斯·卡萨努埃伐（1905—），智利作家。

诗人们都该这样穿戴。对这两位受尊敬的同伴，我现在仍很怀念，因为他们是积极的合作者。别的一些人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们的马那次所作的飞奔却震动了那个时代。

“好的曼诺里托<sup>①</sup>，我同意去担任这份杂志的领导。”

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是一个光荣的印刷厂厂主。他以极好的品德用自己的双手把钱柜装得越来越满。曼诺里托以自己的诗和勤劳的天使长般的双手表明他对诗歌是极为推崇的。他翻译了雪莱的《阿多尼斯》，这是一部为约翰·济慈之死而写的哀歌，译本印得非常漂亮。他还印了佩德罗·埃斯比诺沙<sup>②</sup>写的《赫尔尼河的神话》。在那个庄严的印刷厂里，诗歌的釉彩及其金色的篇章发出的光芒何等耀眼，醒目的字体好象都是在化铅炉里重新熔炼过的一样。

我编的《绿马》诗刊的前五期在街头出现了，印得无疑是很漂亮的。我是乐于见到曼诺里托的，他总是笑声不断和满脸堆笑。他拣起铅字放进字盘，然后用脚启动小小的名片印刷机。有时候他用他女儿帕洛玛的婴儿车装运出版的书籍。过路的人恭维他说：

“多么叫人钦佩的爸爸！带这么个孩子穿越熙熙攘攘的通道！”

这个孩子就是诗歌，他带着《绿马》诗刊出来走

---

① 曼努埃尔的爱称。

② 佩德罗·埃斯比诺沙（1578—1650），西班牙诗人，代表作为诗选《杰出的诗人之花》（1605）。

动。杂志上发表了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写的第一首新诗，当然还发表了费德里科，塞尔努达，阿莱桑德雷，纪廉<sup>①</sup>（那个好人：西班牙人）等人的诗。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个神经官能病患者，九十年代的人，他每个星期日继续用尖刻的语言攻击我。

拉斐尔·阿尔维蒂不喜欢这个刊名，说：

“为什么马成了绿色的呢？红色的马，应该叫这个名字。”

我没有为他而改变颜色。但拉斐尔却为此和我争执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因什么事而争吵过。世界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带有彩虹的全部不同颜色的马匹和诗人。

第六期《绿马》堆在了维利亚托大街，没有配页也没有装订。这一期是献给胡利奥·艾莱拉-莱伊辛格<sup>②</sup>的——蒙得维的亚的第二个洛特雷亚蒙——，还有一些是西班牙诗人写的对他表示敬意的文章。这些好诗、好文章都撂在那里了，没有完工，也用不上了。这期杂志本应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发行，但是，那一天大街上尘烟滚滚。一位不出名的将军，叫做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从他在非洲的驻地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叛乱。

发生在格拉纳达的暴行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西班牙官方正在广泛地纪念——这么大的规模！——起事的多少多少周年。此刻，

---

① 指豪尔赫·纪廉。

② 胡利奥·艾莱拉-莱伊辛格（1875—1910），西班牙当代诗人，著有《被遗弃的公园》（1908）等。

在马德里，元首穿着镶金的天蓝色服装在检阅军队，四周是摩尔人的卫队，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英国大使以及另外一些国家的大使。在这支混成军里，多数人是了解那场战争的小伙子。

我是了解的。一百万西班牙人死亡！一百万人流亡！要想从人类的良心上拔掉这根血腥的刺，看来是永远不可能的。然而，现在从摩尔人卫队面前列队走过的小伙子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段可怕历史的真相。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夜晚开始的。有一个和蔼可亲的智利人、冒险家，名叫波比·德·拉格内，他是马德里“普赖斯”大马戏场兰开夏式摔跤表演这档节目的老板。我向他表示过我对此项“运动”的严肃性持审慎的态度。他说服了我，让我去一回马戏场，和加西亚·洛尔卡一起去验证一下这种演出的真实性。我说服了费德里科，我们约好过一个小时在那儿碰面，我们准备在那儿呆上一会儿，看看戴假面具的野蛮人，阿比西尼亚的专干勒死人的人，以及凶险的猩猩等的恐怖可怕的样子。

费德里科失约了。他正走在死亡的路上。我们从此没有再见面。他赴另外一些专干勒死人的约会去了。改变我的诗风的西班牙战争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一个诗人的失踪。

那是一个多好的诗人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在他身上见到的那样：风度与天才集于一身，心有双翼，思想如清澈的飞泉。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个不善于

节制的精灵，是一部把生活的幸福积存在怀中并象星光那样放射出来的欢乐的离心机。他是一个浑厚朴实的人，一个演员，是宇宙人也是外乡人，是独特的音乐家，豪爽的男丑，胆小和迷信的人，风度优雅的人，是西班牙各个时代人中间富有代表的一类人，是深孚众望的突出的一种人，他是阿拉伯—安达露西亚的后人，在整个西班牙事件舞台上，给人以启示并象素馨花那样散发着香气。我多么难过呀，再也见不到他了。

加西亚·洛尔卡以其善用比喻的杰出才能一直吸引着我。他写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他呢，有时也请求我给他朗读我最新的诗作，可读到一半时，他又常常高声地打断我的朗读，说：“你别念下去了，你别念了，都在影响我了。”

不论在戏院里还是在沉默中，在群众中和在礼数上，他都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双手有那么大的魔力，我从没有过一个这么快乐的兄弟。他笑呀，唱呀，弹呀，跳呀，写呀，光焰迸发。可怜的他，世上的一切才能他都有，他就象是一个金子做的劳动者，一个伟大的诗歌养蜂场中的雄蜂，一个他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挥霍者。

“听着，”他对我说，同时抓住我的一只手臂，“你看到那扇窗子吗？你没有发觉那扇窗子有点那种劲儿？”

“那种劲儿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但是你应该注意到哪个是那种劲儿的，哪个不是那种劲儿的。否则一个人就会迷失方向。”

你请看这条狗，那种劲儿足着呢！”

下面的事也是他给我讲的。在格拉纳达，一所小孩子的学校邀请他去参加一次吉诃德的纪念活动。当他到达教室的时候，全体孩子正在女校长的指挥下唱着：

从这边到那边  
这书永远永远被纪念  
费·罗德里格·玛林  
曾对这本书加以注解

有一次，我作了一次关于加西亚·洛尔卡的演讲，这是在他弃世几年之后。一个听众向我提了个问题：

“为什么您在《歌唱费德里科》一诗中说，为了他‘那些医院都涂上了蓝色’？”

“您看，朋友，”我答复他说，“向一个诗人提这样一类问题就象问女人有多大年纪一样，诗歌不是一种静态的物质，而是动态的水流，时常会从创作者手中溜走。它的原始材料就是以这样的素材加工而成的，这种素材是，同时也可能不是，现存的事物和不存在的事物。不管怎样，我得真诚地回答您的问题。对我来说，蓝色是所有颜色中最好看的一种。它有人类活动空间的含意，犹如苍穹，通向自由和快乐。费德里科的外貌、风度，他身上的魅力，使得他周围笼罩着一种欢乐的气氛。我的诗大抵是想说包括那些医院，包括医院里的悲愁，在他的魅力的影响下，也能够改观，并且眼看着很快变成了漂亮的蓝色大楼。”

费德里科对他的死是有预感的。有一次，他巡回演出回来后，把我叫去给我讲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不久前，他和《茅舍》剧团的艺术学家们到了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十分边远的村庄，他们在村子附近安置了营地。由于旅途上一路操心，使他累得睡不着觉。天一亮他就起来了，一个人出去转悠。天气冻人，这种冷飕飕的劲儿是卡斯蒂利亚特有的，专门用来对付旅行者，对付不速之客的。晨雾已分散成一个个白色的气团，后又全部转化为幻影似的原貌。

一个巨大的生锈的铁栅栏。被打碎的塑像和柱子躺在枯枝败叶之间。在古老领地的一扇大门前他停住了脚步。这是一个封建庄园里的大花园的入口处。在这被遗弃的地方，这种时刻和这样的寒冷使人感到极度的孤寂凄凉。由于他是在这样的早晨出来走走的，由于模糊地感到那儿有可能出事，费德里科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就在一块倒在地上的柱子顶上坐了下来。

一只小羊羔走到这地方来，在废墟堆里吃着嫩草。这只冒出来的小羊羔倒象是突然间打破薄雾中的孤寂气氛的安琪儿，又好似一片娇嫩的花瓣飘落在这块冷僻的地方。诗人感到有了淘伴了。

忽然间，一群黑猪也闯进这个圈子里来了，大约有四头或五头，这些半是野兽的黑猪有石头一样坚硬的爪子，饿得谁也管不住了。

于是费德里科目睹了一场可怕的表演。这些猪扑向小羊羔，在诗人感到恐怖的同时，它们把小羊羔撕碎、

吞食了。

这样的血淋淋的和孤寂的场面促使费德里科下令他的流动剧团即刻继续赶路。

内战开始前的三个星期，费德里科对我讲述了这一段吓人的经历，他依然心有余悸。

此后，我看到，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那次事件是他死亡的预演，是他那不可置信的悲剧的一个征兆。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不是被明火执仗地枪毙的，而是被暗杀的。自然，任何人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人在某一天把他杀死。在所有的西班牙诗人中，他是最受人爱戴的，最被人喜欢的。从他那兴致很高的欢乐的情绪来看，他太象一个孩子了。谁会相信在地球上，在他的祖国，竟有能够干出如此令人难以解释的暴行的凶恶家伙呢？

那次罪恶事件对我来说是一场长期斗争中的最痛苦的一幕。西班牙永远是角斗士们角逐的场所；是一块洒过无数鲜血的土地。斗牛场，以其牺牲和残酷的雅兴，在喜剧的妆扮下，在阳光和阴影中间，重演着古代的你死我活的格斗场面。<sup>①</sup>

宗教裁判所监禁了法拉伊·路易斯·列昂<sup>②</sup>，克维多在地牢里受尽折磨，哥伦布戴上脚镣走路。而在埃尔阿斯高利雅尔，这个过去是尸骨遍野的地方，那个场景

① 西班牙斗牛场的观众席分向阳席和背阴席两种，票价不同。

② 法拉伊·路易斯·列昂（1537—1591），西班牙诗人，神秘主义作家。

实在令人惊讶，那里就是今日为那些牺牲者树立纪念碑的地方，一个十字架矗立在百万死者之上，矗立在无数黑暗牢狱的顶端。

### 我的关于西班牙的书

光阴荏苒。战争开始失利了。诗人们和西班牙人民一起投入了斗争。费德里科已被杀害在格拉纳达。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早已从牧羊人变成了军人。他穿着士兵的制服在火线上朗诵自己的诗篇。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在继续经营他的那几片印刷厂。他把一片印刷厂迁到靠近赫罗纳的东部前线一个古老的修道院里。在那里，我的书《西班牙在我心中》以一种奇特的办法印出来了。我以为在浩如烟海的书籍的奇异历史上，很少有几本书有过如此多事的准备过程和不平常的命运。

前线的士兵学会了排印，会排各种铅字，但那时缺少纸张，他们找到了一个旧的磨盘，决定就地造纸。在投掷下来的炸弹中，在战争的环境里，却造出了罕见的纸浆。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扔进磨盘里，从敌人的旗帜到一个摩尔士兵的大褂。尽管用的是这些难以想象的材料，制作者又丝毫没有经验，结果造出来的纸却是非常的漂亮。现在保存的这本书为数很少的几册所显示的印刷技术，和那种经过不可思议的加工方法制作出来的纸张令人极为惊讶。好些年之后，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看到一本这一版的书，作为我们时代最稀有的书籍之一放在一个玻璃柜里。

在我的书刚刚印好并已装订成册的时候，共和国正急剧败退。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西班牙通向国外的条条道路。无数西班牙人的移居国外，是西班牙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

在这些向远方行进的队列里，走着东部前线的幸存者，他们中有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和制造纸张并印出《西班牙在我心中》的战士们。我的书是这些人的骄傲，在向死神的挑战过程中，他们曾为我的诗操劳过。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宁愿用口袋来装运这批已印好的书，而不先运他们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他们把口袋扛在肩上，开始了去法国的长途跋涉。

走在公路上的移居国外的庞大人流遭到了上百次的轰炸，很多战士倒下了。书籍散落在公路上。其余的人则继续不停地外逃。而在边境的另一侧，流亡到那里的西班牙人受到粗暴的对待。在整个打仗的过程中诞生和毁灭的那本充满激情的书的剩余部分，在一堆篝火中化为祭品。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到智利使馆寻求庇护，在战争进程中，智利使馆曾保护过四千名之多的长枪党徒。可这时候的大使卡洛斯·英拉·林奇，却拒绝保护这位伟大的诗人，尽管说起来诗人还是他的朋友。没过几天，他就被抓起来了，投入监狱。三年多之后，他因肺结核瘦死狱中。夜莺是受不了囚禁的。

我的领事职务早已了结了。由于我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智利政府决定要我离职。

## 战争和巴黎

我们来到巴黎。我跟拉斐尔·阿尔维蒂和他的妻子玛丽娅·戴莱莎·列昂，在沿河街奥尔洛埃，一个漂亮而又安静的地区，买了一套房子，我们住房的对面可以看见新桥和亨利第四的塑像以及塞纳河两岸众多的渔夫。我们的后面是达乌比内广场，闻得见树木枝叶和饭馆里散发出来的香味。在那个地区还住着法国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sup>①</sup>，他是我所熟悉的最中立的人士之一。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意见，甚至对于象饿狼似地突然来到巴黎的纳粹分子也不说什么。

从我的阳台右边，向外探出身子，远远地可以瞧见康塞海连的高大的黑色塔楼。它那金色的大钟对我来说是这个地区的最远处的一道边界了。

在法国我有幸受到法兰西文坛上的两位最好的人的资助，他们就是保罗·艾吕雅和阿拉贡，在很多年里，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两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引人注目的豪爽的经典作家，是真正充满活力的经典作家，这一点使他们成为现在法兰西作家行列中声音最洪亮的人。同时他们也是名垂史册的道德的坚定性和真实性的实践者。然而他们两人之间又是如此的不同，这也是很少有的。我和保罗·艾吕雅有过多次数在欣赏诗歌的快乐中忘却时间。假如诗人们真实地回答那些民意测验，他们就会讲出这种奥秘：没有任何东西如忘却时间

---

<sup>①</sup> 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系古巴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巴黎居住。聂鲁达何以说他是法国作家，不详。

这样高雅。在对待这一古老的问题上，人们都有自己的做法。和保罗·艾吕雅呆在一起时，常常已经过了一整天或一整夜，我都觉察不到。我从不理会我们谈论的内容有无重要意义。而阿拉贡则是一架机敏灵巧的电子机器，知识面广，文思敏捷，很厉害。不知何故我每次从艾吕雅家出来时总是高高兴兴的。而我有几次和阿拉贡待了一阵后出来却总感到精疲力尽，因为这位人中之鬼总是强迫我思考。这两人都是我的难得的和忠诚的朋友，也许他们身上最使我喜欢的是他们那种敢于抗争的伟大精神。

#### 南希·金纳德

我们和南希·金纳德决定创办一个诗刊，我定名为《全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

南希在法兰西省她乡下的家里有一片小印刷所，我不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了，总之离巴黎是很远的。当我们到达她家里时已经是晚上，月亮高挂着。雪光和月色好似一圈幕布围在庄园四周。我，兴致勃勃地出去散步。到我往回走的时候，雪片已在我头顶上积得厚厚的，成了冰凉的硬块。我完全迷路了，在白茫茫的夜色中摸索着走了半个小时。

南希有印刷方面的经验。从前当她是阿拉贡的女朋友的时候，她出版了阿拉贡的诗作和他翻译的《斯纳克之猎》。这首刘易斯·卡罗尔<sup>①</sup>的诗是无法翻译的，而

---

<sup>①</sup>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

我认为只有在贡戈拉那里才能见到象摩西那样的狂人所能干出来的事情。

我开始第一次排字，我自以为决不会有一盘字母排错。由于我在排印方面是笨手笨脚的，结果字母P都印反了，印出来全是d。有一首诗里两处出现“眼皮”这个字，结果印出来时两处都成了“皮眼”。有好几年，南希为了教训我，称呼我的时候都叫这个字。“我亲爱的皮眼……”，她从伦敦写给我信，开头都是这样的。不过印出来的成品都是很正经体面的。我们后来达到每册书分六批或七批就能印完。除了战斗的诗人的作品，如贡萨雷斯·杜诺或者是阿尔维蒂的，或一些法国人的，我们还出版了W.H.奥登<sup>①</sup>，斯彭德<sup>②</sup>等人的热情的诗篇。这些英国绅士永远也不会知道排印他们的诗作时，我迟钝的手指所吃的苦头。

不时从英国来一些穿着时髦的诗人，他们都是南希的朋友，扣子眼上别着白花，他们也写了反佛朗哥的诗篇。

在脑力劳动的历史上，对诗人们来说，从来没有象西班牙战争那样能提供这么丰富、精彩的重要的素材。西班牙人民的鲜血所产生的引力使得一个伟大时代的诗坛为之震动。

我不清楚这些出版物会有多大的成效，因为这时候

---

① 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曾发表长诗《西班牙》（1937）声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

② 斯彭德（1909—），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西班牙战争的结局十分糟糕，同时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也不太妙。后者尽管规模空前，有极大的残酷性，英雄主义的行为也到处可见，却从未能象西班牙战争那样吸引诗人们共同的感情。

不久之后，我就要从欧洲返回我的祖国了。南希也将由一位斗牛士陪同到智利旅行。在圣地亚哥这位斗牛士撂下了斗牛，同时抛弃了南希，去经营腊肠和别的灌肠的买卖。但是，我那位最亲密的女友、最爱赶时髦的女人是无敌的。在智利，她选中了一位流浪诗人做她的情人，这位巴斯克后裔的智利人不乏才能，但已没有牙齿。此外，这位南希的新相好是一个大酒鬼并且常常在夜间给这个高贵的英国女人一顿毒打，强迫她在社交界露面时戴一副大墨镜。

确实，她是一个吉诃德式的人物，身体长期有病，勇敢而又多愁，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为奇特。她是赖德·金纳德的女儿，原是金纳德·莱奈的唯一继承人。一九三〇年南希做了一件使伦敦为之哗然的事情：她和一个黑人逃跑了，这个黑人是被沙博伊饭店弄进来的最早的一批爵士乐队里的乐师。

赖德·金纳德找到了她女儿的空空的床铺和一封留下的信。信中女儿骄傲地通知她，命中注定要与黑人结合。这位贵族夫人径直去找了她的律师并办理了剥夺女儿财产继承权的手续。就这样，我认识的这个在世界上到处流浪的女士，是位不列颠公爵的遗嘱中没有提到的继承人。经常参加她母亲举办的聚谈会的人中有乔治·

穆尔（此人老是悄悄地说他是南希真正的父亲），希尔·托马斯·比彻姆，年轻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盖伦王子即后来的温莎公爵。

南希·金纳德进行了还击。这年十二月，在她被她妈赶出来的时候，象圣诞节礼物一样，整个英国贵族阶层都收到一本红色封皮的小册子，题为《黑人和白人小姐上船了》。我看见通篇是尖刻讽刺的话，其挖苦的程度有些方面赶上了斯威夫特。

他们俩提出的为黑人辩护的理由对于赖德·金纳德和英国社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我至今还能记起里面的话，现引用一段，因为他们俩的话是极有说服力的：

假如您，白种人的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您的那些人，万一被极为强大的部族绑架、拷打和监禁，然后被押走，押到远离英国的地方，以便象对待奴隶一样地制服你们。随之，你们就作为人类的丑恶、卑劣、可笑的样板被展示出来，强制你们在皮鞭抽打下和伙食很坏的情况下干活，那么，您的种族属性又有何用呢？黑人们受过这类痛苦，而且比这更为粗暴和残酷。尽管如此，在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苦难之后，他们今天是最杰出和最高尚的大力士，他们创造了一种较之其他任何音乐更为普及的新音乐。你们，白人们，正如您也是其中一位，是否能从那样的逆境中胜利地走出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一种人更有本领呢？

就这样共有三十页。

南希不可能回英国去住了，而且从这时起她信奉了受迫害的黑色人种的事业。在埃塞俄比亚遭受侵略期间，她去了亚的斯亚贝巴。之后又去美国，以便支持被诬告为行为卑鄙的苏格兰黑人小伙子们。这些黑人青年被美国的种族主义法庭判了刑，而南希·金纳德则被美国的民主警察驱逐出境。

大约是1969年，我的女友南希·金纳德在巴黎去世。在垂死挣扎的危急时刻，她几乎是赤身裸体地从旅馆的电梯里下来的，她倒在那里死去，永远地闭上她那双美丽的天蓝色的眼睛。

她死的时候体重三十五公斤，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她的体力在与世上不公正的事情的斗争中耗尽了。她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除了生活愈来愈孤独和在无人关怀帮助的情况下死去。

#### 在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西班牙战争的形势每况愈下，但是西班牙人民的抵抗精神却感染了整个世界。国际志愿人员纵队在马德里投入了战斗。那还是在1936年，我看着他们来到马德里，每人都穿上了军服。这是一支由不同年纪、不同毛发、不同肤色的人士组成的伟大的队伍。

现在是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巴黎，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一次世界上所有地区反法西斯作家参加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在马德里召开，也就是在那里，我才开始对阿拉贡有所了解。起初他身上使我感到惊奇的事情

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工作劲头和组织能力。所有的信函都先由他口授，之后他再一封封地修改，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些最小的细节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他常在我们狭小的办公室里长时间连续工作，直到完成。此外，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写了好些散文作品，而他的诗歌则是法语中最优美的。我曾看见他修改从英语和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译作的校样，并且看见他在印出的校样纸上从头改写。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我早已没有领事的职务了，因此，得不到一文钱。我就在阿拉贡领导的保卫文化协会里找了点工作做，每月四百旧法郎。戴丽娅·德尔·加莉尔，她在那时以及后来好多年都是我的妻子，一直有一个富有的庄园主的名声，实际上她比我还穷。我们住在一个可疑的蹩脚旅馆里，那旅馆的整个底层都是为那些一会儿来、一会就走的临时夫妻留着的。有好几个月我们吃得很少又很差。但是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是当时面临的大事。各个地区都寄来了珍贵的答复。有一份是爱尔兰诗人叶芝<sup>①</sup>的答复，另一份是瑞典伟大作家塞尔玛·杜格洛夫<sup>②</sup>的答复。他们两个人都年纪太大了，不适宜到象马德里这样一个被包围和被轰炸的城市里来。但是两个人都赞同保卫西班牙共和国。

---

①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杜格洛夫（1858—1940），瑞典女作家。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知道在凯道赛<sup>①</sup>有一份关于我这个人的报告，全文如下：“聂鲁达和他的妻子戴丽娅·德尔·加莉尔，常去西班牙旅行。去时和来时都带着苏联的指令。他们是从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那里接受这些指令的。聂鲁达并和他多次秘密去西班牙旅行。为了和爱伦堡建立更多的个人接触，聂鲁达就在这位苏联作家居住的那幢大楼里租下了一套房子并且已经住进去了。”

从头到尾一派胡言。海恩·理查德·布洛奇给了我一封写给他一位朋友的信，这位朋友是外交部的一个重要的负责官员。我向这位官员讲述了有人如何根据一些荒唐的猜想企图把我赶出法国。我对他说我热切地希望认识爱伦堡，但不幸的是直到那一天，我还未曾得到那样的光荣。这位大官遗憾地看看我，并向我保证他们将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去调查，而这些荒谬绝伦的指控依然如故。

于是我决定去见爱伦堡。我知道他每天要去“屋顶餐厅”，在那里按照苏联的习惯进午餐，就是说，傍晚时分去吃。

“我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智利人，”我对他说，“据警察说我们是密友。他们断言我和您同住在一幢大楼里。因为您的缘故，他们要把我赶出法国，所以我希望至少得到您跟前来认识认识您，并且握一握您的手。”

我不认为爱伦堡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意外的事

---

<sup>①</sup> 指法国外交部街。

都会表示惊讶。然而，那时我却看到从他那因怒气冲冲而搭拉下来的一绺白发间，从粗密的眉毛下，射出了极似惊讶的目光。

“我也希望认识您，巴勃罗，”他对我说，“我喜欢您的诗。先不说吧，请吃一点这种阿尔萨斯的酸菜。”

从那一时刻起，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觉得好象就是在那同一天，他开始翻译我的诗作《西班牙在我心中》。我应当承认，在我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朋友里，有一位是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由法国警察给我介绍的，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位把我的作品译成俄语的最优秀的译者。

我一直认为我这个人很不中用，特别是在做那些具体的事情和完成重要的使命方面。因此，当拿到银行汇票的时候，我就目瞪口呆了。这是西班牙政府给的，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用来支付代表大会的全部费用，包括那些从别的大陆来的代表们的旅费。有好几十位作家此时已来到巴黎。

我不知所措。拿着这笔钱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想把这笔钱转交给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

“我对钱向来连看都不看的，此外，我也许是不懂怎么用钱。”我对正巧在这个时候路过巴黎的拉斐尔·阿尔维蒂说。

“你是个大笨蛋，”拉斐尔冲我回答说，“为了西班牙的利益你丢失了领事的职务，现在落得连走路都穿破鞋了。你竟没有能力通过你的工作来支配这几千法郎

同时购买一些你必需的消费品。”

我看了看鞋子并验证了一下，果然鞋子都开口了。阿尔维蒂送了我一双新鞋。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和所有的代表一起动身去马德里了。无论是戴丽娅还是阿姆巴洛·贡萨雷斯·图纽，还是我自己，为帮助那些从各大洲来的代表们办理手续，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办理法国的出境手续时，我们要填写很多栏目。实际上，我们把巴黎警察局的办公室都占据了，在那里出示一些我们开玩笑地称之为“处方”的证件。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动手在护照上贴上名为“印花”的法国最高的公证标志。

在这些挪威人、意大利人、阿根廷人中间，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sup>①</sup>，他一路上历尽了艰辛。从某种意义上讲，能使他来，我感到自豪。在这之前他只出版过一本书，两个月前我收到了这本书，我觉得其中包含着真正的幼芽。当时还没有人了解他。

我的老朋友塞沙尔·巴列霍<sup>②</sup>到达后就来看我，脸色阴沉。他发火的原因是没有给她妻子车票，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感到这是无法忍受的。我很快给她搞到了一张票。我们把票交给了巴列霍，而他仍象到达时那样一脸愁容。他是有点什么事，不过这件事几个月后我才弄明白。

---

①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墨西哥诗人、散文家。重要作品有《在世界边缘》（1942）、《太阳石》等。

② 塞沙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著有小说集《音阶》，小说《铋矿》（1931）和《人类的诗篇》等诗集。

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同胞维森特·乌依杜勃洛<sup>①</sup>为了参加代表大会已先期到达巴黎。乌依杜勃洛和我是冤家对头，我们互不搭理。然而，他却是巴列霍非常好的朋友，他利用在巴黎逗留的这些日子向我的这位纯朴的伙伴的头脑里灌输那些攻击我的杜撰的事情。后来，在一次我与巴列霍的充满激情的谈话中才把一切事情都弄清楚了。

驶离巴黎的火车从来没有象这次那样坐了那么多作家。在火车的过道上我们彼此都在辨认着，有的人我们互相都认不出来了。一些人已经睡觉去了，另外一些人则不停地在抽烟。对很多人来说，西班牙是一个谜，一个历史上的那一时代的缩影。

巴列霍和乌伊杜勃洛不知在火车里哪个地方呆着。

……

我记得火车在边界上停了很长时间。好象乌伊杜勃洛在这之前丢失了一只手提箱。由于大家都在忙碌着并且都在关心车子为什么停着不开的问题，谁也无暇顾及他的事。……

开始继续向前旅行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车轮滚动在西班牙的大地上，我在想着乌伊杜勃洛，想着他的手提箱，想着他先前的不幸时刻。于是我对向我房间走来的中美洲某国的几位青年作家说：“你们去看看乌伊杜勃洛吧，他可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呆着并且很懊丧。”

---

<sup>①</sup> 维森特·乌依杜勃洛（1893—1948），智利诗人，最先提出创造主义诗歌的理论，著有诗集《逆风》（1926）等。

二十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个个满脸堆笑。乌伊杜勃洛对他们说：“您们不要跟我谈丢失手提箱的事了，这没有什么要紧的。严重的事情是在芝加哥大学、柏林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布拉格大学授予我各种荣誉称号的时候，你们的小小国家的小小大学是唯一的依然对我毫无所知的学校。甚至都没有邀请我去作一次关于创造主义的讲座。”

肯定的，我的这位同胞、伟大的诗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终于到达了马德里。在欢迎来访者和安排他们住宿的时候，我真想重新去看看我的家，快一年了我没有回去过。我的书和我的东西，所有的都留在那里。那是在被称为“鲜花之家”的大楼里的一间套房。这幢大楼位于大学城的进口处。佛朗哥的先遣力量已经到达大学城的周围，以致这一带住宅区已经换了几次主人。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穿着军人的服装，带着他的枪，他搞来了一辆斗车来运我的书和我家里的一些我最喜欢的用具。

我们来到五层楼上，带着颇为激动的心情打开了套房的门。弹片已经毁坏了窗户和几处墙壁。所有的书都从书架上掉下来了。要想从这些杂乱的東西堆里清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在匆忙地找一些东西。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多余的和没有什么用处的衣物都不见了。不是被入侵的士兵便是让保卫的军人拿走了。与此同时，那些锅、缝纫机、盘子、碟子却乱七

八糟地摊了一地，但是依然完好，而我的领事礼服，我的波利尼西亚的人面像，我从东方带来的那些刀，则已不见踪影。

“战争象梦一样变化莫测，米格尔。”

米格尔在那些散落的纸堆里，找到了一些我还在写作中的原稿。在我的生活中，这是最后一次对杂乱无章的地方关上大门。我对米格尔说：

“我不想运走任何东西。”

“什么也不要了？甚至一本书也不要了？”

“连一本书都不要，”我回答说。

我们回来了，行李车上空空如也。

（江志方 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聂鲁达散文选

作者 = (智利)巴·聂鲁达

页数 = 208

SS号 = 10123288

出版日期 = 1987年04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他历尽沧桑，思想开放而又善于倾听未来（代序）& 林一安

爱

微明时分

永不停航的船

英雄

寻根者

归来的温馨

黑岛绣花女

坎塔崂的劫难

服饰的妙用

水手的梦

马德拉斯，水族馆巡礼

“埃斯梅拉达”号在列宁格勒

重访特木科

我的朋友保罗·艾吕雅与世长辞了

这寒意逼人的一天

复苏而又活跃的万徒勒里

我们伟大的兄弟马雅可夫斯基

同样面孔的两帧相片

毕加索是一支种族

美洲，请不要熄灭你的明灯

诗人不是弃石

只要有爱，就值得活在世上

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人民的诗人

夜晚的洗衣妇

我们是印第安人

没有神也没有偶像

惨遭毒手的信天翁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回答一个问题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选译）

    年轻的外省人

        童年与诗歌

        艺术和雨

        我的第一首诗

西班牙在我心中

    费德里科其人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绿色的马》

    发生在格拉纳达的暴行

我的关于西班牙的书  
战争和巴黎  
南希·金纳德  
在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附录页